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1）（图）

谁是郭德纲？东东枪

“我是中国相声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这些年，我们说相声 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戏剧作品《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里，李立群扮演的言归在介绍由大陆赴台湾演出的相声大师“常年乐”时说道：“每一个深沉哀痛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接受过他温暖的照顾。” 自相声行内公认的开山祖“穷不怕”朱绍文开始在天桥卖艺至今的百余年间，无数深沉哀痛着的小小百姓，也都曾在包袱抖响的一刻体会着他们片刻的欢愉，以及蕴藏在这欢愉之中的温暖的照顾，无数人间悲喜都曾被相声艺人化作淋漓干脆的包袱，于市井间一一抖响。 也是在这百余年间，相声从街边撂地到登堂入室，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从杂耍玩艺儿到语言艺术，从弱到强，又从盛到衰…… 2005年6月26日，曾有一场名为“这些年，我们说相声”的传统相声组合在“穷不怕”当年卖艺的北京天桥上演，演出这场节目的是一个名叫“北京德云曲艺社”的团体。 这个团体现在每周固定在天桥的“天桥乐茶园”上演两场传统相声大会，领衔的演员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今年，是这个年轻人在北京的各处茶园剧场坚持相声演出的第十一个年头了。 他叫郭德纲。 谁是郭德纲？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2）（图）

十五年后的一条好汉 2005年11月4日，郭德纲、于谦天津相声专场演出前一天的下午，郭德纲从北京家中出发赶到了天津。 那天晚上，郭德纲登门拜访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西河大鼓门里的师父，天津曲艺迷中颇有威名的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另一位是传统相声观众几乎公认的当今最优秀的相声艺术家——少马爷马志明。郭德纲给少马爷送去了几张他明天演出的票，却得知马先生此前已经为得到几张明晚的演出票，主动联系过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编辑梁文逸。 第二天的演出定在晚上19：15开始。中午12：05分，郭德纲穿着一身休闲西装，与爱人一同出现在中国大戏院门外，手里还提着一袋子看起来像是什么树枝的东西。他笑着向旁边的朋友举起手里的东西：看见这是什么了吗？金钩梨！小时候在天津咱常吃这玩艺儿啊……几分钟后，他从一张宣传海报前走过，海报前驻足观看的一位中年男子侧身让他通过，没发现身边经过的这个人与海报上的“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什么联系。 此前的两天郭德纲患上了感冒，这时候还略微有些鼻塞。我问他：“上次在天津演出是什么时候？” 他说：“大约九八年的时候了吧？中间有一次路过名流茶馆，被佟有为马树春拽进去票过一场，除此再没有过。” “现在什么感觉？” “感慨太多了……” 与此同时，一场自凌晨开始弥漫的大雾使得京津两地间的数条高速路全部封闭，早上九点就从北京驱车出发的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都被堵在了路上，车上还有当晚开场节目“什不闲发四喜儿”需要的鼓乐架。郭德纲说：没事儿，到时候自然就有办法了。 也在此时，一大早就在北京天桥乐茶园门口集合的五十余位自称“钢丝”的郭德纲迷刚刚决定要改坐火车赶往天津，他们租乘的大巴车转悠了一上午，始终被大雾所阻。 原以为可以提前进后台去做些休整、准备，但是郭德纲却被剧场工作人员告知要等到下午三点半后台才能开门。之前这几个小时里，郭德纲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面、在天津的老字号冷饮店“康乐”吃了一点冷饮。其中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在轻声哼唱着什么东西，一会儿是西河大鼓、一会儿是“卖布头”里的吆喝、一会儿又是几句白派京韵大鼓《孟姜女》。下午14：30，他站在滨江道上，眯着眼睛瞧见了开始在云层与雾气中隐隐显露的太阳：“这孙子，你丫早干嘛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去了？”　　片刻之后，有一位北京观众发来短信息：京津塘高速 15：00 开放。郭德纲 15：05 时给徒弟何云伟打了个电话：如果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内还没上高速，赶紧叫上全体人员一块儿去火车站。坐火车。　　15：30，中国大戏院后台有人来开门了。郭德纲进入后台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从北京带过来的场面桌支开，铺上绣着团龙的桌围，将四个角拽整齐，再把放在行李箱中的醒木、折扇、白手绢、玉子板一一摆好在桌上。然后把《学西河》中要用到的鼓支起来，拿出鼓犍子、鸳鸯板，打起鼓板，开口便唱：“大清一统，锦绣的疆闳……”他的爱人王惠则开始将他和搭档于谦今晚要穿的四套大褂拿出来一一熨烫整齐，挂好在后台的衣架上。　　15：40，郭德纲手执鸳鸯板在后台化妆间不断地踱着步，看起来有点焦躁。有人接到电话，说是德云社其他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奔往 103 国道。郭德纲回头说：嗯，不是奔 103 电车站就成。然后走到化妆间的大镜子前，双眼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15：50，王惠打电话问堵在路上的演员们有什么进展，得到的回复是 103 国道、104 国道以及所有高速都进不去。郭德纲离妻子两米左右，坐在化妆镜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遍一遍地叨念着晚上的段子。叨念完一个段子，他给徒弟何云伟打电话：坐火车去吧，见机行事。说完仍旧坐在大镜子前，神情严肃。此时距演出开始还有约三个半小时，除郭德纲之外，所有演员都还被堵在北京的五环路上。　　16：10 分左右，中国大戏院工作人员提着一支毛笔，蘸好白色颜料，在后台的一块红色板子上写下一个“祝”字之后，才突然回头问起旁人：哎？这主演叫嘛？什么纲？　　他最后写下的是“祝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首次莅津演出圆满成功!”写到“莅津”二字时，正巧在一旁经过的郭德纲轻声说道：“师傅，我是天津人。”写字的师傅似乎没听见。郭德纲就又重复了一遍。　　“噢。去北京发展了？”　　“嗯。出去十多年了。”郭说，然后就等那人写完，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开。　　16：25，北京的相声演员刘洪沂打来电话，说自己已到天津。郭德纲显得有些兴奋：洪沂叔来了，这下好了，一会儿不成可以让他先给我量活（捧哏）。　　16：35，十几个由北京赶来的观众涌进后台，有几个与郭德纲拥抱在一处：“我们来了，好点儿吧？后台的还没到，要是前台的再不到就坏了……”　　16：45，天津的年轻相声演员，也是本场演员之一的高峰赶到后台，郭德纲拉住高峰开始对词儿——《口吐莲花》。　　17：00，一段《口吐莲花》对完，郭德纲脸上的神情放松很多，眉头也舒展了些。他开始进入状态。　　17：10，得到消息，所有其他演员已经赶到北京站，并且买到了 17：50 发车的火车票，19：12 才能抵达天津。　　17：25，郭德纲在后台自言自语：范振钰、黄族民、刘洪沂、侯长喜、王文玉……最不济了今儿个来的这几位一人给我量一段就够了……　　17:30，于谦打来电话，说演员们已经上火车。　　18：15，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两位相声演员来到后台与郭德纲聊天。哈哈笑的两位演员提到：今天下午他们在园子里的演出，九成观众是因为晚上郭的专场从北京赶过来的，然后赞叹：这些粘子（观众）们不错！郭德纲说：“那是！太不错了!”　　18：05，相声演员刘洪沂、李金祥在中国大戏院旁边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晚饭后赶到后台。见到刘洪沂走进后台，郭德纲笑着迎了上去：爷们儿！今儿个太有意思了！　　19：20，演出开始，原定开场节目、全体演员共同演出的“什不闲发四喜儿”取消，第一段节目改为郭德纲、高峰合说的《西征梦》。19：45，郭德纲与高峰的返场段子《口吐莲花》开始，郭德纲正在向演员介绍高峰。台下一观众用天津话喊道：你哪人？郭德纲在台上用天津话回应：“我天津的啊!”台下响起一片喝彩声和掌声。　　20：05，郭德纲、于谦二人一同走上舞台。郭德纲在台上对于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来了！　　20：10，郭德纲在台上表演《学西河》，垫话中有一个段落是唱太平歌词，郭德纲正要打板开唱，楼上观众席中有人点出了名目：《单刀会》！郭德纲在台上顺声音望去，伸出二指凌空一指：好，单刀会！　　21：00，一直坐在台下第三排中间偏左位置上的马志明起身沿过道朝后走出了剧场。几分钟后，台上的主持人刚刚介绍出马志明的名字，他就从舞台上场处小跑着上了前台，拿过主持人的话筒。台下观众中顿时炸起了长达五十余秒的掌声和喝彩声。然后，六十二岁的马志明开口说道：“您这一鼓掌，我知道，因为这个郭

德纲呀，说实在的，这小子太可爱了！确实呀，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我真没想到，因为这个……郭德纲现在他是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了。侯耀文慧眼识人呐！就看他是这苗子，把他调到他们团，收他为徒弟，确实是好事。我当年呀，我们在天津曲艺团演出，好像在 90 年之前吧，郭德纲在我们团里头帮过忙。那时候考虑呀，是调他是不调他，领导这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要。（观众笑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咱也不是个领导，也没个职务，反正当时我看这小子不错。嗯，确实不错！后来呢，他走的时候我就说：'郭德纲，二十年后必是一条好汉！'（观众笑声/掌声）从 90 年算到现在——刚十五年他就投胎了！（观众笑声/掌声）转世了！而且回到天津，这叫一炮打响！确实出乎意料。这是我们天津的光荣，我们大家的骄傲！" 22：40，郭德纲天津相声专场演出结束。郭德纲在这场演出中一共演出了《西征梦》、《口吐莲花》、《学西河》、《我要上春晚》、《我这一辈子》、《山东二黄》、《卖布头》七个相声段子，加上返场的《盗墓》、《绑架》、《大实话》三个小段，共是十段。　　子夜前，郭德纲与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一同驱车返京。　　返京前，在中国大戏院的剧场门口，演出时一直在台下观看的郭德纲的父亲站在秋风中，对面前的儿子说出的正是郭德纲常在上场时面对观众说起的一句话："我很欣慰。"　　三天后，郭德纲在网上写道："2005 年 11 月 5 日夜 11 点多，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已经落下帷幕，街上行人寥寥，秋风起处，落叶四飘，与刚才戏院内的花团锦簇叫好连天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车向北京方向驶去，徒弟们依然沉浸在方才的兴奋中，我将头扭向窗外，夜色中的天津，既熟悉又陌生，95 年含恨离开这里时，我咬牙发誓，十年之内我郭德纲一定要杀回来，今天我如愿了。可此时心中，并不仅仅是高兴，更多的是感慨。"　　此时，距郭德纲最后一次在天津演出有七年，距他第一次在北京的京味茶馆说起相声有九年，距他孤身一人"含恨"离开天津有十年，距马志明对他说出那句"二十年后必是一条好汉"有十五年，而距郭德纲八岁拜师学艺，则已有二十四年。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3）（图）

天津小孩　　　　2004 年 7 月，当一名网友在相声论坛"中华相声"（http://www.mapai.org）中的一个回帖里将郭德纲说成是北京演员时，有人回帖纠正说：郭德纲是天津人。　　回复这句话的那个 ID 叫"天津小孩"，这个 ID 的主人是郭德纲。　　郭德纲是天津市红桥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安警察，母亲是教师。郭德纲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时，父亲便常把他放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各种演出，戏曲、曲艺都有，郭德纲那段日子几乎是有什么看什么。天津人最爱戏曲曲艺，天津的电台也就总播些戏曲节目，郭德纲虽然年纪还小，但也总爱跟着哼唱。他还记得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还买过一本《秦香莲》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剧情简介，也有唱词，郭德纲便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儿唱起来。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名叫小五的朋友。小五的父亲是说评书的，名叫高祥凯，也就是郭德纲简介上提到的高庆海先生。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很喜欢这孩子，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知道他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起了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最初学艺时，每天早上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他去高先生家，后来大了点，就变成自己每天骑着车去高家学艺。高先生每天要看《天津日报》，郭德纲去高家的路上就都会先买张《天津日报》带过去。郭德纲去得早，高先生起得晚，往往是到了高家，高先生和小五都还在被窝里没起呢，他自己便在屋子里找点活儿干、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差不多了，人家父子也醒了。这像极了旧社会拜师学艺的小学徒的一个生活场景，高先生因此对他大加赞赏。　　学的是评书，开蒙却是用的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这段《五行诗》是段文字游戏型的相声，主要内容是捧逗二人以历代古人名联句做诗，而且

配合每句诗都有一个身段，高先生要郭德纲练的便是基本的语气、表情和身段。比如说到一句“金锤一对上下翻”，这其实就是三个身段——金锤、一对、上下翻。练这句时高先生给他拿来两个酒瓶子，告诉他就拿这个当金锤来耍。2005 年 11 月，郭德纲在网上开始连载的自传作品里提到了这一段往事：“比划金锤时一手一个酒瓶子，金枪是用毛巾捋，学董卓撩袍时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唉，那是夏天啊。若干年后我教潘云侠《五行诗》，这一切全用上了，潘云侠呲牙咧嘴的时候，我笑了，好像看到当初的我……”　　郭德纲在高家院子里比划这些稀奇古怪的招式时，常有一个孩子站在一旁笑话他。那孩子是同院的街坊，家里是卖汽水的，常穿着大红背心儿蹬一辆三轮车拉着汽水啤酒满街跑，后来这孩子长大之后也成了演员，而且最早以模仿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名，他的名字叫汪洋。　　传授《五行诗》时，高先生说过：“这活呀，使出来就是山崩地裂!”郭德纲虽然一直不明白，也不觉得这样一个文字游戏的段子有什么山崩地裂的，但还是没敢怠慢，把这块活打磨得瓷瓷实实。《五行诗》之后，高先生又给他说了一个相声《戏迷游街》，在此之后才教他评书《三侠剑》里的“镖打秦天豹”一段——这是郭德纲评书开蒙的节目。　　也是在郭德纲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认识相声大家常宝霆，便找机会把郭德纲介绍给了常宝霆。常先生是老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当年赫赫有名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的胞弟，在天津的曲艺观众里颇有名望。去常三爷家登门拜访之前，郭德纲事先想到可能会让他当场表演，便提前准备了一个单口小段《天王庙》。这段《天王庙》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现在还能听到单口大王刘宝瑞和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录音。当时没人教过郭德纲，他是自己听录音看文本学会的这一段。果不其然，准备的这一段还真就用上了。在常三爷家的小客厅里，常三爷问完“喜欢相声吗”“多大啦”之类的问题，就开始问道：“都会说什么啊？”“会说一个《天王庙》。”　“噢？”　常宝霆把眼睛瞪得挺大，“说说听听吧。”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4）（图）

那天常三爷有什么具体的评价郭德纲想不起来了，但他记得两条，一条是三爷告诉他，这段里头过路的四个读书人和私塾里的四个小孩儿写在天王庙白墙上的字不该是横着，应该是一句一句竖排着的，读书人是大人，写得高，四个小孩身量矮，写得低，等于是在下边续上的，这样最后被私塾先生念连起来才更合理。第二条是常宝霆先生那天跟他说的一句话：“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郭德纲给他的徒弟们说活的时候，也常提到这句话。　　常三爷是相声名家，事务繁忙，不能常去求教。后来就有人给郭德纲介绍了常宝霆的弟弟——常九爷常宝丰。常九爷是常家这辈儿里最年轻的一个，1947 年生人，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长得帅气、精神。常九爷家住天津的体院北，从家里过去，路上大约要用一个小时。郭德纲到现在还记得常九爷家的客厅里铺着的地毯、屋子里的大沙发，以及墙上挂的一幅到现在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抽象画。第一天去上课时，那间屋子里很冷，郭德纲坐在客厅里很拘谨。常九爷喊自己的爱人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来，从箱子里拿出来六本书。那是当时沈阳出版的六本传统相声文本，也就是现在相声学习者和爱好者都知道的“四大本儿”，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至四辑《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前身。　　这套材料当时是内部资料，外面根本买不到，郭德纲一见如获至宝，就一本一本从常先生家往外借，拿回家再一本一本地抄，直到把这六本书全都抄完。相声行和评书行里把这种节目文本叫做“册子”（“册”读作 chái），这套手抄的传统相声册子，郭德纲一直精心保留着，直到现在还带在身边。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是交给郭德纲一个手写本的《八扇屏》册子，上边还写着“王佩元整理”，让郭德纲回家背词儿去。王佩元是天津的相声演员，早期一直给常宝丰先生量活

（捧哏），合作过《并非讽刺裁判》等很多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北京和常宝丰先生的侄子常贵田合作。等到郭德纲把《八扇屏》的词儿背好了，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的对词，常九爷随时给他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常九爷，当时天津很多的相声演员郭德纲都曾去登门拜访求教，如白全福、马志存等等。　　当时正是 1980 年代，相声的繁荣期，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曲艺窝子。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而且往往是一进夏天就开始，一演就是三个月，演出不收门票，观众只要买票进了公园就能去看相声。当时在公园里演出的不乏名家，如于宝林、冯宝华等人，而且说的基本全都是传统相声。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样的露天场地里，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当时有一个消夏相声晚会，是河东区文化馆的业余相声队固定演出，但也可以让郭德纲他们来演。郭德纲还记得那天和自己的搭档、也就是教评书的高先生的儿子小五一起蹬着自行车去第二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场景，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都非常兴奋，一边骑车一边反复地对着词儿。　　演出的地点是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头一次演出郭德纲没怯场，但是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给郭德纲一直记到今天的，是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天津小孩”郭德纲来说，那个观众的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来自观众的温暖和鼓励。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5）（图）

　　三次进京　　　　几年之后，郭德纲经人介绍认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并且和他“搭伙”合作，一块儿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的青年队。当时的郭德纲是给陶大为捧哏，他们忙于随曲艺团青年队在各种剧场、文化站参加各种演出，平均一年得有几十场——每一场他们的节目都是被放在开场第一个的位置。除去团里的演出，郭德纲还忙里偷闲在天津说过评书。《杨家将》、《大隋唐》，以及长篇单口相声《八大棍儿》，他基本都使过。　　1988 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由天津相声演员高英培负责。陶大为和郭德纲去参加招考演员的考试，留在了全总说唱团——这就是郭德纲的第一次进京。　　郭德纲第一次进京的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这是我现在最看不起的心态，但当时，就是抱着那个心态来的。”　　当时的全总说唱团里，相声演员有高英培、孟繁贵一场，崔金泉、马志存一场，陶大为、郭德纲一场，同台演出的歌唱演员则有韩笑、苏红等人。除此之外，有一个负责检场的藏族小伙子名叫杨红，几年后这个小伙子在全国大红大紫，只不过观众知道的都是他的藏族名字——洛桑。　　留在全总说唱团之后，陶大为郭德纲二人马上随团赴四川演出，之后就是在四川、河南各地几个月的巡演。巡演回来后，团里对他们这两个年轻人比较满意，准备开始给他们办理工作手续、调动人事关系。正在此时，北京爆发学潮，团里的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他们二人也只得离开北京，重回天津曲艺团的青年队，但郭德纲不久也离开了这里。　　1992 年左右，郭德纲开始在天津一些区属的小剧团搭班唱戏。他唱了半年的河北梆子、一年半的评戏，大花脸、小花脸、老生、小生、彩旦，他全唱过。　　小剧团的演出很不正规，有时候非常狼狈。一次去河北文安县农村唱戏，戏台是在村子里露天搭的，台底下观众坐的都是用破竹片之类搭起的座位。演员在台上演出，台口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本儿记。演员在台上翻跟头，底下有人喊好，只要一喊好，小本子上就得记着：这人加五毛钱。一个甩腔，底下又有喊好，这也得记着：又五毛。　　后台常有村里的老太太抱着孩子去串门，看着看着就和演员说：给我们孩子画个脸儿吧！后来知道，照当地的旧风俗，给孩子画个脸儿再抱着在戏台上走一圈，孩子能长寿。每给小孩画一个脸儿，后台要收五毛钱，可就为了这五毛钱，后台的演员差点没打起来，因为有演员正式提议，这五毛钱得充公，再集体分配。　　“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走近

留神看，梆子剧院的。”这是当时这种小剧团里演员们自嘲的顺口溜。　　这期间，郭德纲又去过一次北京，这第二次进京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待了三四天就返回了天津。唯一的收获是一天夜里从民族宫一直走到大栅栏的小旅馆，出发时穿上的新鞋子在脚上磨出来的几个水泡。　　回天津后，郭德纲尝试过做生意，他在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一千平米的场地想搞剧场，那场地的租金是一个月五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实在是天价，他铆足了力气也没挣回这些房租来。直到最后债主逼门，郭德纲实在无计可施，卖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还债——也正是这次卖房还债，激发了他和妻子间的矛盾，二人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　　此后的郭德纲陷入了茫然，他决定要离开天津。可是去哪？最后的结论还是北京。这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这个决定，郭德纲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的：“当时，我自己想，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我有这个自信。我也仔细分析过 80 年代、90 年代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笑星、腕儿，我挨个看——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儿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话，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话，在天津找个工作，一个月挣这么一千块钱、八百块钱，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等到我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那时候，我孙子得问我：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支撑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试试。”　　郭德纲这次进北京是 1995 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书、资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个朋友处，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为的是那儿离地铁近一点，交通方便。房间总共也就大约八九平米，里边除了一个床铺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段时间里，郭德纲写任何东西都得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在床边上写。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通过这个人认识了几个影视公司，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接触混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同时，丰台区蒲黄榆附近有一个文化站办一个小评戏团，招演员唱评戏，郭德纲去了。去的时候说好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连着唱了两个月，剧团老板一分钱没给。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6）（图）

人越没钱，越容易饿，特别能吃。可是，吃什么呢？郭德纲自个儿买一捆大葱回来，买了点酱，回家后在锅里放水，直接下面，再放酱进去，煮出一锅糨子一样的东西来，天天拿葱蘸那锅糨子吃。　　此时郭德纲住在大兴的黄村，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黄村去蒲黄榆唱戏。后来，那辆破自行车也坏了，只好开始坐公车。坐公车前，他先认真地算计应该怎样倒车，才能省下五毛钱、一块钱……结果有一天散了夜戏，赶到苜蓿园汽车站，回大兴的末班车已经走了，又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去。那天晚上郭德纲从南二环的蒲黄榆走到了大兴的黄村，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年之后，郭德纲说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唏嘘不已：“走到新发地菜市场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两块钱。我心想，这是体力活儿，得吃饱了——两块钱就都买了包子。吃完了，接着走。玉泉营那儿难走，当时正修桥，挖的大坑，当时手上还带了块表，我拦了一辆车，问‘师傅，您给我送到地儿我把表给你行么？’人家没理我就走了。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啊，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咬着牙就到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反倒觉得身轻如燕了，一点都不累！我心里想啊，轻功可能就

是这么练出来的……可回家一看，脚上都是泡。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熬一锅糨子，吃了，还得去唱戏去……”　　戏唱了两个半月，老板终于给了郭德纲一个月的钱，一千块。发钱是因为这老板马上要带一批演员去赤峰演出，好多演员都不愿意跟他去，他认准了得叫上郭德纲，因为郭德纲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老生、小生、大小花脸、彩旦他都行。一千块钱交到郭德纲手上，这老板跟郭德纲说好什么时候在哪里集合出发，郭德纲笑着答应下来，拿着这一千块钱便扬长而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个老板。后来听说，去赤峰的演出险象环生，那老板和跟去的一帮演员差点没死在那……　　郭德纲那几年中所经历的困苦还不止这些。他住在大兴黄村时，曾有一次发烧，浑身难受，好几天没吃饭，可是又身无分文。最后他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从天津来北京时带过来的呼机，强挣扎着走出家门，十块钱卖给了街边收旧呼机的小贩。用这十块钱买了一盒消炎药、两个馒头。吃完了馒头，吃了药，郭德纲想：行，我这就算是又活过来了……后来，因为通县的房租便宜，他搬到了那里，可还是有交不起房租的可能：“一到交房钱的时候可要了亲命了，不敢出去。房主在外头砸门，又骂又卷，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只能等半夜，没人了，这才偷着出去——还不敢走大门，这房子是看大门那人介绍租给我的，得翻墙头出去。”　　2005 年 10 月 6 日凌晨，郭德纲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一篇题为“我的话”的帖子，又提到了当年那段窘困的日子——　　　“夜难入寐，翻检旧物，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勾起思绪。　　当初，为了相声，孤身进京，受尽苦难，尝遍白眼，在新社会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一天深夜，身无分文，从蒲黄榆走回黄村，行至西红门泪流满面……在外为免父母担心，报喜不报忧，中秋夜遥望天津泣不成声……　　当时，曾写下这么几句话：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日出而作子夜还，奔波皇城叹流连。　　人前枉作青云客，男儿暗泪对谁谈。”　　　郭德纲曾几次用“万念俱灰”来形容那一阶段的心态。但是，“有时候闲下来实在没事儿了，唯一能想起来的还是相声——我就会这个。平时唯一的乐趣也就是背背活，在屋里自己背着玩，这是唯一的乐趣。也不会别的了，别的干不了。而且当时有大量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琢磨这些事儿，想了好多。觉得指望着自己进什么晚会，给某某大腕儿提鞋背包，不是个事儿。我这玩意儿还得在园子里说……”　　一直到 1996 年，机会来了。一天，郭德纲去琉璃厂的书店里去看书——因为买书要钱，看书不要。打琉璃厂出来的时候，他意外看见一间茶馆，里头一屋子的小孩儿，大都十六七岁的样子，在这茶馆里说相声呢，看样子像是一帮相声票友自个儿在说着玩。正赶上郭德纲也走累了，干脆就坐底下听着。　　那群票友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叫做王月波，后来专业说起了相声，还曾在广德楼、天桥乐等茶园剧场参与北京德云社的演出。王月波曾经与郭德纲提到过：“当时就觉得台底下坐着这人奇怪，我们在台上使包袱的时候他不乐，我们几个人团春调坎儿砸个卦什么的他倒自个儿在底下乐了……”“团春”“调坎儿”指的都是相声演员用行业内独有的一套语言来交流，这套语言叫做“春典”或者“坎儿”，类似于江湖黑话，使用这种语言就叫做“团春”、“调坎儿”。除非是曲艺行内人或者是对相声行了解较多的观众，除此之外，一般观众都是不懂的。　　郭德纲后来便常去那家茶馆，一来二去的，与那里的票友们也都熟了，他这才说起：我以前也干过这个。票友们一听就来了精神儿：那您票一个吧！于是，郭德纲就在着茶馆里使了一个段子，给他捧哏的就是那个小票友王月波——这是郭德纲头一次在北京登台说相声。　　郭德纲的演出被那家茶馆的经理看到。下了台，他找到郭德纲：“郭先生，您上这儿干来吧。”　　就这样，郭德纲在那家茶馆里说起了相声，那家茶馆的名字叫作“京味茶馆”。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7）（图）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999 年 1 月出版的民俗读物《话说北京》一书，由郭德纲编著。前言里，他这样写道——　　幼时，疯魔般的酷爱各种民间艺术，终于在八岁那年投身艺坛，学评书、学相声，历经寒暑，洒尽汗水，尝尽个中滋味。复辗转于梨园，工文丑、工铜锤、檀板丝竹声中，又知道了汗浸胖袄的滋味。难啊！演员的难处是行外人难以理解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也逐渐地理解了前辈艺人的教诲："成角儿？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盼着吧！"长夜闷坐，细品此语。对？错？经验之谈？牢骚之语？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　　从刚刚进京时就想出名、上晚会、当大腕儿，到后来说出这句"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郭德纲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从他在京味茶馆里说起相声开始。　　京味茶馆里能坐一百多个观众，郭德纲在这里白手起家，一边给那些小票友说活，一边自己上台使活，竟然把这小小的茶馆干得挺红火，最热闹的时候，连后头掌柜的柜台上都坐上了观众。也就是从这时起，郭德纲开始觉得"相声还是这么说有意思，在这儿说我很舒服，每天都盼望着去这。"可是又觉得很迷茫，越说越觉得自己从小就从那些老先生那里学来的相声和电视上的相声完全不一样，难道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茶馆里说相声？　　他最后的结论是：电视上的相声确实和我的相声不一样，那不是我的路子，我干不了那个。后来，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老相声演员邢文昭等人也加盟到京味茶馆的演出，郭德纲更加认定：相声要在剧场里说。　　在京味茶馆的相声演出一直持续到 1998 年，因为跟茶馆老板的矛盾，郭德纲离开了这里。　　此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的召集同行，继续搞茶馆剧场内的相声演出。也就在那一年，1998 年，他与天津的老曲艺演员田立禾、范振钰、黄铁良、尹笑声、冯宝华、佟守本、魏文华、金文声、陈鸣志、刘英奇、寇庚儒、刘学仁等人，在北京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每周一场的相声大会演出。　　中和戏院最早是乾隆年间兴建的老戏楼，当年的各路名角儿，谭小培、尚小云、杨小楼、马连良、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粉墨登台。郭德纲等人的相声演出是每周一场，定在周六。底角儿是田立禾范振钰，倒二是黄铁良尹笑声。郭德纲当时与王月波搭档，节目排在开场第一个。　　当时台下有一个十七岁的相声小观众每场必到。据他回忆，当时郭德纲的节目，虽然排在第一个，但是由于效果太火爆，后边的第二、三、四场的演员都"接不住"，按照调坎儿的说法，二三四场全是"泥的"，直到第五场，金文声先生的南路山东快书出来，台下观众的劲头儿才能被收回来。　　在中和戏院的演出只演了八场，有些演员就开始"返头"了，也就是不得不把前几场里说过的段子重新拿出来再说。没有新节目是拢不住观众的，中和戏院的演出停办了。　　之后的几年里，郭德纲零零散散地在各种茶馆、剧场以及其他场所演出相声，比如 2000 年的"千禧新春曲艺名家名段欣赏晚会"，后来最早被传播到网络上的两段录音，郭德纲与范振钰的《杂学唱》和《白事会》，就是那次演出中的录音。就在那段《杂学唱》里，郭德纲说到：相声要想再度繁荣，只有一条路——回归剧场，回到观众当中去！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8）（图）

2002 年，郭德纲与老相声演员张文顺，以及快板、相声演员李菁进驻大栅栏内的广德楼，又办起了相声大会。　　张文顺先生生于 1939 年，从小喜欢相声，常跟着三叔去平安电影院听"小蘑菇"常宝堃，上中学时在天桥的相声场子里帮场，1946 年左右连续两年每天中午听华声电台的马三立张庆森，并在 1950 年由侯一尘的徒弟张世芳开蒙说起了相声。20 岁时，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文学专科一毕业，就揣着大学文凭考进北京曲艺团，当上了相声班的班主席，同时还教起了曲艺团学员班的古典文学课——就从那时候开始，说了一辈子相声。李菁则是 1970 年代末出生，从小随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的演唱者、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学习快

板，当时尚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这一老一小两位演员，加上郭德纲，以及一些不定期来帮忙的京津同行朋友，撑起了这个相声大会的演出。　　起初，广德楼的演出是除周一之外每天一场，甚至下午晚上各一场，但后来因为观众太少实在难以支持，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周末两天各一场。　　当年那个在中和戏院连听了八场的小观众基本上还是场场都到，而且场场都坐同一个座位。有一次演出他坐在了后排，台上说单口开场的张文顺先生跟其他观众说：咱们先等会儿，坐这儿的那个小兄弟还没来呢……这小观众赶忙在后排应声：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渐渐的，这个小观众和后台的演员也成了熟人，大家才知道这孩子从小也学过相声，于是就让他也上台使一段。第一段使下来，张文顺先生乐了：这小子学郭德纲学得太像了，活脱儿就是一个小郭德纲。后来，在张文顺先生的建议下，这个小观众成了郭德纲先生的徒弟。张文顺很喜欢“云”字，家里的书斋就叫“听云轩”，于是，根据他的建议，给这孩子名字中间加了个云字，叫“何云伟”，开始固定在这里演出，给他捧哏的是原来给张文顺先生捧哏的老艺人张文良。“张文良”是艺名，老先生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金大侠的亲叔伯兄弟。　　虽然后台的人丁愈发兴旺起来，前台的观众却仍不加多。整场演出台下十几个人、三五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的时候都常有。不管台下有几个人，相声大会照演不误。但也正因为观众少，当时广德楼的相声大会演出不但不赚钱，而且基本上是需要郭德纲贴钱进去的——“一下午挣的钱都不够晚上盒饭的”，“一个月贴个八九千块钱跟玩儿似的。”　　郭德纲在台上台下都说过，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声大会的运营模式就是他把在别的行业，包括电视剧、主持等工作中“骗”来的钱贴补到相声里：“每当写个东西写个电视剧做个栏目，我都很不落忍，我根本都没拿它们当回事儿。我发现凡是我认真做的事，都不顺，凡是我‘骗人’的事儿，都上赶着拿钱砸我……你说这相声，这么好的艺术，他不挣钱，天时不正！”　　而在当年一篇名为《广德楼重振雄风》的报道中，有人做过如下记述——　　“自今年 6 月 14 日起，由范振钰、郭德纲、张文顺、王惠等牵头联系，广德楼又继续恢复了曲艺演出。演出恢复以来，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从起初的每周三场发展为 8 月份以来的每周六场。更令人感动的是，范振钰、赵桐光、孙雅君、张文顺等老艺术家均不计个人得失，对广德楼的演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赵桐光先生，更是不辞辛劳，往返于京津两地，表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风范。前辈艺术家们不但参加演出，而且还主动担负起为后辈传道授业的任务。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经常在广德楼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李菁、徐亮、唐柯、何伟等人的艺术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广德楼这块阵地再一次显示出曲艺摇篮的作用。此外，不能不提的是，作为活动发起人，郭德纲、王惠等同志更是对广德楼的演出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组织工作……”　　2002 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北京城里飘着小雪，大栅栏街上行人寥落，下午 14：00，广德楼剧场里的相声大会准时开场，开场的邢文昭先生说得是他的师父刘宝瑞的看家段子《君臣斗》片断。开始演出前，邢文昭先生与台下观众闲聊了几句：“咱们现在这个园子叫广德楼，多少名角儿都在这演过，在当年，这是戏曲曲艺界的‘圣地’，现在也是‘剩地’——全北京城说相声的地儿就剩这一处了……”说到此处时，台下仅有的十几个观众中响起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和笑声。一位观众曾多次目睹十几个演员为台下两三个观众演出的场景，三年以后，他同我聊起当时的场景：“每次我都能想起电影《龙须沟》里于是之扮演的程疯子手执八角鼓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他有可能还饿着肚子，但他要站在台上优优雅雅地说出——烦劳弦师款动丝弦，学徒我挚挚诚诚的伺候您一段《水漫金山寺》……这是如今很难见到的很传统的艺人身上的风骨和气派。再穷再难，这个范儿不能丢。”　　尽管没少往里头贴钱，广德楼的演出后来还是因与剧场方的经济纠纷以及剧场的经营体制问题而在 2003 年停办。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去各种的零碎演出，郭德纲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给几个小徒弟曹云金、潘云霞、张云雷等人授课说活。　　在此同时，郭德纲的相声录音通过“中华笑海”等相声网站和论坛开始在网上逐渐流传起来，不少通过那两段《杂学唱》、《白事会》录音记住郭德纲这个名字的人，慢慢有了渠道去了解郭德纲是何等人物。

第一部分谁是郭德纲？（9）（图）

在网上曲艺迷中间名头颇大的“中华笑海”（http://www.cnxiaohai.com.cn）网站的主要工作人员、网名“小B”的白杨是在2002年的冬天，第一次在广德楼听到了郭德纲的相声。此前曾经有朋友向他介绍过郭德纲，但他觉得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应该不太会给自己什么惊喜。但自打在广德楼听到了郭德纲的现场演出，他就开始连续“追着”听了大约半年。2003年的下半年，他把采写的几篇关于郭德纲的文章和郭德纲提供给他授权下载的几段相声录音放到了中华笑海网站，推出了一个“郭德纲专题”，这也是网上对郭德纲的第一次系统报道。　　之后，2004年五一期间，老相声演员贾冀光旗下的金五环艺术团与位于潘家园的华声天桥内的华声天乐茶园开办曲艺演出，邀请郭德纲去做“攒底”的大轴。可惜，金五环艺术团的演出只持续了七天就因票房不理想而停演。金五环艺术团不演了，茶园的后台老板却看中了攒底的郭德纲，便找到郭德纲，邀请他来华声天桥开办相声大会。于是，郭德纲开始重新召集相关人等，移师华声天桥。　　从2004年5月至2004年10月离开华声天桥，北京相声大会在这里一共演出了九十九场。按照郭德纲的说法，这叫“九九归一”。在华声天桥的演出起初也颇惨淡，一周六场的演出，台下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当时的郭德纲在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今天来的人不少啊——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或是“您几位算来着了，今儿个算是您五位包的场……”　　直到2004年7月4日，郭德纲在华声天桥举办相声专场，台下观众的上座率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那天是郭德纲第一次在茶园内举办自己的相声专场，节目单如下：　　王派快板 《小寡妇上坟》　何云伟　　传统相声 《学西河》　　郭德纲　邢文昭（伴奏：张长纪）　　评书小段 《三打瓦岗》　　潘云侠　　传统相声 《双学山东话》　郭德纲　李　菁　　相声小段 《三个妖怪》　　曹云金　　传统相声 《八扇屏》　郭德纲　李文山　　相声小段 《推车》　　　徐德亮　　快板书　《奇袭白虎团》　梁厚民　　群口相声 《卖马》　　　郭德纲　王文林　张文顺　　助阵演出的梁厚民先生是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当天表演的《奇袭白虎团》当年由他首唱并举国皆知。电影《没完没了》里，曾经当过相声演员的傅彪还打着“七块板”演唱过其中一段。　　而郭德纲演出的四个段子中，《学西河》属学唱为主的“柳活儿”，是他常演的保留节目，很多前辈演员如天津的于宝林、北京的郭全宝等人都曾表演过这个段子，但郭德纲曾拜师天津的金文声先生学习西河大鼓，所以能够真刀真枪地在台上手执鸳鸯板、打起鼓套子、跟着弦师唱起正宗的西河大鼓书来——这在当今的相声界没有旁人可以办到；《双学山东话》脱胎于传统相声《学四省》中的学说山东话一段，郭德纲除在其中加入大量新的包袱外，甚至还加入了一些颇具无厘头精神的元素——他扮演的有钱人身穿长衫头顶礼帽，脖子上的白围巾则是用卷筒卫生纸代替的，演到一半嫌那围巾长时还会当场揪短一截；《八扇屏》是传统相声的经典作品，以行云流水的大段“贯口儿”见长，郭德纲从小学评书，这一段又是常宝丰先生给他开蒙的段子，自然驾轻就熟；而最后一段《卖马》是歪唱京戏《卖马》的群口“腿子活”，当年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大师曾合演过并有录音传世，郭德纲在广德楼就曾搬演过这个段子，其中秦琼的几句唱词：“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郭德纲第一句学余派、第二句唱谭派、第三句用言派，第四句又变成了麒派，之后几句又先后转到评戏、河北梆子……每唱一句台下便炸出一片叫好儿声，至于后边唱着好好的《卖马》突然串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黄鹤楼》甚至“卖布头”里的吆喝声，每个包袱都堪称奇绝火爆——一场演出里放进这么多有份量的好段子，占够“说学逗唱”四个字，郭德纲是铆足了劲了。　　相声大会的声势愈发壮大，茶园经理也不断要求增加分账的份额，先是“三七”，即所有门票收入后台三成演员七成，后来

逐步升格为四六、五五，而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倒二八”，演员二成、剧场八成。当时的票价是每人十元，即使每天都能坐 150 位观众，按倒二八的分账比例，后台十几位演员总共也只能分到 300 块——每人不到 20 块钱。　　郭德纲说：我不干了。　　在华声天桥停演约一个星期后，郭德纲来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找朋友串门儿，得知这茶园除了每天晚上接待一些来北京的游客，演一些顶伞、古彩戏法之类的节目，大部分时间都闲着，便有了在此继续把相声大会办起来的心思。他找到负责人去谈这事儿，竟然很顺利的就成了。一星期后，2004 年 10 月 23 日，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易址重张。　　北京文艺台相声节目《开心茶馆》的节目主持人大鹏在天桥乐茶园的北京相声大会开演第二周，也就是 2004 年 10 月 30 日，就赶到了这里。据他回忆，当时台下也只有不足三十个人。大鹏此前曾经到过华声天桥的相声大会演出现场，并且有过要在现场录音后在节目中播出的想法，但当时后台的设备达不到录音要求，而这次的天桥乐茶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录制了现场演出录音，剪辑后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一周后，北京相声大会再演出时，台下人数增长到大约六十位了。　　直到 2004 年 11 月 27 日，一场名为“传统相声濒临失传曲目专场”的演出在天桥乐茶园上演，之前的几天，郭德纲以及张文顺、邢文昭等几位演员被大鹏请到《开心茶馆》节目的直播间，进行了一期直播访谈。几天后的这场演出，台下坐了二百多位观众——这是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后的第一次爆满。　　一周后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则又是一场爆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当天有一个观众自上海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 2005 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 年 12 月 4 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 90 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图）

追我魂魄一名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云杉

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　　——穆易　　　　序言　　　　我承认，李营长、兔唇和培蕊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无从捉摸而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存亡未卜，连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世都渺不可考。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培蕊在太行山麓留下的那张照片，因为新华社一级技师的精心补救，培蕊年轻的面容才从褪色的底版上浮现出来。我首先惊讶的是她的年轻和美丽，而这两样东西是极具穿透力的，它们穿透了六十年的岁月，带着莫名的活力，浓雾般的包围过来，这使我为她的死亡而伤感，并且认为，她的青春和美丽因此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培蕊的八路军装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浓重，仿佛是黑色的，而她身后的太行山，却因为照片的老化，显得

云雾飘渺，若远若近，就像我现在看见的那样。　　　　我和民俗研究会的老铜寿爬上十字岭的时候，铜寿已经气喘嘘嘘，于是那一口山西话就越发显得缠绵：“就是这儿了唉就是这儿了！”　　秋天的暮蔼已经重重叠叠的浮动在山坳和远方，山的浓绿和峭拔都变得恍惚，而远处那个叫做南艾铺的垭口，笼罩着淡青色的雾气，半隐半现，美如仙境。我无法想像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厮杀，数千手无寸铁的八路军机关人员、文工团员、学生和新闻记者，在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的追杀下拼死突围，掩护这些人突围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些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我想那一定是天地为之动容的场面。　　当年的通讯员王俊说他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阻击敌人的阵地之间疯狂穿梭，报告总部和人们的突围情况。他说李营长站起来把肠子塞进了被弹片切开的腹部，好像卷起来一条垂下来的皮带。　　王俊说李营长还问了他一句话，然后他露出了悠然神往的神情。他又补充说这句话其实无关紧要，你可以从文章中把它删掉。　　“鲁艺的同志都冲出去了吗？”　　　　一　　　　为了一张照片去寻觅一场战争——新华社这次忘了哭泣——铜家峡惨案——爱也如渊，恨也如渊　　　　人生有惧，便曰浮生。我怕开会。风闻开会，整个编辑部就忙碌起来，做好应付一个冗长、乏味下午的种种准备。编辑和记者们携巨型水壶、保温杯，席卷半个编辑部的茶叶，暗藏治疗颈椎病的棒状仪器，宛如一支准备穿越沙漠的驮队。待尘埃落定，会议开始。编辑部主任姓罗，高个儿，有点胖，露出一脸端容，左右睥睨鹰视，见无人做小动作，便掏出一大叠纸头，张口便念。　　我见众人都葱笔价矗着头听，心里直抱怨：为什么要长篇大论的念呢？难道编辑部还有不识字的吗？又细看罗总编，觉得他长得有点儿像佛。如此这般，瞌睡上来了，朦胧之中已不知身在何处，仿佛觉得罗总编用手拍桌子，厉声道：不许睡觉！我在梦中惊跳起来，大叫道：我没睡我没睡！人们正木着脸听罗总编口干舌燥地念，忽听我叫得奇怪，都楞了一下，方恍然大悟，都哄笑起来。我正没法可处，天籁似的，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接电话！　　电话是资料室的管理员打来的：“那张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个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难。”　　管理员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就在这儿，你来一趟吧！”资料室在地下室。宽阔深邃的大厅里排满五六十年代那种深黄色的木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书柜的中间，和管理员说话。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从塑料夹子里取出那张照片，我猜想这个人就是穆易。　　他转脸看见了我。他脸上有一种沧桑的、聪颖的神情，这种特别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战争，他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 1942 年拍的，没错。”他把照片翻过来，上面有一行变成黄色的钢笔字：培蕊，1942 年 5 月，太行山，年 17 岁。　　“这些字是，我写的。”　　我们走到书柜后面，那里有一张书桌和两张单人沙发。　　“她是鲁艺的文工团员，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照片已经无法送给本人，我就会记下来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 年五月，太行山，年 17 岁。　　这些字迹确实散发着伤感的气息。　　“我是那年五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的时候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 年五月，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

被包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写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决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像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记实》）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2）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对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念念不忘？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怀，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岭。　　铜寿是省文史办的人介绍给我的。他们介绍说，县民俗研究会长铜寿是太行山下的铜家峡人，是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写的《晋中情诗》、《谈鞋论袜》堪称民俗研究文学的精品。他说不定会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挥洒自若的民间艺术家，身穿大红套头毛衫，他听到我的采访目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鼎力相助。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县招待所空荡荡的大厅里蹲着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态不那么恭敬。他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估摸是你哩！”　　他身边放着一个油腻腻、鼓囊囊的大书包，露出纸夹、笔记本什么的，脚边是一只补缀过的网兜，装着饭盒和水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有甚事尽管说，能帮上就帮上。”他不卑不亢地说。　　没有比这场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无人的从大书包里把一卷卷揉皱淋湿的稿纸、笔记本掏出来，摊在茶几和地上：“不碍的，你说。”　　我刚想说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叹，口中啧

啧有声："你说可巧不可巧，下车就来了雨了！" 民间艺术家想继续惊呼，看了看我的脸色，不做声了。那些稿纸虽然淋湿了，可还看得出是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约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类。我向来觉得这种东西古怪，今天格外觉得烦恼。铜寿仿佛觉得有些歉意，对我解释说："都是难得的，唱家越来越少了。这是老羊倌儿唱的，你听听：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头， 妹住九十九道沟下头， 哥想妹妹想得紧， 百丈崖头跳下来。" "好是好的，"我勉强笑道，"只是再见面，岂不是拄拐了？" 民间艺术家紧紧闭上了嘴，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经决定和这位只会吟弄情诗的窝囊艺术家分手，直奔县政府党史办公室。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我饥肠辘辘，我突然说吃饭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面。铜寿沉闷的脸似乎开朗了一下，说："这话对。北京的面条儿算什么呢，糨糊！" 铜寿指点的那家小铺在一条矮巷的尽头，铺面很小，三张红漆桌儿。在白腾腾的蒸汽后面，铜寿脸上的不快已经消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资料馆找找，毕竟年头太久了，这不是歌儿，不会传下来的。" 我喝着汤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是歌呢？" 铜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又开始吃饭。 "再说，我要鲜活的材料，过去的资料太不够了。"我问他，"你不是铜家峡人吗？那里不是太行山区吗？" 我似乎觉得他的身体收缩了一下。 "哦，不错，"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铜寿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记得新闻系的老师讲过，这是典型的身体性语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么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谢记者，真是对不起，我想来想去帮不了你什么忙。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么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 如果说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和铜寿分手的话，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我逐渐感到好奇。我感到铜寿坚硬的眼神后边，他的灵魂象一只悲凄恐慌的小老鼠，伸出头来说：不要碰我！ 夜里十一点，我拨通了穆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可是我心情沮丧，一大杯速溶咖啡让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对这次采访都充满怀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愚蠢、可笑和冲动的。我为什么冲动呢？为了六十年前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吗？我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她。 "顺利吗？"穆易的声音清醒有力，看来他还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 我报告了在这里的情形，但是我特别倾诉的是我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来到太行山采访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的时候，这种困惑走到了极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惧。 "如果我到太行山贩卖柿子，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实干的人，但是我寻找的是一场过去的战争，哪怕它是史诗，别人也会认为我是脑筋有点儿问题、不切实际的人"。 穆易好像没有听我唠叨："你刚才提到铜家峡，这位艺术家是铜家峡人？" "是啊，怎么啦？" "他没说错，"穆易斩钉截铁的说，"1942 年，也就是总部突围那一年，铜家峡二三百口人全让日本人杀光了，这是一件有名的惨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问，"你的意思不至于说铜寿是一个鬼魂吧？" "当然不是，"穆易说，"我是说他没有骗你。这个地方后来就荒芜了，如果有人，也是解放前后陆续迁过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了解情况。" 我突然惊醒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突然感到恐惧，怔忪之间，突然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哀嚎！非常清晰，仿佛在我的身边，又仿佛在不远的什么地方。那声音那么悲伤，那么恐惧，使我情不自禁的颤栗了一下。我拧开灯，声音消失了，四周充满寂静，我可以在这种寂静中听到我的心跳。后来我一直回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让人无法相信一个活的生物，会发出这样的悲鸣。那一刻，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在沉沦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让人血液凝固的声音。 我冲出门，过道是昏暗的，只有门洞里亮着一盏灯。我忽然想起，这个招待所里人很少，这层楼里可能只住着我和铜寿！我想起救星似的大喊起来：铜寿！铜寿！我背后的一扇门打开了。铜寿伸出头来看我。 一切都很安静。我听到楼梯上女服务员说

话的声音，还有人边走边打哈欠，那可怕的声音没有了。　　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感到铜寿惶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该睡觉了。”他说。　　早餐的时候，铜寿对我说，他要赶八点钟的长途汽车。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突然感到歉意，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因为朋友的一个电话，就不得不做他没什么兴趣又力不能及的事。我说：谢谢你了，以后到北京去玩儿吧！　　铜寿沉默了一下，他的脸色似乎更憔悴了。　　“我到铜家峡就打电话给你。可能有一个人知道你想了解的事儿。”他说。　　“谁？”　　“杨太婆。她是铜家峡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铜寿往门外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我有很多年没有回铜家峡了，我只能试试看。”　　铜寿走后不久，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粗喉咙大嗓门的叫我名字。跑下楼一看，服务台那儿站着一个留平头的男人，手里挥舞着一卷纸，他说他是县政府的，给我送一份北京的传真。　　没想到是穆易发过来的，他真有点钻头觅缝的办法。　　这是一份 1942 年《新华日报》的影印件。上面写着：　　日寇制造铜家峡血案真相　　记者陈辉报道：5 月 29 日，日寇在对我大扫荡中，屠杀了太行山铜家峡村 215 名村民，其中有几个月的婴儿，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晋冀豫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昔日安祥的铜家峡，已变成一片焦土瓦砾。记者赶去的时候，焦黑的废墟还冒着呛人的清烟。这里躺着二百多具乡亲的血体。　　在水井旁，一位怀抱幼儿的年轻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她怀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视着母亲。村长郝玉生的遗体散落在村前的河滩上，已经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惨不忍睹。看到这惨景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　　要告诉大家的是，铜家峡村的二十万担八路军公粮，一粒也没有落在敌人手里！“我找到杨太婆了，她在等你呢！”　　铜寿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晰，我甚至能听出几分激动。这有点不像我认识的铜寿。他告诉我，杨太婆就住在圩头镇，离县城不过十几里，他反复叮咛我去找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姓肖的人，是他的朋友，从他那里可以借一部车，送我去圩头镇。　　我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还有很嘈杂的人说话的声音，仿佛在议论什么，我听见铜寿很权威的喝了一声：没有问题的！然后铜寿对我说：听见了吗？这里下大雨呢！你不要坐长途车，我们会在路口等你。　　我们？还有谁呢？我心里有点疑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铜寿开始接受我了，这使我心情大为振奋。我和肖——很巧的是，他就是给我送传真的年轻人——去圩头镇的路上，他一直在谈论铜寿，他好像很惊讶我用了什么办法把铜寿动员起来。　　“铜老师从来不这样，”肖说，他把破旧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他只关心民间艺术。什么刺绣啦剪纸啦等等，还有民歌，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很低调，不大和外界来往。”　　肖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很开朗。他把铜寿形容成带有神秘气质的艺术家，他特别欣赏铜寿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态度，他说这是一种境界，普通人无法领会的境界：文雅，优美，忧伤。　　肖告诉我，铜寿是他的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当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机关干部。可是他在哪儿也待不长，一直到他回太行山，才安定下来。三十多年了，一直做他的民间艺术研究。老婆没跟来，离婚了。现在的夫人是很贤淑的农村妇女。　　我们的车在山路上蜿蜒而行。空气清馨而潮润，起伏的太行山岭层染着火焰般的红色，美丽得令人惊叹。　　“这不是枫叶，”肖解释说，“学名好像叫栌。这种树越往山里走越多，尤其到了深山里面，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过去，好像血那样红呢！”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3）（图）

二　　　　杨太婆语出惊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鱼肉——孙二水留不住程长官——一溃千里的中国军队　　　　车到路口，果然看见铜寿在雨中等着，旁边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便欢呼起来。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远远的就伸出手来，说：你们早应该来呀！　　铜寿好像活跃了许多，脸色泛红，一一介绍，那高个子叫广元，上角村的民办教师，是个业余

作家，其余两个人是镇文化馆的，都是太行山区的人。他们热情而开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历史自豪。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冲出来的黑马了。　　我们是在路旁的小饭铺开始这场令人兴味盈然的谈话的，从记者的角度说，这是浪漫和现实、悲伤和神奇交织的前所未有的采访记录。广元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书《热血集》，准备自费出版，“我养了一群羊，把羊子卖了，就够两千元出版费了。”　　然后他开始历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扫荡啦，神枪手刘玉堂啦，还有铜家峡。但是在他的讲述中，铜家峡不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是和一个叫黑村长的人有关系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长押到河滩上说：把八路的公粮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了！黑村长掏出小烟袋锅儿，不紧不慢的说：死不死的不要紧，先给我把烟袋点上！鬼子队长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翻译官赶紧颠颠的过来了，黑村长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骗出公粮呀，没办法，只好自己来点火了，黑村长抽了两口说：捺紧点！拿着鬼子的手指头就当烟签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广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镇文化馆的两个人想补充什么，广元不容置辨的说，“黑村长死了，谁看见了？前些年老人们不是都传见过他？这事我从小就听说过。”那两个人不说话了，看他们的样子，我猜想这样的争论经常发生。铜寿一直在吸烟，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问他：“黑村长是谁？”　　铜寿说：“郝玉生。”他静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郝玉生死的时候不是全尸，老乡们一直传他活着。”　　杨太婆的家就在镇上。一个很普通的小院子，种满了丝瓜和葫芦，绿藤缠绕，果实累累，显得很有生气。我坐在门槛上，听老人叙述六十年前的往事。她说到铜家峡的时候，眼光就会深深的从那青翠的小院子望过去。　　杨太婆因为耳聋，声音便出奇的响亮。“黑村长呃，”她说，“论起来，还是我没出服的堂叔。好个火爆性子人呢！那一年，他硬是不叫八路军吃饭，把人家的锅给挑了！”　　众人意外。坐在门槛上的广元断然道：“你老人家糊涂哩！”　　“我咋糊涂，真事儿么！”杨太婆反驳说，众人的讶异使老人有些自得起来，我忽然觉得当年的杨太婆，一定是个俊俏伶俐的小媳妇儿。“俺叔听说李营长他们吃完了大萝卜，还要吃焖山药，脸就黑沉沉了，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众人拉也拉不住，俺叔抄起一根顶门棍儿，直嗵嗵跑了出去。”　　“李营长他们没进庄户院，野地里架上一口锅，带皮焖些山药，俺叔，他老人家，吆吆喝喝跑上去，一棍把小锅挑了多远！”　　广元脖子上的红筋绽出，纳闷而诧异的听着。　　“后来那年，李营长和日本人在山上打上了，满山枪炮响……呀，兔唇那娃，掂着俺叔的土铳就上山了……”　　杨太婆的目光向青翠的小院子望去，她太老了，我看不清是悲是喜。　　　李营长、兔唇和黑村长穿过六十年的迷雾，终于出现在我的记录中了。关于李营长，我们所知甚少，比较确切的是，他当时是八路军 129 师 769 团的营长。广元因为黑村长挑翻了李营长的山药锅而懊恼，我说我完全理解黑村长的心情。　　我是和广元在清远寺那间冷雨敲窗的客房里谈论这番话的，那天我们就宿在镇外的清远寺里。山雨蒙蒙，我们从窗外只能看到清远寺拾阶而上的朱红回廊，油漆剥落，非常触目。当年这条回廊里挤满了避难的百姓，他们无处可逃，便躲入了寺庙，庙外枪炮之声不绝，庙内妇孺哭声震天。清远寺的住持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出来安抚众人：这是佛门净地，日本人不敢来的。接着他拔步曳衣，喝令手下：快快关上山门！　　这一切在广元的叙述下栩栩如生。我好像看见那个穿着灰色僧衣的年轻人目光坚定，他相信佛门能隔绝屠杀。铜寿一直在看那部黑白小电视放的怀旧电影《茶馆》，这时候他突然闷闷不乐的说，我每次听王利发的那句台词，就会掉眼泪。我们中断了谈话，回头看他，铜寿说：中国的老百姓呐，盼哪盼哪，就盼着一个能做主心骨儿的政府，盼着这个政府说，咱们苦也不怕，难也不怕，要死死在一起！　　房间里突然静默了。我想到刚才的话题，问：“后来怎么样了？”　　傍晚的时候，山门被撞开了，冲进来一队鬼子兵。年轻的住持跑过去，挥舞着双手，想说什么，为首的鬼子，只一刀，把他从肩膀劈成了两半。　　天真的和尚。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4）

杨太婆说那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自己像没娘的孩子。我一直觉得杨太婆的这句话深奥无穷，因为它可以诠释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谣：大官儿包金裹银，小官儿拔锅卷席，小百姓哭栖惶看天望地。大小官员跑了个罄尽，跟着潮水般的难民后面，就是如入无人之境野兽般的日本兵。太行属晋中，县城不大，也有几十户店铺，不少士绅人家，觉得无处可逃，当地一位名绅温显忠老先生，慌不择路，带着病妻到山中避难，却撞上了一队日本兵，日本兵先用刺刀一阵乱捅，杀死了温老先生，又强奸和残杀了那位老妇人。消息传来，县城里的，士绅们便像塌了天似慌作一团。日本兵奸杀劫掠的消息虽然比比皆是，但士绅们在慌乱中还有一些安慰，认为只是对小百姓和“暴民”的，中国人尚中庸之道，商会会长丘立本侃侃而言：谁来了不纳粮？我忠厚传世，诗礼之家，又怕谁来？到了这时，丘会长也慌了神，独自捶胸大叹：咱中国的军队去哪里了？　　恰逢其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某部奉命弃土南撤，路经县城。带队的姓程，保定军校毕业，原也有一番报国之志，只是看到大官小官跑得奇快，便想：识时务为俊杰之人。但一路撤下来，心中不免有些赧然，因此约束部下，并不十分薅恼百姓。程长官原想在县城略事休整便走，没想到城门大开，城中鞭炮齐鸣，缙绅百姓列队欢迎，程长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一个胖子就跄踉上前说：大军一到，救民水火，解民倒悬呀！　　接着大摆宴席。原来丘会长早看出这队伍待不久长，心里有个计较。丘会长有两个女儿，都在太原读中学，如今避难在家，成了会长的心头病。会长见程长官三十来岁，人物也还整齐，就想把程长官入赘在家，一来，留住队伍，二来女儿也有了着落，强如受了日本人的害。丘会长原也是有些怕兵的，更不知如何与兵们“沟通”，忽然想起会里有个帮闲孙二水，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就和孙二水面授机宜，让孙二水陪说，用现代话说，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翻译。　　孙二水也是一头雾水。照他的理解，把普通的事情，说得粗俗俏皮，就是和兵们“沟通”。饭桌之上，程长官对着满桌佳肴并不动容，只是略动了动筷子，就放下了，见商会的人抬着猪、羊、瓶酒进来，就说国难期间，何必如此？丘会长听了，心中越发敬重，心意已决，桌下踢了踢孙二水。孙二水便凑近程长官，一脸暧昧笑容，说程长官您不想找个女人吗？……呵呵！手还在空中打了个榧子。程长官笑了笑，说兄弟不是这样的人。　　孙二水说不是一般的女人呵，是会长的令千金。丘会长的脸早像红布一样了，他怕孙二水说得更加不堪，狠了狠心，把一盒子银洋细软推到程长官的面前，说：“不知长官有无家室。虽然是小地方，弟兄们的饷粮，统统在鄙人身上……”程长官心中了然了。他已经有四五个老婆，撤退之前，他想让女人们各自随娘家逃难，没想到话没落音，大老婆就揎臂扬拳的吼起来：自己兔子似的溜了，剩下老娘们谁管哩？女人们又抓又咬，把程长官按倒在地。程长官勘定内乱，着实费了工夫，现在如何敢再揽揽女人？再者，一头毛驴能驮三千现大洋，驮女人只能驮一个，这个账谁也算的过来。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程长官含糊应道，“留或不留，需要请示上峰。”　　众缙绅见程长官没有封口，各自欢喜，便安排下去，叫各庄户筹集军饷。　　村里庄民们直忙乱了一夜。第二天，铜家峡的人抬着肥猪粮草走到半路，只见社首、保长气吁吁的赶来，面如死灰，拍膝打腿的道：罢了罢了！原来，程长官的队伍半夜就溜了，丘会长带着人追到城外，哪见半个人影？社首等人去时，丘会长正在城门口跳脚大骂。社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说着说着，流下泪来，说：回去和大家说一说，有投奔的就寻个活路去，我不信天塌下来能把人都砸死？程长官走后十几天，铜家峡人在村口看到了另一支队伍。杨太婆还记得，那是下午时分，这支队伍人不多，大约一百多人，衣服破旧，乌眉黑嘴的，但是精神饱满，模样也和气。他们看见村里人站出来看，就高兴，起来，吆喝着：“乡亲们！我们是来抗日的！”　　带队的是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黑眉毛，模样很秀气。他看见村民们伸着头呆看，脸就有点红，低声

说：跟上！队伍走整齐！这几十人踢踢塌塌跑起来，队形一阵大乱，情绪却格外激昂，呼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工农是一家！　　村里人没见过这形态，都张了嘴瞧。女人们就嗤嗤的笑起来。这一笑，便将几个月来铜家峡的愁云惨雾吹掉了不少。据说，村东头那位算命瞎子已经把老婆遣走，原打算后半夜悬梁自尽的，也把绳子解了下来。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自芳爱民模范团，英名远播，可是当初并没有那样风光。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南逃，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参加了八路军。可是这些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却从来没打过仗，连枪也没摸过。八路军 129 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军事干部，姓李，给这支队伍做营长，算起来也不过半月的时间。　　李营长和他那支热情高涨、缺乏训练、又雄心勃勃的队伍走入铜家峡人的视野时候，仿佛命中注定，要和铜家峡人产生一段生死与共的情缘。铜家峡的人们是如此期盼一支能抗击日本人的军队，根本没注意到，这支队伍的武器是多么简陋，衣衫是多么褴缕，不但不能和程长官的正规军相比，就连那些到处薅恼的国民党溃兵游勇都比他们阔气些。总而言之，铜家峡人被期望冲昏了头脑，一个有力的证明是：猎户郝玉生放下正剥皮的野兔，走进社首家的堂屋，蹲在地上抽起了烟袋锅儿：打日本的队伍呢，能不管些支应？　　“有了支应，兵们便不跑么？”社首用红红的眼睛看着郝玉生，“我是想明白的人了，蚁民，蚁民，百姓的命，和虫蚁一样哪！”家里的几个女人，正在进进出出的藏埋东西，连土炕上的席都揭了。社首家是这一带出名的俭省人，老婆和寡媳原本就穿得邋遢，如今除了八十余岁的岳母，老少女人们都用香灰和锅黑将脸涂抹了，又一道道的流下黑色的汗来，样子十分可怕。　　郝玉生便和社首、村中那些年高德韶的长者议定了，将还没有窖起的萝卜、山药送几担过去，一来这东西携带不方便，二来村中也赔送得起。　　　　这一仗打得日怪。可能连李营长也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和日本人交了火。那天上午，放羊的羊倌儿出去就看见了日本兵！羊倌扔下了羊，一口气奔，回了村里，刹时间，儿啼犬吠，村里人就乱成了一锅粥，那时侯还没有跑反的习惯，人们能想起来的就是关门闭户，有的把猪崽鸡娃都藏到了炕上。　　李营长带着人就出了村。他们刚隐蔽在一道山梁后面，日本兵就过来了，大约一百多人的队伍，刺刀和膏药旗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一刻李营长并没有开火的意思。他想观察一下日军的意图，而且，他的新编营也没有实战经验，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出击。　　有个队员可能太紧张了，身下的土块咕噜噜的滚下山道，日本兵听见了，用日本话哇啦几句，就向这边开了几枪。队员们一下跳起来，大喊着：打呀！打呀！七手八脚就开枪。李营长按下这一个，又跳起了另一个。日本兵的子弹已经像飞蝗般的射了过来。李营长一面组织他们向山后撤退，一面举枪还击。这一仗来的快去的也快，日本兵开了一阵枪后也没有追来，继续沿着大道向西而去了。　　到了日西时分，这一仗已经绘声绘色传遍全村了。村民们这时并没有任何褒贬意思，只是客观的评述：好像土坷拉惊起一地麻雀，扑楞楞的四下里飞哩！　　郝玉生一直没说话，沉着脸听人们的议论。不时有小青年来报告李营长他们的动态：　　“……进村了。”　　“那些些萝卜都吃了，带皮吃。”　　“……现在点火呢，要煮山药。”　　“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郝玉生怒气勃发了，一阵风似的冲出门，于是，那口刚冒热气的铁锅，跳了几跳就滚下山坡，在李营长他们心里撞出一声巨响。　　　　铜家峡在惊悸过后又恢复了平静，炊烟开始悄悄的漾出。　　李营长在村口看见了两个女人，社首的妻和童养媳出身的寡媳，她们抱着一只死鸡，蹒跚的走了过来。　　“他叔，”老妇人木木的在李营长面前站住了，“鸡也遭罪哩……”她的儿媳有些智障，眼泪在家兔般温顺的眼中滚动：“他叔……”　　她们听到日本兵的消息后，魂飞魄散的逃回屋中，并且把那只下蛋的母鸡也抱到了炕上，鸡吱嘎乱叫，慌乱之下，两个女人用破棉被捂住了鸡，鸡扑腾几下，不动了，待风波过后，鸡已经直挺挺的死在了炕上。　　惊恐又六神无主的两个女人向门外走去，也许，她们只是想找人诉说诉说。村口荒凉的大道上，一动不动的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李营长。　　她们的脸上涂满煤烟，花白的头发随风飘荡，在夕阳下怪异而丑陋。她们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热泪盈眶。　　这一幕

使李营长永志不忘。王俊说，它碰撞了一个男人最深沉最温柔的情怀，激起了一个军人最壮怀激烈的感觉。　　“你越说我越不懂了!”我对王俊说。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5）(图)

三　　　如幻如梦谈英灵，王俊追怀当年事——花梨儿这次拒绝当积极分子——黑村长的哲学思考，子弟兵能不能得到爱情信物　　　我去见王俊的时候，感觉到我已经推开了这所尘封六十年的大门。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种直觉从来没有骗过我。　　这是闹市中的一处干休所，青砖青瓦，多少有些破败了，可是很洁净。一个白衫白裤的小老头儿，把一盆洗净的黄瓜和西红柿放在我面前。　　“吃吧，”他说，“我种的。”　　他给人很洁净的感觉，包括他的眼神。现在我能在人群中准确的把这样的人分辨出来，这好像你在大海中很难发现一只海螺，可是当大潮已经退去，只剩下丑陋干涸的沙滩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了。　　对我的职业来说，这很运气，这样的人往往会出人意料的坦荡。　　“你想知道什么？”　　“你经历的事。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你的感受。”　　他注意的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起来。　　“你的要求特别，我正想拒绝你呢。当时我还不到十六岁，入伍刚三个月。对于当时部队的情况啦，日本人的进军路线啦，我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我还是解放后看到有关的回忆文章和史料才了解的，有我们的人写的，也有日本人写的，”王俊静默了一会儿，“看来谁也没忘掉。”　　“你对这次突围战斗的印象特别深刻吗？”　　“当然，”他看了我一眼，“许多年后还会梦到，有时候觉得像昨天的事一样。”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是徐缓的、轻松的、漫无边际的交谈，我关闭了录音机，也不再记录，我知道这会使人更加放松，我吸起了一支香烟，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在采访对象面前吸烟的。“吸烟不好，”王俊告诫说。　　王俊好像一直在沉吟着什么，后来他果断的站起来，找出一个旧的，大牛皮纸口袋，掏出一迭稿纸。题目写的是：《怀念李营长》。　　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王俊一直坐在院中的小凳子上，慢慢的咬着一个西红柿，我看不清他的神情。　　李营长：你想不到吧，我在离休之后，年年都回南艾铺。我一直有那么个愿望，你还活着，我们会碰上。有一点很可惜，我那时候不认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营长，你是叫李应呢，还是英或者颖？你在八路军战伤医院学会的那四十八个字，都教给我了，可是每次打完仗我就全忘了，我对你说我一紧张脑子就变白了。你为这事还狠狠的训过我，就又教我一遍。可最后一次突围咱们再没见过面，现在我只记得：农工农工，镰刀斧头，为我农工，谋求幸福。如果不算重复的，你教我的四十八个字里，我还记住了十二个。　　另外，我知道有一件事你还会惦记着，就是会唱《清水河》的那个姑娘。我在解放后打听过，也问过原先在鲁艺剧团呆过的同志，有一位大姐说，记得记得，这首歌我记得，是从红四方面军那边传过来的，可是会唱《清水河》的演员那么多，是哪一个呢？红四方面军是从大别山区出来的，那是你的老家，你说过你的老家没人了，都让白崇禧杀光了，就剩下一首歌了。　　李营长，我告诉你鲁艺剧团的全冲出去了，我说得是假话，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你问我的时候，我看见你用手捂着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想让你高兴一点儿。我一生就骗过你那么一次，原谅我吧，营长！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这次战斗，它甚至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我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红色和黄色，地面在爆炸声中不断的颤抖，还有那么多鬼子兵，一定有几万人吧，黑压压的，漫山遍野的拥过来，可我们这支被总部临时发现的作战部队，还不足三百人。　　我们的阵地就像海面上的一叶孤岛，我看见日本兵在追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志，我们的兄弟姐妹，我分不清我的脸上流的是汗还是眼泪，我紧紧跟在你的背后，鼻子都快戳在你的背上了。你对我大喝一声：王俊！这时候，我看见整棵炸飞的树从你身后飞过去了，我不由自主的闭了一下眼睛。你肯定看见了，可是你只对我吼了一声：来点精神！　　营长，我感谢的是你

一直看出了我的胆怯，但你没骂过我一声“胆小鬼”，你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成长。后来我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多次立功受奖，我敢说我是很称职的一个战士了，我没给你丢人，营长！　　说说我自己的事吧。我后来结婚了，是战友介绍的。当时想考虑考虑，战友说女方已经看上了，你还想满世界挑呀！正碰上入朝参战，我想营长连个老婆还没有呢，你挑什么挑！嘎吧一声就答应了。　　我老婆人也不算差，就是心眼儿窄点儿，前些年还没什么，现在这么个大环境么，就经常跟我闹上一闹。　　主要问题是，我当了这么些年领导干部，既没有多挣钱，也没安排好家里人的事。我大儿子是国企的干部，厂里效益不好，厂长径直来找我，要和我合计一件事儿。这件事，这么说吧，就是国家吃点亏，部队吃点亏，然后个人能捞一大笔。他早算计好了，捞完了钱，两手一拍就走人，把烂壳子扔给国家，把几千工人扔在马路上。他的哥儿们早给他注册了一家私企，他摇身一变又是老总。他还说：你有关系，我有钱，老哥，一起干吧！我心里气得发怔，他怎么敢？怎么敢？这是内奸呀！可我还得客客气气把他送走，这样的人太多了，用机关枪也扫不过来呀。再说，儿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果然，没多久，大儿子就下岗了，人家的事也照办不误。这一下，我老婆那个闹呀，说我把儿子害了。过去，她提起我，还说：王副军长，人是倔点，可是实心眼儿。现在呢，也不管有人没人，你脸上下来下不来，直嗵嗵就来一嗓子：我们老王，副军级，不是什么什么猫捉什么什么鼠么，他是一只鼠也不捉，老瞎猫！　　我也不是什么高风亮节。想给家里人办点事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想。想挣钱吗？想。尤其我那个大儿子，当年征兵就是硬让我卡下来了，他视力不成，不符合条件。儿子那时候很理解，一句话没说在农村待了八年，后来选调到工厂，干得不错。可是现在呢？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来来去去就像没我这个人似的。我气闷，营长，我心里气闷哪！　　营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一个年轻人走到社会上碰到的第一个领导很重要，你要是颗沙子，他们就往心里装颗沙子，你要是颗水晶珠儿，他们就往心里装颗水晶珠儿，大环境咱们管不了，我就是想当那颗水晶珠儿，营长，我错了吗？　　营长，你可能会笑我吧，我现在老了，真想你哪！我真想跟过去一样，紧紧的跟在你的背后，我盼望你像从前一样大喝一声：王俊，来点精神！我渴望再一次回答你：是，营长！　　　你的通讯员　王俊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6）

我从干休所出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天色昏暗，远处的高速公路和大楼好像浸在灰沉沉的墨汁里，点缀着无数灯彩的摩天大楼显得妖异而华丽。　　我沿着马路茕茕的走，也许我那灰溜溜的样子太引人注目，好几辆出租车都在我旁边停了一下，我挥挥手，车又开走了。　　我想一个人静静的走一会儿。　　我一直走到我的住所。大楼外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我走过去，那个人抬起头来。　　竟然是铜寿！　　“怎么会是你！”我一下高兴起来，“嗨，你喝不喝酒？我请客，请你喝酒。”　　“看样子已经喝上了，”铜寿闷闷不乐的说，“你那篇报道，怎么样了？”　　“没有忘老区人民的嘱托，”我开玩笑说，然后一前一后的上楼。　　果然，铜寿一进门，就被墙上培蕊那幅大照片吸引住了。这张底片的质量不好，放大后的效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培蕊年轻的脸和眼神有了一种冰雪般晶莹剔透的感觉，纯真美丽，亦幻亦真。到我家里的客人都要问我：你是为了这张照片跑到山西左权县的？我说是，他们就点头，表示理解。　　生亦如歌，死亦如歌。铜寿说。不愧诗人。　　我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冷肉和一大匣带海苔的饼干。铜寿没怎么客气，就吃了起来，他说他一下火车就给我的编辑部打电话，没找到我，他，就找到我的住处，在门外等了两个多小时。　　“我在火车上一直思谋，谢记者一直没有消息，不会不写了吧？广元他们也问我，我说谢记者不像那种人。”　　“怎么会？”我连忙解释。　　“是了，”铜寿狡黠的望着我，“你白搭了单

位那么多盘缠，单位能答应你？”他得意的笑了。　　铜寿带来了一大包采访记录，还有杨太婆的几盒录音带。“广元这几年收集了不少史料，”铜寿的眼神似乎有点儿忸怩，“还有我写的。我在当地认识的人不少，你看看，也许用得着。”　　我有点儿惊奇的望着铜寿。他，身上那种不可理解的戒备、敌意甚至恐惧已经消失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铜寿本身就是一个谜。　　晚上，我在灯下翻阅，铜寿带来的材料，我不知道铜寿是怎样找到这些线索和人的，我想像铜寿瘦小伶仃，梭行于荒山野岭之中，他确实是收集民间素材的高手，这些史料的丰富出乎想像，它们像从长满青苔的古老城墙中渗出的水滴，缓缓的流出，汇集出一幅久远的画卷。　　现在，我如此清晰的感到了那场战争，我甚至听到了它的喘息声。　　铜家峡人从心底里接受了八路军，并且至死不悔，应该是在攻克马堡之后。　　这次战斗后来被作为典型战例，载入军事院校的教科书《战例简论》中。马堡是日本人在晋中修建的最大的据点和神经中枢，地下暗道四通八达，一直通进大山的深处。晋中马枋、羊泉一带上了年纪的村民，至今还对这个吃人魔窟记忆犹新。在马堡的周围，四处丢弃着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野狼白日梭行，日本人甚至用蒸笼将中国人活活蒸死。　　我翻阅这些史料的时候，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日本人的残暴，那种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肆虐的无耻。大和民族精致和清洁的特性，此时荡然无存，变质为一种促狭的恶毒，我一直弄不清楚这种邪恶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能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是中国政府的怯懦和令人无法理解的昏噩，它使我们在六十多年后仍然感到屈辱。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一抹亮色，那就是八路军。　　　八路军进攻马堡，肯定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策划，在某些关键的部分，是用分钟来计算的。1956 年版的《战例简论》中是这样叙述的：马堡是日寇切入到太行腹地的重要据点，防守非常严密，日寇吹嘘为永不陨落的太行之星。马堡方圆数里的树木、庄稼被日寇砍烧殆尽，一览无余，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岗楼上可以看到山脚的村庄，任何活动都很难隐蔽。前日深夜，八路军战士用长布覆盖身体，潜伏在据点前方至拂晓。凌晨开始降雪，大雪盈尺，日寇始终没有发现冰雪之下的八路军战士。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李营长等人选择了拂晓后进攻的方案。这个据点的日本兵在吃早饭的时候会穿上木屐，换句话说，他们既没有光脚，也没有穿军靴，而是穿着那种夹着脚趾，会呱嗒呱嗒响的怪东西，穿着木屐的士兵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如果换穿靴子就会给李营长他们赢得宝贵的几分钟。事后证明，李营长他们的设想完全成功，日本人的早餐哨一响，八路军战士从冰雪中一跃而起，冲向碉堡，当穿着木屐乱跑的日本兵组织起有效的火力封锁的时候，八路军已经冲入了射击的死角，接着两声巨响，碉堡的围墙被炸开了大洞。　　八路军拼死决战，日本兵拼死抵抗。　　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马堡的日本指挥官在大势将去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决斗。假若我们没有想到他对平民犯下的兽行，这种做法确实很名士派。他一眼睃见了在门洞下指挥战斗的李营长，或者他早就睃见了李营长，有了这种虽败犹荣的想法。他举刀向李营长冲去，大吼：你的！　　李营长显然没有闲情逸致，立刻举枪射击。不巧的是，弹夹空了。日本人脸上浮起轻蔑的微笑，把身上的手枪连套扔在地上，又说：你的，不是！　　这个日本人的意思大约是：你不是真正的军人，军人是不应该偷偷摸摸的袭击，应该光明正大的来决斗的。他要对方领教一下真正的军人的作法。　　李营长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一把长刀。　　两个人慢慢走近，四目交织，射出了狼一样的青光。　　日本人首先挥刀进击，刀法凌厉。此人坐镇马堡，决不是等闲之辈，他从军校、从战争、从俘虏和平民身上，早练出了杀人如麻的精湛刀法。　　李营长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从鄂豫皖根据地一路征战，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四年抗日战争，早已是百战之身。　　刀在空中撞击，几下之后，情势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在互相砍杀。日本人和李营长的强健和灵活大约难分高下，格斗的技能都臻炉火纯青，因此，他们都能躲开对方致命的一击，却无法躲开接踵而来的劈击。　　两个人的身上溅满了鲜血，双方的格杀已经显得沉重而迟缓，在早晨的细雪中，他们的身体好像包围着一团粉红色的雾气。　　这似乎是一场慢性死亡的比赛。　　日本人突然发出一声狂叫，神

经似已崩溃，他丢下刀，转身逃去，而且慌不择路，一头撞进了铁丝网，被几个八路军战士捉住了。　　　马堡的日本指挥官被俘后，方圆几里的老百姓都来看这个吃人的魔王。据说，他的相貌并不狞恶，中等个儿，高眉骨，皮肤有点暗黄。三十出头的年纪。　　部队领导怕出事，多派人押着车。　　人们虽群情激愤，但看到此人后反平静，只是有些诧异，“也是人样子哪！”　　这个日本人后来寡言罕语，一年后病死。　　他大约一直在思索军人的素质问题。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7）

　　李营长调回主力部队前夕，黑村长想为他娶一个老婆。　　黑村长是在自家炕头上谋划这件事的。猎户郝玉生被选为村长已经年余，郝玉生长得黑，人又侠气公正，村中无论老少都呼他黑村长。黑村长思谋一阵，又撮起嘴来感叹一阵：“就让李营长这样走了，直竖竖的？”“亲爹热娘也没有，还是孤人一个。”　　“李营长没有老婆，铜家峡老少爷们能睁眼说不知道？”　　黑村长想了想又说：我看花梨儿就好。　　花梨儿是远近闻名的巧手女子，不论绣花做样子，三村十八店的妇女没有几个能比得上的，人又要强，做军鞋送公粮样样都很争先。模样也很壮实，矮个子，红脸膛，用黑村长的话说，长得好。　　黑村长琢磨了一阵，心中满意，口里啧啧作响，不想正在灶下烧火的兔唇突然迸出一句：“我看不成的。”　　黑村长诧异的抬头，看见穿得泥鳅也似的兔唇露出一截黑细的脖子，正冷冷地望着他，不由扑的笑了，用烟袋锅儿指点着说：“你小小个人儿，懂啥哩？”　　兔唇的脑袋在灶台后晃了晃，不见了，只听见风箱拉得咣咣乱响。　　黑村长身边只有一个外甥女兔唇。兔唇父母双亡，生下来就是豁嘴，人却很机灵。她成年跟着荒山野岭里转悠，行事和打扮都像男孩子，村里瑞大娘提起黑村长就叹口气，说家里家外没个女人，这日子就过得难，也忘了兔唇是个十五、六的女孩儿。　　黑村长计议已定，便去找瑞大娘商量。瑞大娘一听，拍着大腿说：“可知好哩！她娘前日还找我商量，说花梨老大不小了，要有相应的，八字上也该合一合。我说现在进步了，不讲这个了。花梨娘赶紧说，有进步的，那就提提吧！”黑村长就表扬说：你这妇女主任，就是不一样呀！　　瑞大娘更高兴了，她思忖了一阵，说怕李营长不同意。黑村长一听就火了，说凭什么看不上花梨儿，花梨和他李营长，就是织女配牛郎。瑞大娘就批评说，你又说老话了，是一对积极分子儿。　　黑村长径自来到营部，对李营长说：“李营长，跟你说个事儿。”接着，黑村长沉了沉脸说：“我对你有意见，想来提了也是白提。”　　李营长正忙着，听了这话立刻招呼通讯员倒水，说郝玉生同志你坐，提意见怎么能是白提。黑村长担心李营长看不上花梨儿，先刹刹李营长的锐气，李营长果然软了下来。黑村长便说：“李营长你二十六岁的人了，难道嫌铜家峡的女娃们不进步？这两年少支援部队上了么？人家花梨儿就有想法。”　　李营长听得怔怔的，脸就红了，花梨儿是妇救会的积极分子，来来去去的，李营长是见过的。黑村长接着长篇大论的说起来，这一篇话说的空灵，但说得李营长直点头。黑村长说：男人家是什么？在人群里头，是压千斤的秤砣儿，大难临头，是主心骨儿。男人也是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男人要有家，要留下后代根苗。你活着，你死了，要有人惦着，要有人为你哭，这就是家。　　黑村长大功告成，丢下了脸红通通的李营长，扬长而去，他已经和李营长商定了，下半天的时间，花梨儿就来“相相”。　　　花梨儿不同意。　　黑村长半天没回过神来。一会儿，他才用手指着花梨儿说：“你这一回也要当积极分子嘛你！”花梨儿赤红的脸越发红了，她把头低下去。像许多性格执拗的女子一样，她一旦说不，就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　　花梨并非对李营长有什么恶感，只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和李营长联系起来而已。她想像自己的婚礼是隆重的、一丝不苟的，她无法想像李营长会怀抱大公鸡骑着毛驴去迎亲。她暗中倾慕的那个人，是临村的一位高小毕业生，这位学生在舅父

的店铺里打算盘的时候，一缕长发掉在眼睛上，脸上露出灰心的表情，花梨儿就喜欢上了他。日头已经偏西了，黑村长的心里开始焦躁了，李营长可能正在等着，而且，明天一大早他就回主力部队了。　　黑村长把小烟袋锅插在腰带上，在地上走来走去，每经过花梨的时候，他就张开手说：看看！看看！　　花梨开始呜咽了，声音由弱变高，断续成为悠长。黑村长突然站住了，大喝一声：别哭了！接着他说：算了，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但是有一件事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娃呀，你给李营长绣双袜儿，拿出你生平的本事来，一黑夜做妥了，明早在村头送送李营长。　　然后黑村长重重的叹了口气。大扫荡开始了，铜家峡不能让李营长就那样走了，他应该有一样东西儿，对男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女人的牵挂。那天夜里，黑村长翻来覆去睡不着。　　兔唇也没睡，后炕的土台上，那盏小油灯通宵亮着。黑村长爬起来吸烟，叹着气说："豁儿，你一黑夜缝什么呢？睡吧，别熬了。"　　兔唇说，舅，我点的是狼油。　　黑村长说：不知道花梨懂不懂事，她不会不绣袜儿吧？　　兔唇说：管她呢。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8）（图）

四　　　谈鞋论袜——诡异的日本杀人挺进队——千军危亡系于一线　　　绣袜在民间艺术中，含义是最丰富的，它已经超脱了服饰的概念，表述的是情爱。在这种表述中，婉约与奔放并存。　　一双满帮绣花的袜子，是神来之笔。图案和针法都有讲究，极工极细。据说，有绣上成出戏文的，如罗成叫关、西厢记等。我没见过实物，不敢妄评，这应该属于大师级的绣工了，但是一般的女性，都会做的美仑美奂，图案一般寓意喜庆、吉祥，也有直接表述情爱和鱼水之欢的，这样的图案包括喜鹊、蝴蝶、双鱼、鸳鸯、并蒂莲花等，我曾见过绣着一对上下翻飞的蝴蝶，长须互相缠绕，文思奇巧。还有一双袜子的底和面都绣满双喜字，笔画互相连接，每一划都非常清晰，这叫喜字不到头花样，袜子的中心留出空白，绣出一个白胖婴儿，这是新娘送给新郎的礼物，此时新娘肯定情思飘渺。　　相形之下，女性自己穿的罗袜就朴素得多，基本以针脚的繁复和细密取胜，如梭子花、对子花、罗纹等，而且，越是不大被人看到的地方，花样越是细密精致，这种隐秘的美丽是留给自己的。　　在根据地一带流行的军鞋、军袜等，属结实、耐用型，但是在布袜中，仍然能看到非常精致的花纹，也有用绣字代替图案，在字样周围缠绕细密花样。这里有根据地妇女对子弟兵关切、爱慕等等微妙含意，一般来说，越是细密的手工越带有更多的女性信息和情思。　　——铜寿：《谈鞋论袜》　　　李营长收到的并不是一双绣工精妙的袜子，他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名震四方的巧手花梨，是和他一样的粗针大线的缝纫水平。　　通讯员王俊有点儿奇怪，一向简捷利落的李营长，在村口的时候有点儿磨磨蹭蹭的，他说：首长，太阳快露头了，再不走容易碰上敌人了。李营长说：等等，等等。　　终于，李营长上了马，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这时候，村中的土路上，滚出一个小的黑影，拼命向他们飞奔过来，王俊定睛一看，是村长家的兔唇。　　兔唇喘吁吁的从胸口里掏出个白绵纸包，递给李营长："花梨给你的，"李营长就握在手里了。　　马儿得得的转着圈子，李营长好像还在等着什么，兔唇又说：花梨不来了，她磨不开。　　李营长说：回去吧，豁儿，天冷。　　兔唇说：李叔，还回来吗？　　李营长说：回来，回来看你们。　　兔唇说：我等着。　　李营长松开了缰绳，马就箭一般向前冲去。　　　李营长走的时候是二月，接着春天来了，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第五个年头。　　铜家峡天天能听到枪炮声，黑村长听见就说：豁儿，你李叔他们还在呢！　　说完了，黑村长就蹲在地上抽烟，他心里装着一件大事。　　铜家峡的后山里藏着二十万斤公粮，这是给八路军的。区长拉着黑村长的手说，听着，老郝，你给我放好了。黑村长说：命在，粮在，命不在，粮还在。　　新编营也走了，满山里跟日本人转悠呢，村里只留下十几个民

兵，黑村长心里空落落的。他能商议的就剩下民兵队长秋生。秋生是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小伙子，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区里还奖过他一支钢枪，上面有“太行神枪”四个红漆字。　　“郝伯，有我呢，”秋生说，他正是心高志大的年龄。　　黑村长又开始抽小烟袋锅了，他在想：八路军什么时候回来呢？　　　　八路军回来了，那是五月的一个春夜。不是李营长他们，是十几个人的一个班，带队的是个司务长，叫老魏，成天乐哈哈的，爱唱歌。　　铜家峡又泛出活气儿来了。从早上起，瑞大娘的石头墙院里，就没断了人来人往，送鸡蛋的、送枣子核桃的，大人孩子，闺女媳妇，挤了满满一墙院。黑村长笑得脸上都是坑儿窝儿，连连说：“让老魏他们歇歇吧，安生吃个饭，缺了什么，有我呢。”黑村长的本家大娘，刚烙了饼送来，觉得黑村长有那么点爱显摆自己，显摆自己跟八路军更近乎的意思，就揭挑说：缺什么？缺口大锅让你挑了！众人便哄哄的笑了，老魏有些好奇，问什么意思，旁边的人就绘声绘色将黑村长挑锅的事说了一遍。　　黑村长脸上有些下不来，心想人家老魏初来乍到的，会怎么想铜家峡呢？老魏身后几个年轻战士，都笑得靠在墙上，“嗨儿，嗨儿”的叫。老魏却神色不动，他对黑村长说：这年头，粮食可是个金贵事儿。　　黑村长知道老魏误会了，红着脸说：再金贵能越过抗日的事去？今天铜家峡就是石头里榨油，也能供八路军的的粮！　　黑村长说得斩钉截铁，老魏拍拍黑村长的肩，说我信。　　瑞大娘最心疼的是那个小不点儿的战士，好像十五六的样子，他和老魏嚓嚓的扫院，穿一件肥肥的军装，头都不抬。瑞大娘端着水过来说喝水吧孩子。小战士，说我不喝。瑞大娘举起袖子，想给小战士擦擦额头上的汗，小战士呼的后退了一步，抬起了眼，那黑黑的瞳仁好像小针似的闪了一下。老魏正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就停住了，说大娘，小邓子就是这么个性子，见了女人就害臊。瑞大娘想，我是女人吗，这孩子，真是的！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9）

　　第二天早上，黑村长兴冲冲的朝瑞大娘家走去，他想和老魏摆谈摆谈敌人扫荡的事儿，看见瑞大娘正在井台上挑水。他刚想问上几句，瑞大娘却长吁短叹起来，说昨黑夜我一宿没睡踏实，我还是没进步成呀，我怎么会觉得八路军撞客呢？　　“撞客？”黑村长有点疑惑，刚迈的脚又停下了。　　瑞大娘晚上煮了十几个鸡蛋，想给老魏他们送去，那天月亮很亮，是阴历十五的日子。老魏他们住的西屋里没人，她刚要转身，突然看到后墙跟下十几个人正撅成一排，月亮地里白花花的一片，老魏他们在上茅房呢。　　“二呀么二月天!”老魏觉察到有人，扯开嗓子便唱。　　“不当话话的!”瑞大娘吃了一惊，转身就走，心里有些气恼，觉得被撞客了。瑞大娘回屋后便想起撞客后种种厄运：鸡不下蛋，猪瘟，发痧，等等。她又想老魏他们没有什么错处，谁说过上茅房不能唱曲子，不能十几个人一起上呢？　　但瑞大娘仍觉得被撞客着了。　　黑村长听完后笑了一声，突然觉得笑不出来了，他一时想不起这种不安的感觉从何而来，仿佛有一条阴冷的长虫滑过他的脚背。他抬眼看瑞大娘，瑞大娘看见他的眼神就怔住了。　　“现在……人呢？”　　“天刚亮就和秋生上山了，好像是上南山了。”　　南山，藏着二十万斤公粮的南山呵！　　黑村长的头一下子变得老大，他铁青着脸问：有多大时辰了？　　“有两顿饭的工夫了。”　　黑村长大喝一声：敲钟！集合民兵！春天的山风很劲，郝玉生的夹袄却一下被汗浸透了。他很明白，轻信的秋生带着老魏他们已经进山了，他无法追上他们了。　　黑村长的两只手一个劲的哆嗦，小烟袋锅儿怎么也点不上，黑村长还不能断定老魏是什么人，但是凭着撺掇秋生一声不吭，直奔南山的这股阴劲儿，黑村长越来越断定自己的怀疑没错了。　　谁也没看到兔唇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黑村长身边的。她对黑村长说：舅，点山火！　　黑村长正带着民兵出村，头也不抬的说：回去！兔唇又说：舅，点撵狼的山火！　　“什么季节，撵狼？”黑村长突然楞住了，心里豁朗朗好像闪过了

一道亮光，好女子，说得对！　　铜家峡的猎户在每年秋冬之季会上山撵狼，这时候就要在山上点上一堆烟火，防止不知情的村民进山，被跑出的狼所伤，或者掉进捕狼的套中。这烟火的意思就是警示牌：不要进山。　　老魏不懂山火的意思，可是秋生懂。　　黑村长激动得微微颤抖，他说：豁儿，从北面上山，点烟火，三堆烟火！　　三堆烟火，秋生会想到发生了大事。　　　黑村长他们是在半山上发现秋生的，离藏粮的山风口已经不远了。　　秋生死了，枪弹是从眉心间射入的。　　秋生的手指还在枪机上，神枪手秋生是和那个人同时开枪的。秋生的枪管还有余温，秋生死未瞑目。　　狗日的，猎户郝玉生咬着牙说，好准的枪法。　　　穆易对铜寿开玩笑的说：宫本雄一暴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两种文明的冲突。铜寿翻翻眼睛看看穆易，未置可否。　　穆易说：一个法国人曾经很入微的描写过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人确乎有一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铜寿。在长崎，一天当中最有喜剧时刻的，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这时，人们都光着身子，无论孩子、年轻人、老人或妇人，都坐在一只瓮里洗澡。这件事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进行，无遮无掩，在花院，在铺子，甚至就在门口，为的是街这边的人可以和街那边的人聊天。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接待客人，会毫不犹豫的从澡盆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成不变的蓝色小浴巾，招呼那位上门的客人坐下，彼此间诙谐的谈话。　　不过，这对日本女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她们脱掉长袍，卸掉带花结的宽腰带，就只是一个黄皮肤的小生物，有着畸形的腿和梨型的瘦乳房，人工的小魅力随着服装一起消失了。　　　　　　——皮埃尔·洛迪《菊子夫人》　　　铜寿把书扔在桌上，不以为然的说：我最不喜欢搞新闻的人那种腔调了，什么都调侃，有什么可调侃的？穆易说我不是调侃，真的。　　宫本雄一不仅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的狡悍也远在其他的日本军官之上，他和他的队员都是在日本军队中千中选一、百中选一精选出来的，他们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他们没有忽略每一个细节，可是他们的文化习俗出卖了自己，在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农民面前，这些努力像破碎的纸鸢一样四处飞散。这几乎是宿命一样的失败。　　用一种文化去征服另一种文化的失败。　　这次铜寿笑了，说你不会是想起美国了吧。　　穆易接着又说：宫本雄一的队伍叫杀人挺进队，这是一字不易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这是一支特殊的、异常凶悍的部队，专门用来对付八路军的，是冈村宁次的得意之作。　　　穆易的起居室里堆满书报，从敞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喧闹的农贸市场，空气中飘动着炸糕的香气。　　我们的话题显得很久远，但我能够清晰的想像出老魏。他就像电影中八路军司务长的模样，有点老相，善意又快乐，他应该是矮壮的，但是非常精悍，这种精悍是深藏在肥大、破旧的八路军军装里的，他盘腿坐在瑞大娘的土炕上，粗大的手指拈着一根细针，缝补磨破的鞋子，唱着刚学的小曲儿：　　九曲十八坡儿，坡坡都种果果儿……　　　日本人血洗铜家峡的时候，老魏，或者说宫本雄一也来了。他穿着整齐的呢制的日本军服，站在稍远一点的高坡上，神态冷漠而悠远。　　铜家峡的村民们是在最后一刻认出他的。那时侯日本人的机枪已经吐出火舌，河滩上的老弱妇孺像大火燎过的树叶般蜷曲着散落，哭声和惊呼之声不绝，这时老魏转过目光了，他的眼睛和垂死的铜家峡人相对。　　“老魏！……”　　老魏的目光宁静，他微微含笑。　　　铜寿突然对穆易说，我想见见陈辉。　　在我的印象里，陈辉像是我们单位的一处陈年古迹。我从来没见过他，我只是在翻阅那些尘封以久的新闻文集时，时不时的看到陈辉的名字跳出来，他好像是一位很不错的战地记者。　　穆易说可以试试看，陈辉两年前得了脑血栓，有点半身不遂。　　陈辉的家里一直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声音高亢激烈。穆易吃了一惊，终于听明白了，陈辉一直住在医院里。现在轮到穆易着急了，他又给老干部局打电话，对方说陈辉的病情没什么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儿媳从美国回来了，要卖掉陈辉的房子，理由是房子对陈辉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老干部局不同意，双方正在扯皮，云云。　　晚饭的时候，陈辉自己来电话了。穆易正在厨房里做泰国式的酸汤，他打过老干部局的电话后两手就有点哆嗦，在厨房里弄得一塌糊涂，听到陈辉的电话，穆易就举着两只沾满面粉的白

手，从厨房里冲出来。　　“陈辉，陈辉，是我呀，”穆易哆哆嗦嗦的说，“你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我听得见，”对方安慰他说，“你着什么急呀？”　　穆易镇静了一下，简练的把我写这篇文章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太行老区来了位同志，是铜家峡人，就是当年陈辉报道过日寇屠村的铜家峡。　　“铜家峡？”陈辉突然激动了，“我是随着区工作队最先冲进去的，太惨了，真的太惨了，还有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解放后我写了好几封信去问，结果是石沉大海。”　　什么孩子？穆易不解的问，然后举着话筒对铜寿说，陈辉要和你说话，他想问个孩子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铜寿不动。　　“铜寿!”我也叫了起来。　　我走过去，铜寿端坐，形态凝止。　　他早已泪流满面。　　晋中一所中学的后院里，一棵老榆树下埋着三封信。这些信是一个叫陈辉叔叔的人写的，他写给一个不知姓名的孩子，只有一封信是拆过的，是县里来的人带来的。陈辉叔叔说一直挂念着他，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去看看？如果愿意，他来接他。　　其余的两封信都没拆开过，它们一直静静的睡在树下。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0）

日本防卫厅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华北治安史》中，详尽记录了日军围剿八路军总部的作战行动，并且提及了那个神秘诡异的杀人挺进队。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 号作战）（5 月 15 日—7 月 20 日）　　敌情：共军第 18 集团军总部（八路军——作者注）及 129 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第一军于 5 月 8 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　　……　　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 36 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对共军的包围圈。　　24 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 29 独立飞行队，进行地面攻击和搜索敌人，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乘作战飞机进行现场指导。　　26 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 36 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华北治安史》中是这样介绍杀人挺进队的：　　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 36 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步兵第 223 联队以益子重雄为队长，第 224 联队以大川桃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约一百名士兵组成。）　　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所隐藏之军需品。　　从《华北治安史》中，我们可以想见这场战争的惨烈。在这被名以“C 号作战计划”中，冈村宁次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和空中支援，组织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冈村宁次的突袭差点儿成功，日本人追杀着八路军数千人的后勤机关、学校、医院、也包括培蕊所在的鲁艺剧团。但是，如《华北治安史》中所承认，日本军队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是保护总部突围的作战部队。这支八路军作战部队的人数很少，所有资料表明，可能不足三百人。　　三百人和两万人。我一直想不出这场仗怎么打。实际情况是，从双方交火到日军攻上山岭，战斗的时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一直到 26 日凌晨，仍然有零星的枪声和手雷弹爆炸的响声。　　日军攻入阵地的时候，阵地上已经阒无一人。谁也不知道三百名八路军战士，是全部阵亡了呢还是杀出了重围？　　王俊被炮弹的汽浪卷下了山谷，后来被搜救民兵发现。王俊一直在寻找原先那个部队的战友，他坚信不疑他们会安全转移，他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寻找下去。　　李营长和他的部队并不知道发生了大事。当时这个营正在外线转战，偶然路经南艾铺的北面。哨兵报告：前面山上有部队转移，好像是我们的后勤机关。未几，一马飞驰而至。马上的人厉声问：“是哪个团？”　　李营长认出，是总部的一位副参谋长。他跑步上前：“769 团，3

营。”　　副参谋长脸色铁青：“有重要任务。“　　李营长站在南艾铺的山岭上，崇山峻岭一览无余。现在他才真正理解他的任务是什么。在崎岖的山道上，正滞重的流动着辎重、驮队和人群，有医院的伤病员的担架队，有报社、银行和学校的同志，有头发已经斑白了的人也有妇女。李营长还没见过这么多戴眼镜的人，他甚至心里微笑了一下，在他年轻的人生里，把眼镜看做古怪的、有趣和不可思议的东西。　　人们不断的向前走去，他们看见李营长和正在挖掩体的战士们，就会向他们笑笑，然后继续走。一个清瘦的、有着大黑眼睛的少年在李营长面前站住了，拍了拍李营长的肩。　　“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　　他奋力的拉着驮着机器的骡子走了几步，又回头说：　　“替我打。“　　人们平静的、沉默的走着，甚至有一种泰然，他们把生命交付给了李营长等人，也交付给了战场，毫无怨尤，又视死如归。　　时值正午。李营长听到鸟的叫声，他抬头望望天空，空中不时有鸟群飞过。　　鸟的叫声凄厉。　　这是一场恶战。李营长感觉到，敌人的规模和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他的估计，这次战斗的惨烈也会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半小时后，哨兵紧急报告：敌人已经出现在南艾铺的东面，接着。其他哨位报告：南面和北面均发现敌情。　　李营长心急如焚，一次次向总部报告，请求总部首长立即转移。王俊说，性格倔强的彭老总一直不走，他要所有的总部机关撤离后再离开。总部副参谋长左权下令牵来了战马，他和几个警卫人员把彭老总架了上去。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在南艾铺上空盘旋，左权指挥着大队人马向后山撤退，他走过李营长的时候，停了下来。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当日，左权在十字岭殉难。敌机俯冲扫射时，左权正在疏散撤退的人群，一颗炮弹在他脚前爆炸。　　左权，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年三十七岁。　　5月25日，日军两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南艾铺、窑门口一带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南艾铺一线，扼守着总部机关冲出包围圈的唯一通道。　　阵地上尘砂蔽日，硝烟弥漫。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1）（图）

五　　南艾铺生死决战———我以我血荐中华——美丽的灵魂如花瓣飘落——兔唇上山了——最后的记者　　王俊在培蕊的大照片前注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肯定的说：“我认得她。”接着他又说：“她会唱《清水河》。”　　我觉得心扑的跳了一下，感到一阵兴奋，我终于找到谜底了，一切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　　在这之前，我曾无数次想像过培蕊的生活，她一直在你的墙上凝望着你，带着她永不褪色的青春和美丽，你无法不浮想连翩，她应该有一段难忘的感情经历，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既然舍生忘死，人生也应该回馈丰厚。“不对，”王俊断然说，“李营长其实并不认识她，他只听过她唱的歌，也只是一首歌。”　　“清水河？”　　“对。”　　我有点迷惑的望着王俊，笑了。我觉得王俊近乎激烈的态度，带着老军人的迂气，“那没什么不好么，你又何必？”　　“我说的是真的，”王俊解释说，一边在字斟句酌，想确切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是刚刚知道她的名字，李营长也是。她原来叫培蕊。”　　王俊的说话方式很特别，似乎李营长和他在一起谛听我的答案，并且若有所思的说，原来她叫培蕊。　　晚上，我一遍遍的听《清水河》的录音带。这首歌唱的是雨中的小茅屋和亲娘，很柔和，但我听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我感到奇怪的是，歌中并没有提到什么河，为什么这首歌叫《清水河》呢？　　我给铜寿打了电话，向这位民歌专家请教我的疑问。铜寿先夸奖了我，说我研究民歌很上路，民歌就是这种研究法。我不好承认我不想研究民歌，我只是想研究李营长，培蕊还有一张照片留下来，对于李营长来说，他的一切空灵飘渺，“只留下一首歌了”。　　铜寿沉吟了一会儿说，从歌词看，这首歌是怀念母亲和家乡的，用清水河

来比喻母亲，也很贴切。不过我倾向第二种可能，怎么说呢，叫寄喻性吧。　　什么是寄喻性？我问。　　“他的家乡可能是山区，没有水，或者土地贫瘠，人们向往河畔肥腴的土地，清水河成了幸福生活的象征，那么，风雨中的家，永远存在的母亲，长久守望的姑娘，就是人生中的清水河。”　　不知为什么，我叹了一口气。　　日本兵已经漫山遍野的出现了，钢盔在阳光闪闪发亮，像一片嗜血的硬壳甲虫，他们密集而沉默，人数之庞大，超出了李营长的预计。　　李营长向后撤的队伍看了一眼。山道狭窄，人流分成了几条巨龙，正艰难的向高山爬去。在这一刹那，李营长看见了一个背着红色小鼓的身影。　　李营长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一眼认出她，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明白，无论他死了还是活着，那个女孩会一直深藏在他心里。　　女孩抓住了旁边一个姑娘的腰带，她们回过头来，向八路军的阵地望了一眼。　　阵地和我们的生命同在，小姑娘。　　两分钟后，战斗开始。36 师团作为冈村宁次的骄兵悍将名不虚传。他们在猛烈的火力前并不退缩，他们在山炮和飞机的掩护下继续猛攻。　　机枪的扫射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荡，阵地上的硝烟遮天蔽日，互相看不见人。　　日军的六架飞机轮番轰炸，火炮在阵地上犁出了一尺多深的浮土，阵地后的一片核桃林被整整削去了半截，像人体的残肢般露出了惨白的树干。　　阵地上的火力仍旧顽强而猛烈。　　八路军 769 团是红军主力团改编，英勇善战。这一次又显示了英雄本色。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2）

王俊现在还能说出一长串名字，他们像李营长一样一直存在在他的生活里，继续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他总是说柱子这个人很奇怪，他是讨厌老蔫呢还是真心的佩服老蔫呢，他为什么选择了和老蔫一模一样的死法呢？　　柱子是独生子，参军的时候十六岁。与众不同的是，柱子的后脖颈上，独独留了一小绺头发，四周都剃的光溜趣青的。柱子作战很勇敢，他入党的时候老蔫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指出柱子同志必须剃掉那绺毛……据说柱子又跳又叫的不干，说这是我娘给留的，仗打完了我还这样去见她老人家。党小组长兼介绍人老蔫一听就生了气，拍了桌子说柱子你这是什么觉悟，党和人民要继续考验你……　　从此柱子就和老蔫结了仇，主要形式是柱子专门揭挑老蔫，而且只在老蔫的痛处下口。　　老蔫最大的乐趣是讲故事，尤其是在战斗间歇的时候。老蔫的故事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老蔫的媳妇如何死缠烂打的爱上了老蔫、他又因此备受困惑的事，但是情节每次都有所不同。　　老蔫入伍前刚娶了媳妇，媳妇是个百里挑一的漂亮姑娘。可是老蔫自己长得却不大好看，有点驼背，大高个儿，眯缝眼儿。老蔫说他媳妇一见他就要嫁给他，要死要活谁也拦不住。老蔫可怜她才娶了她，娶过门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她要是三天看不见老蔫肯定要上房揭瓦。老蔫的表情好像殉难在爱情的烈火之中，摊开手说你看你看，娶老婆真是个麻烦事儿。　　这时候同村的柱子就会笑上一声，说老蔫同志娶媳妇的真实原因是他从小是个馋嘴，他最喜欢吃瓜，大瓜小瓜西瓜香瓜，他没有瓜吃就站在瓜把式的地里发愣，一年又一年就引起了瓜把式女儿的误会，将错就错的嫁给了他。　　王俊说李营长过去不参加这样的谈话，自从收到兔唇转交的布袜子之后，有时候也走过来听一听，然后深沉的一笑。这时候老蔫就趁机抽好多李营长的烟叶子，告柱子一状：营长，柱子这小子特孬，我想换个弹药手。　　战斗开始后老蔫就负了重伤。八路军阵地上的散兵线很长，战士之间的间隔也很长，这样是防止伤亡过重。李营长已经估计到这次战斗特别残酷。　　敌人的山炮几乎把山头削平，可是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大，火力仍旧猛烈。日军开始用飞机低飞扫射。　　王俊说老蔫突然在弹雨纷飞中跳出了战壕，他抱着机枪和飞机对射，飞机两处中弹，掉头逃窜。壮哉，老蔫！　　老蔫的两条腿全断了，血流如注。柱子到处找不见卫生员，后来看见卫生包挂在一棵断树上，柱子才明白卫

生员已经牺牲了。　　柱子哭着给老蔫包扎，说老蔫你挺住呵，你媳妇等你呢。老蔫笑了笑说，你小子这次说对了，没有我，她能把房顶揭喽！　　　王俊说，八路军把人的勇气发挥到了极致。这是王俊的原话，我一字不易。　　那是两翼敌军出现的时候。36 师团屡攻八路军的防线不下，其它两部敌人翻过山岭，满山追杀正在撤退的八路军总部机关。　　日军在手无存铁的人群面前，真正感到了杀戮的狂喜和欢乐，他们不再像硬甲虫那样一声不出，而是发出一种非人非兽的可怕嗥叫，这种嗥叫像浪潮般卷过了山冈和山坡。　　八路军战士想用火力封锁住突然出现的敌人，但是日军像潮水般的涌出，并且从两翼攻上了阵地。　　白刃战就此开始。谁也没看到老蔫什么时候爬出了阵地，他全身捆满手榴弹，手里举着一颗冒烟的手榴弹滚了出去，老蔫变成了一串爆炸的火光冲向了敌群。王俊不能断定柱子看见了这一切，但是陷入重围的柱子被刺刀刺中时竟然微微一笑，拉响了系在腰间的手榴弹。　　八路军战士用的是让日军心胆俱碎的打法，日军再一次溃退。　　暮色苍茫，血战后的阵地突然之间沉寂了，这是激战间的寂静，寂静中就带着妖异。　　王俊突然看见，李营长直立在阵地之上。　　王俊向李营长飞奔过去：危险，营长！　　李营长站立不动。他说：王俊，你帮我看看，我们的人全冲出去了没有？他停了停，又说，我的眼睛模糊，我怎么看不清楚？王俊望了一眼李营长，热泪突然迸出：“冲过山口了，敌人追不上了。”　　李营长摸索着，把露出的肠子塞进了腹腔，满怀希冀的问：“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　　“都冲出去了，营长，真的，我骗你一句枪毙我！”　　　培蕊没有冲出重围。25 日下午，她背着那面红色的小鼓走上了北山的峭壁。　　极度的恐惧使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唯一能想起的是那面红色的小鼓，她觉得小鼓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满山片野都是日本人的嗥叫声，他们甚至摘下了钢盔，露出了丑陋的青色的光头，他们只用刺刀，像冲入羊圈的恶狼。　　带着她们突围的是编剧老杨，他的白边眼镜用细麻绳紧紧系在耳朵上。他带着剧团最小的几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开始哭泣。　　“不要紧，我保护你们。”　　日本兵追上他们的时候，老杨突然转过身体，张开两条细瘦的胳臂，像保护鸡雏的母鸡，他厉声喝道：不许！日本兵的刺刀贯胸而入。老杨的嘴里喷出鲜血的泡沫，老杨嘶哑的吼道：跑啊！　　培蕊拼命向前跑去，她在一条涧流前站住了，溪水从上游汹涌流下，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人们向峭壁走去，那儿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拉着一匹正在惊跳的骡子，他的大而黑的眸子在落日里闪闪发亮。　　“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　　他的喊声变成无数人的吼声，如浪潮般的卷过。　　培蕊系紧了她的红色小鼓，走上了峭壁。　　　日本人停止了嗥叫，像一群突然静默的野兽，嗜血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　　战场在一刹那变得寂静。山风在落日下的悬崖间呼啸，在幽深的谷底盘旋。　　那些被围追的人，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深谷接连不断的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他们是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敦厚平实的工人，他们选择尊严的时候也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我想起了王默磬给岳父信中的话。　　中华有不朽之儿女，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王俊向南艾铺望去，在郁郁秋草中，当年的战场显得宁静而美丽。我问王俊：你断定李营长最后挂念的是培蕊吗？　　王俊垂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　　王俊不像我们当初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激烈了，也许这些日子里他也在思考，也许眼前的苍茫秋色给了人那么多的感触，我们俯视六十年前的战争，也在俯视人生。　　　王俊说，李营长只见过培蕊一面，仅仅一面。　　那是在大扫荡前夕。那天王俊随李营长到团部开会，回来的路上已经天黑了。王俊想起晚上总部剧团来演出的事，身上就像揣了一只跳上跳下的小兔子，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李营长喝了一声：“王俊，你慌什么！”　　王俊突然停住了。他听到山下传来很清亮的歌声，也能看到 3 营的驻地前一片光亮，显然演出正在进行。他知道从下午起 3 营就像过节那么快乐，每个人又洗又涮，现在已经打扮停当，像一排排刚擦过的子弹那么锃亮。他把头侧过来又侧过去，想听清那女声究竟唱什么，可是女声已经不见了，战士们的歌声却如雷贯耳的传过来。　　“嘿，我的傻哥，”王俊抱怨说，“看把他们兴头的！”　　王俊

随营长回到驻地，演出已经结束。几个演员正在收拾乐器，有个女孩子抬头看见他们，就笑了一笑。李营长就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演出很好啊。王俊不满意李营长的套话，就说，这是我们营长，刚巧没赶上看你们的节目。那几个演员不安了，说那怎么办？营长瞪了王俊一眼，说下次吧下次吧。王俊看李营长转身走了，就咬了咬演员的耳朵：知道吧我们营长，作战最勇敢了，可是人特爱害臊，一害臊就说套套儿话，说套套话就是想看节目了。李营长没走出多远，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营长，等等！　　这个女孩子就是培蕊。培蕊很美，就像照片那样，宁静，纯洁，又很有生气。还有一点，她的声音很好听，像一串风铃在摇。　　培蕊说：营长，听我们唱歌吧。　　李营长两手乱摇：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培蕊说：就唱一个，我唱。　　培蕊说完了，就跳跳蹦蹦的回来了。　　李营长也慢吞吞的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像做错了什么事，远远的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培蕊就问王俊：唱什么好？王俊说：唱《清水河》吧，营长可喜欢听了，他不会唱歌，老跟着瞎哼哼。　　李营长咳嗽了一声。　　培蕊说：哦，红四方面军那边的歌。　　伴奏的团员点点头，拉出了前调。　　这是首湖北民歌，是怀念母亲的，多少有点伤感，它能和那些激越的红军歌曲并存，并且流传下来，真是一个谜。　　山雨呀山雨清凌凌的下，　　山湾湾旁边是我的家，　　一盏油灯窗前亮，　　娘亲盼儿早回家。　　……　　《清水河》有八节，可以反复咏唱，一般情况下演员只演唱其中的两三节，但是培蕊把这首歌一字不漏的唱了一遍。王俊说他现在还能想起培蕊唱歌的样子，他说她很像一只鸽子，美丽又纯净的鸽子，她身后是黑暗的起伏的山峦和旷野，她的年轻的身影在黑色的背景下显得那么奇怪，她的歌声柔和悦耳，她似乎在述说比今天和明天的战争更长久的什么，那种回响在人生中的希望和忧伤。　　李营长一直静静的听，一动不动。　　歌声在他心上淌过，就像清泉流过干硬的土地。这一刹那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谁也无法猜测。　　这是一种特殊的、难以解释的感觉，它介于痛苦和欢乐之间，它让人想流泪又想歌唱，李营长只是觉得生活第一次对他神秘的微笑了一下。　　李营长不知道这是什么，却把它永远留在心里了。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3）

过了两天，部队出发。李营长突然问王俊：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王俊莫名其妙：哪位同志？李营长突然火了："当然是那位唱歌的同志，女同志，你怎么不长记性？"　　王俊怔怔的望着营长："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培蕊走上峭壁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李营长。我和王俊仰望这个陡峭的山崖时，只能想像出她像花瓣般的飘落。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深的峡谷，大约有两公里长，据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条峡谷里到处是殉难的八路军人员的尸体，还有拉下来的骡和马。　　壮耶悲耶？我问铜寿。　　……　　还有一个人，铜寿说，这么多年，我还想找到她。　　谁？　　兔唇。　　兔唇回到铜家峡的时候，铜家峡已经变成焦土瓦砾。区工作队带着闻讯赶来的乡亲，正在忙着抬埋尸体，寻救伤者。　　兔唇是三天前去区里报信的，黑村长发现老魏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就断定要出大事。他派兔唇连夜出发，无论如何要找到区里。　　可是日本人来得更快。　　昔日安谧的小山村已不复存在。兔唇只问了一句：我舅哩？　　邻村的大娘们就抱着兔唇的头说好娃好娃哩你不要去看。兔唇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一直抱着腿坐在大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黑黢黢的太行山也能看到黑村长他们死去的小河滩。　　山上的枪炮声一阵阵传来，好像山那边地动山摇。区工作队的同志和乡亲们都站在那儿听。有一个说听说狗日的日本鬼儿包围咱们八路军呢，有的说不对不对是咱们八路军在打狗日的日本人呢。　　兔唇的眼睛亮了一下，问是李营长他们？区工作队的同志说：对，孩子，是李营长他们。　　人们发现兔唇的时候，兔唇已经走到半山了。人们急慌慌的喊起来：上山危险啊危险啊，你干什么去？　　兔唇停住了，问了一句：

“李叔呢？” 山下的人手乱摇，山上在打仗呢快下来！ 兔唇又停住了，她又问： “李营长呢？” 一位老大娘吆嗬嗬的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娃你不要命了你疯了！” 兔唇掂着猎枪，上山了。 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穆易的电话，他说陈辉不行了，让我到医院去。我想了想，拨通了铜寿的手机，没人接，我给他留了短讯。 我已经隐约感到铜寿和陈辉之间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陈辉病房外的走廊里站着很多人，穆易也在。我没想到陈辉还会有这么多关心他的朋友。穆易身边还有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神情悲伤，但是镇定，她对穆易说，你让我待在这里。 病房的门打开了，医生出来说了一句什么，大家好像没听清，问是不是叫家属？老妇人立刻站了起来，向病房走去。医生说不是，病人叫记者进来。 大家面面相觑。穆易突然对我说，你进去。我茫然不解，但是穆易坚定的说，你进去。 陈辉深陷在医院白色的被子下面，眼睛睁得很大，他看见我，就微微一笑。死亡这种力量很奇怪，它像一阵狂风，把尘世的一切浮尘吹落，露出人生的本来面目。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在是那个郁闷失落、被儿媳撵得居无定所的陈辉，他又变成当年那个刚勇无畏的战地记者，他忠诚、快乐、生气勃勃，选择了自己的理想就会一往无前。 他伸出手指，对我说：你记，你写，你写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我对他说：是，我记，我写，我写下去。 晚上的时候，陈辉死了。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看见一个穿了黑衣服的女人，她大约有四十多岁，看样子保养得很好，还很苗条。穆易沉郁的眼睛好像闪烁了一下，他径直向她走过去。 “你是陈辉的儿媳吧，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女人警惕的问，但是脚步没停，向门外走去。 “谈陈辉的事儿！”穆易不依不饶，虎着脸追了过去。 女人站住了，冷淡的看着他。“您这是干什么？我又不认识您，”她又用英文加了一句，“先生，请你自重。” 穆易终于爆发了，他高声叫道：“陈辉死了，可我还想问问你，你就一点儿也不愧疚吗？你们就那么自私，那么冷酷吗？” 人们听见吵闹声就呼拉拉的围了过来，穆易还是又跳又叫:“抢夺国有资产轮到你了吗？剥夺工农权利轮到你了吗？”我看穆易说得离谱，用力把他拉开，然后附耳对他说，我来修理她。 陈辉的儿媳身边正围着几个人劝解。女人说，我不生气，和一个脑软化的人计较什么！ 接着就说起在美国的丈夫儿子的事。众人都在等车，便走过来听，气氛渐渐融洽。 我看看她，突然一笑说，你的眉毛，是花百十块钱绣的吧？ 女人一怔，下意识的用手按了按眉毛，不解的看着我。我推心置腹的对她说：“这个就不对了。国内的时尚是——我是说高尚人士，做一次美容，没有一千多块做不来的，这是品牌意识，要的名牌名店，花的是感觉。你看看，你这样走在街上，别人会轻慢你，会可怜你。” 她脸色沉了一下，不说话了，样子有些沮丧。 我同情的说：在外面不容易吧？ 她的眼圈微红了：“当然，在外面要打拼，还要供房，我容易吗？我不卖国内的房子，供得起吗？他们还不理解，还——” 声音嘶哑了，终于涕泗滂沱了。 我在大门口看见了铜寿，看样子是刚下火车。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冲进了医院。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穆易：铜寿和陈辉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孩子是谁？ 1942 年，二十一岁的陈辉随着区工作队冲进了铜家峡，铜家峡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街道上，水井里，到处是村民的尸体。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孩子，大约两岁的样子，赤身裸体，浑身熏得乌黑，他逡逡而来，好像目无所视，在每一处半坍的门前停下来，叫一声：娘！ 这幅情景肯定永远留在陈辉的心里，它成为北平学生陈辉的人生转折点。 穆易说陈辉抱起了这个孩子，哭得象一个傻子，还说仗打完了叔叔来看你。穆易说，陈辉一直在找这个孩子。 我想起临走前铜寿给我的诗稿，我从手提包里掏出来，递得穆易，诗稿上写的是《我的歌》，卷首上是： 追我魂魄 八千儿女浴血疆场，天地为之久低昂， 青山寂寂碧血无痕，追我魂魄呵还我刚阳， 中华女儿呵令人难忘，她好像百合花凋落在太行， 热血男儿从容赴难，留下这美丽的故事永远传唱。我对穆易说，他终于找到他了。 2002 年 10 月 5 日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图）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云杉《追我魂魄》中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培蕊在现实中确有原型

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追我魂魄》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2004 年 2 月，热情的读者把它贴到网上之后，几天之内，传遍世界许多中文网站。远在国外的朋友也把他们看到的评论发给我。 在网络上，你几乎是面对面的看到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人们对这篇作品表现出的热忱使我非常感动，有的网站组织网友去寻访培蕊的殉难之地，而对没有留下名字的李营长，大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好消息，李营长找到了”的评论。人们感兴趣的是，这到底是一篇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采访记录？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追我魂魄》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它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的那次战役，其惨烈的程度远远不是我的笔墨能够涵盖。关于这次战役，正面描述的很少，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仅在后来编撰的《彭德怀》传中有所提及，大约不足百字，文章中说突围人数是两千人。 但是根据我接触的亲历者回忆，人数应该在八千人左右。这不仅包括八路军总部的直属机关，也包括学校、兵工厂、银行、剧团、医院、报社等随队转移的人员，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至于说有多少人牺牲，那大概是一个永远的谜了，不是不想统计，而是根本无法统计。我在文章中说到溪流被染成了红色，山谷里铺满人和骡马的尸体，到处散落着机器的零件，不是我的想像，而是原话就是如此。我只能说的是，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我特别惊诧于当事者后来那种平静，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平静。我提出要采访一位跳崖后侥幸活下来的女同志时，她“愁得一夜没睡，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迹”，“就是剧团的演员，连枪也没有”，“后来从悬崖跳下了，队长也跳了，大姐们也……八路军么，就是不能当俘虏……” 不少读者喜欢左权与李营长那几句简短的对话，认为很凝重。那是真实的，生离死别，却平静得尽在不言之中。 是英雄而不自知，那是真英雄。 我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为数不多的资料里，也提到了这支由外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支队。他们人数不多，大约一二百人的样子。其中不少是朝鲜人，也有其他国籍的同志。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都很高，通晓两三种外文。他们坚决要求留下来阻击敌人，但是领导不同意，参加阻击任务的八路军指战员也坚决不同意。 要求参加阻击的人很激动，要求他们撤退的人也很激动。 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花絮吧。 当我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看着我，很奇怪我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他回答说：他们有文化，是人才，应该留下来…… 留给战后的中国，抑或是那个向往中的大同世界？ 这是热血而慷慨的生命，他们赴死的时候从容，也留下对未来的祝福。人性至此，我也无言。 不过我还是补充一句：还是有一些外国同志要死要活的留下来了，和八路军战士一同阻击“黑鸦鸦的、看也看不到头的日本军队”，“都打疯了，站起来打，机枪就架在肩上”，然后…… 资料说，他们“牺牲得很英勇”。 中国革命，要比文字能流传下来的惨烈得多。 《追我魂魄》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培蕊的原型是山西人，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两个哥哥都在抗战中牺牲，后来这个唱诗班的小女孩也走上了战场。与文章不同的是，她坠崖后被树枝挂住了，得以幸存，但是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李营长固然有他的原型可循，我没有给他留下姓名，是因为他是一代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于最贫苦的社会底层，是中国革命把他们百炼成钢，成为那种“无法让人忘怀的、战神一样的英雄。”他们留下来的故事，丝毫不比人类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逊色。 我特别要提到的，还有新华社的前辈，那些老战地记者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他们一直恪守着忠诚和信念。新华社前驻柬埔寨的记者杨木，是最后一位见到波尔布特的外国记者。波尔布特垮台后，美国人四处搜

寻他的藏身之地，美国大使约见了杨木，提出用重金收购他与波尔布特在山洞前的合影。当时的波尔布特已经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处境就好像今天的拉登一样，而杨木已经退休，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杨木交出了照片，谁也不会说什么，可是杨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出卖信任过自己的人。　　我是做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和研究的，在一次军事专家和朋友的聚会上，我无意中讲了这次八路军总部战役，大家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是犯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上纲上线的激将法了，应该说没有这些朋友的激励，我可能不会写这部小说。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太行山的南艾铺，也就是当年发生激战的地方。时值深秋，夕阳西下，那种青山寂寂、碧血无痕的感觉一下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找到了《追我魂魄》内在的旋律。和我同去的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可能是心有同样的触动吧，她为《追我魂魄》的主题歌谱曲时，我听到后马上对她说，对，就是这种感觉。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位同事把它发给了正在加沙的战地记者，这位女记者在导弹呼啸声中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阖眼了，手中的电脑是她和祖国唯一的联系。她非常喜欢《追我魂魄》，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字的改动，建议把"一位新闻记者的追索"改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追索"。　　我理解，这不仅仅是谦逊，还有对职业的认定，"在事件面前，我们永远是微小的"。　　一位连防弹背心也没有的年轻的记者，坚守在炮火纷飞的岗位上，在帐篷中等待着黎明的来临。每每想到此，我都会感动。　　我的前辈，我的同事和朋友，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部小说，我不再是写一段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和历史之间无法回避的思索。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还在网上浏览，突然一位网友的话跳入了我的眼帘：喂，现在还有人没睡吗？我刚看完了抗战小说《追我魂魄》，中国，我为你自豪！　　这位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我无端的认为他很年轻，而且很可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可能不会想到，此时此刻，有人正在静静的倾听着他的声音。　　如果那些抗日先驱英魂有知，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第二部分一些旧闻，一缕魂魄（1）

一些旧闻，一缕魂魄史航

如果后世的子孙不能仰面体察，这光亮几乎为黑暗与遗忘共噬。　　这一年眼看要过去了，我没有特别的惋惜，却也带了一点隐忧。　　因为这是 2005 年，抗战胜利的六十周年。国人以六十为一甲子，万事都希望有些交代，结果呢，只是听说日本国的自卫队要改成自卫军了。别的事，没什么结果。　　然而这一年确实要过去了，明年是抗战胜利六十一周年，国人怕是不习惯纪念六十一周年的，逢五逢十才有缅怀的激情，或者说，不缅怀一下觉得说不过去。　　明年，大家都会省点事情了。元旦过后的全国图书订货会，抗战肯定不会是热点了吧？今年没挤进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抗战电视剧，明年怕也会继续砸在手里。　　抗战的事情再被人提起，恐怕就要看东邻日本有什么动作了。他们若是嚣张，我们就能想起来愤怒，他们若是懒得嚣张，我们也就不容易愤怒。总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呢，"人家不忘，吾等之师"，也许更确切点。人家若是始终不忘，就真的是我们的老师了——拜神社，改教科书，改宪法……等于是老师给我们出的一道一道思考题，让我们凝神，让我们无语，让我们知道，一切还不是了断。　　我是个干编剧的，我曾经发下志愿，一年写下一部中日关系的电视剧，可是，只做成两个，相隔五十年的两个故事；我是个东北人，祖上是当过亡国奴的，我也还没机会为东北的十四年沦陷写点什么——这都是让我偶尔发呆的事情。　　目前我能做的，就是买书，买那些跟日本有关的历史书，买新书更买旧书，我不能眼看那些旧书化为纸浆，因为，它们本是血浆凝成的吧。　　前一段买到了日本人田中正明的《"南京大

屠杀”之虚构》，1986 年世界知识版的内部读物，印数只有七千八百册。我且摘录书中几个小标题吧——《“南京大火”纯系谣言》、《从未耳闻》、《广岛才死十四万人》、《东京审判史观的迎合者》、《抢劫——中国军队的恶习》、《保护中山陵明孝陵》、《“市内亦充满安堵之气氛”》、《受处罚的官兵百余名》、《下关和平街之佳话》……后记中，作者将这本书“奉献给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　　国人还有很多不知道松井石根是谁的吗？但愿你知道，你记得。　　知道和记得，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在网上拜读到 2005 年 3 月 11 日 17 时 1 分发表的专稿，题目是《斥资 15 亿〈大和号〉再度扬帆 反町隆史领衔男人戏》，容我摘引两段，我保证从小标题到标点符号都不会引错——　　据日本媒体报道，原角川书店社长角川春树（63 岁）日前在东京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已停摆五年的影片《男人们的大和号》将再度起锚，而影片的核心人物将由日剧天王反町隆史和著名的歌舞伎贵族中村狮童联手出演，该片将由佐藤纯弥执导。　　《影片有关一艘不灭的战舰和 3000 长眠的斗士》　　“大和号”是 1941 年 12 月在广岛的吴市海军军工厂秘密建造而成的“世界最大战舰”，号称“永不沉没”。她装备了当时世界最大的 46cm 的大炮 9 门，全长 263m，满载重量为 72800t，几乎融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于一身，所以在同类战舰中首屈一指。1945 年 4 月 7 日，在美军超过 300 架次的战机猛烈攻击下，巨舰最终爆炸沉没，同时也带着勇猛无畏的 3000 多名勇士长眠于东海海底。为此甚至有人说，太平洋战争“始于‘大和’，终于‘大和’”。影片正是反映这批阵亡的年轻战士的勇士气概的作品。当时战士们的眼中更多的不是效忠天皇或是什么“战争的大义”，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爱自己亲人，保护自己战友。原著作者边见女士是从阵亡将士家属口述和幸存者的视角来反映这场海战的，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其它战争题材的作品。　　《日剧、歌舞伎两大天王联袂出演》　　在谈及为何选择两位主角时，角川称自己是在服刑期间住入八王子医疗刑务所时偶然欣赏到了反町的表现，觉得反町在大和 NHK 连续剧《利家与松》中饰演织田信长时成功表现了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反町接受片约饰演特攻队员森胁，他也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能出演这样场面宏大，主题厚重的电影，感到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压力。”在片中与反町有大量对手戏的中村狮童将出演森胁的好友，一个正义感极强的角色。角川表示，狮童“天生带一种男人的不羁的气质，这种张力颇具魅力”。狮童则回应道“我也很想问自己这样问题，为了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据了解，在广岛的尾道已经修建好了拍片用的道具船，船身大小为原“大和号”战舰的二分之一。为了影片能如期在 12 月为“战后 60 年纪念”献礼，拍摄时间预计为 3 个月左右。角川坚定地说：“希望用爱与死的主题，表现日本人独有的自尊和精神。为此，必须借助电影这一世界通用的娱乐形式”。　　“勇士”“斗士“这些词，明显是这位专栏作者自己的定位，然而又与角川春树的自白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我只能再重复一遍说——知道和记得，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傅雷在 1942 年《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这样写道：″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祛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　　然而我们多么容易超脱。　　刚才提到的影片，有三个名字值得提及——角川春树拍摄的《天与地》，是日本战国影片的压卷之作；佐藤纯弥导演的《追捕》，是我们至今共享的集体记忆，他的另一部佳作，根据井上靖小说《敦煌》拍摄的同名电影，实地取景，制作精良，现在看来都让我们感慨其情怀的深挚与悠远；至于反町隆史，在日剧的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就是这样的三个人，携手在装满三千幽灵的沉船残骸上。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　　上写作课的时候，我给学生们分析日剧的精深与诚意，自然也会提到木村拓哉和反町隆史的名字，当时我就说过，如果历史再一次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战火延烧，你们去从军，面对的就是木村少佐和反町中尉，希望你们多少能有所准备。　　当时我就不是开玩笑，现在，隔着一层银幕，我们和他们，果然已经是在对峙了。　　然而我不知道，那些网络写手媒体记者们，他们改行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能不能偶尔忆起，自己曾在一篇漫不在意的文章里，信口称许过眼前这些敌军。这称

许未必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很容易被已经长眠的同胞和盟友听到。　　　　值得与这种事情相提并论的，还有一场三年前的大风波。　　姜文导演为了拍摄影片《鬼子来了》，专门进入靖国神社去踏勘，结果就有国内娱记眼睁睁制造出新闻，说姜文在参拜。时间是 2002 年 6 月，由头是该记者采访《朝日新闻》中国总局的记者村上太辉夫，虽然人家当时就诚实的强调，姜文“是为了研究不是参拜”。　　随后，这位记者又采访陆川陈逸飞贾樟柯一干人等，居然能做到歪曲每个人的语意，害得这个要更正那个要诉讼，最后呢，他的表白是那么堂皇而无辜：“我想即使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去靖国神社，但作为中国人，而且姜文又是公众人物，还多次去，肯定是不妥的，更何况谁都可以说自己去那儿是做研究呀。”　　我真的在揣摩这个人的心思——毁姜文有意思，还是毁《鬼子来了》有意思？　　如果这位记者没看《鬼子来了》，就炮制出那两篇报道，我只能说他太想替报社做事了，他会不会为这篇报道感到歉疚？如果他是看了电影，还这么干，那我只能无言。　　读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我没郁闷，我知道它本该是这样一本书——就像如果有机会去东京，我一定会去靖国神社，我不会被里面的东西吓到，我很有兴趣打量它们。然而，稳坐家中，用网络搜索这些报章文字……

第二部分一些旧闻，一缕魂魄（2）

其实我神经没那么坚强，如果只为了数落上述事情，我没力气写这篇文字。我动笔，是因为我读到了记者云杉的《追我魂魄》。这是给人力量的文字，就像尼采当初傲然宣告《看，这个人》，云杉也指向山麓云端，对我们说：“看，这些人!”　　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的惨痛战事，我以往并不深知，这种荒疏幸得弥补。一切细节，看云杉的笔触吧，我想说的，是我的触动和感念，面对六十三年前的往事。　　那是 1942 年，正是前文引述的傅雷译出《贝多芬传》的时候。云天隔绝，两种气概在视野之外是可以会聚的吧，虽然，彼时彼刻，他们都要孤军奋战，都要担承各自的天命与国运。　　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记录下抗战期间一个记者对一位无名军人的访谈。　　问：“胜利后你想做什么？”　　军人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大概所有军人都会死的。”　　而《追我魂魄》里写到总部突围的最后时刻，我记得两段与李营长有关的对话。　　一段记的是位青年归侨，“清瘦的、有着大黑眼睛的少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他奋力的拉着驮着机器的骡子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替我打。”　　一段记的是当天下午就牺牲于敌机轰炸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最后的集体跳崖，在我心中是什么景象？　　那么多戴眼镜的记者，那么多远道投奔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学生，还有互相搀扶的伤员，牵着骡马的战士……有枪的，留下来做最后的阻击，没枪的，就这样一一跃下。　　用我心目中最高贵的比喻，就是“周天星辰缓缓滑落”。　　这景象的沉痛与庄严，应该是天壤之间时时返照的光亮吧？　　但是，如果后世的子孙不能仰面体察，这光亮几乎为黑暗与遗忘共噬。　　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现在的一些作者吧，那些还在考察标记着殉道之途的作者。他们身处多少口不应心的应景创作之中，却还是要铭刻自己的大震撼，真感悟。他们是主旋律里的隐隐心跳，遥遥鼓声。革命历史题材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他们也写的是真革命，祭的是真历史。　　云杉，就是这样的人。　　我慑服于她笔下的民间文艺工作者铜寿，对歌曲《清水河》的诠释——　　铜寿沉吟了一会儿说，从歌词看，这首歌是怀念母亲和家乡的，用清水河来比喻母亲，也很贴切。不过我倾向第二种可能，怎么说呢，叫寄喻性吧。　　什么是寄喻性？我问。　　“他的家乡可能是山区，没有水，或者土地贫瘠，人们向往河畔肥腴的土地，清水河成了幸福生活的

象征，那么，风雨中的家，永远存在的母亲，长久守望的姑娘，就是人生中的清水河。”　　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　　　　说到这里，想起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里有个喜欢混世界的青年，名叫哈尼，哈尼曾经这样说过：“我在台南的时候，叫他们把书铺里最厚的小说租来给我看。原来从前的人，真的和我们是没有两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包，人家都以为他吃错药……后来满城的人都逃了，好像到处还都起着火，只有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俚语：警察）抓到……《战争与和平》。别的武侠书都忘掉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不在乎哪里是莫斯科，不关心谁是列夫•托尔斯泰，连拿破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就是远方城市里一个混得好吃得开的帮派老大。所以彼埃尔（台湾译为包埃尔）刺杀拿破仑未遂的原因，注定要被误解成被警察干预而不是被法军士兵拘禁。但是，多少无知和误读都不要紧，最重要的原则就在哈尼心中，那就是一个人该去单挑自己要反抗的团伙，不管多么众寡不敌，也不管世道多坏，别人躲出多远。舍生取义的孟子当然不在哈尼的知识范围，可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襟怀，并没有在六十年代的台北失传。　　《追我魂魄》在网络上被青年人追捧，摘引，应该是同样的缘故吧。文化和知识可能换代更新，英雄气概却将流淌在每一代人的血脉中。读过《追我魂魄》的青年人少年郎，还会去买庵野秀明的动漫，下载反町隆史的日剧，发帖子赞颂日本战国大名或者幕末维新志士的事迹，但是，我想他们再不会轻易贬损自己的家国，他们毕竟已经得知 1942 年的那一幕。　　如果《追我魂魄》能改编成一部电影，我希望是一个简洁坚忍的作品，无须渲染，只要白描。白描也是可以让观众看到血色的。重要的是，改编者是否还能感受到烈士的心跳，是否还能分辨出牺牲的血温？改编者是否怀着虔敬之心，想要更深切的理解那些早早捐躯的前辈？他们是不是想要用和平年代里养成的生活态度，来开导他们，教训他们趋利避害，化险为夷？也许一切应该始于旧书摊上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你觉得有句诗虽然朴拙拗口，可是你忘不掉；也许一切应该始于一处冷寂的烈士陵园，你走风景逛名胜的时候顺便走近，却发现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像是你的弟弟妹妹……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应该是那些生命的存在，然后才能关注到那些生命的消逝，然后我们会推究起那些生命消逝的原因，会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好好琢磨一件事情：　　回到那一年那一刻，站在崖边，我当如何？　　这个问题不新鲜，不刺激，但是想诚实的回答，也不很容易。　　我想起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那里的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名字叫索比埃，面对纳粹的酷刑，他说他愿意投降，招供，只要给他一杯酒。结果，趁着对方的疏忽，他爬上了窗台。他告诉人家，自己是个胆小鬼，如果真遭受拷打，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可能屈服，但现在他把握住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不必做胆小鬼了。　　是的，他赢了。他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尊敬这个人。他不是个坚强刚毅的人，却节省下最后这一点勇气，像节省下最后一颗子弹，成全了自己。这样的选择，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不太好高骛远的标准吧。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1）（图）

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王康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

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 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

鞑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困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休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2）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

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再三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现实表明,这种抗衡尚未终结)。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1840 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 1972 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 1936 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 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 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 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 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

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的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 年 10 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其后，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 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 1870 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3）

1840 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完全能为中国辩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腥风血雨而又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康有为曾先后写下《仁学》和《大同书》。虽然西方在社会变革方面先行了若干步，但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先贤创设的“仁”心和“大同”有可能包含并超越西方范例所启迪的民主和富裕社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宇宙道德原则，而具有永恒的形而上学源泉。 卢梭的伟大和天真都在他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这位自由之子，始终没有洞察人类自由本性的重要前提：作恶。他感叹世间一部完美立法之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全体人类都变成自由的天使。真正伟大的康德指出，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这种愿望。西方这位最易为中国人敬重的智者留给世界的遗言，仍需人们深长思之：恶已经被人造就了，而善则尚有待人类创造。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育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华育能力，同样可以在 1840 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 年间到 1990 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蒋经国也错。…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一百六十年来的凶吉祸福，是悲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外。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主体“善”的不朽光辉。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

向未来。越是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测量计算，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了 150 亿年。如果把宇宙生命浓缩折合为 365 日，要到 9 月 14 日才产生地球，12 月 31 日晚 10 点 30 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 10 秒钟。只是到了宇宙日历最后 2 秒钟，包括 13 亿中国人在内的今代人类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　　无论如何，西方人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太，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澹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生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 1840 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骨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寰，永远不可蠡测。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我与世存先生相交经年，在我们有限的接近中，笼罩在他身上太多的忧郁和孤寂，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情和不忍之心使我惊讶、揪心。在比我整整年轻二十岁的他的身上，总有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几乎没有任何排遣、消闲。他那天生的忧世伤时比寻常的幽愤更苦涩，比个人的不幸更绝望，比通常的悲观厌世更尖锐，他所唤起和拒绝的有时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他的敏感、同情、正义和英勇，他的才华、血性、灵气、悟性，直接预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破晓的壮丽。　　我无法想像他竟然耗费了几年光阴，清灯黄卷，涕泗长流，在几百本陈年旧书中，寻找在他心中奔泻、也在成百上千名杰出同胞心中奔泻过的力量、光明、爱，搜寻让他和无数同胞无数次唏嘘扼腕、忍禁不俊的种种可怕可恶可恨可耻可笑的行径。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但愿它唤起的不单有苍黄而灰暗的宿命感，命途多蹇的绝望，也有浩气长流、悲欣交集的感戴与超迈，毕竟正如一位感悟特异的先知所云“夜正长，路也正长”。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世存先生遥存中国先贤心志，一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苦心孤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者，应作如是观，也当为关心世运的大雅君子所不废。

第三部分关于类人孩语

《非常道》后记关于类人孩语余世存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

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 2002 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

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 / 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 / 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 / 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

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2004 年 11 月 22 日写于北京　　　《非常道》　余世存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本序、跋未收入。

第三部分“历史就是历史”（1）

“历史就是历史”　　冯口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　　　　2005 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各种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拿着《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书稿，寻找出版社屡屡碰壁时，曾经有人问孙维韬：“你一个共产党员，干嘛费那么大力气给国民党歌功颂德？”　　也有某部门在审稿后提出意见，一是蒋介石的照片出现得太多；二要取消书中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的内容，理由是“中日关系太复杂太敏感，怕有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些说法，孙维韬回答道：“历史就是历史。”　从孙维韬的职业生涯来看，这本不过二十万字的《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实在算不了什么。他曾担任九卷集、1400 万字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组组长，《俄汉军事大词典》总编审，《军事百科词典》主编，《世界军事知识词典》副主编，《国防知识》丛书副主编，《兵器知识文库》副主编……但就是为这本区区“小书”的编辑出版所费的周折，让他感慨最多。　2004 年初，北京航空联谊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决定编写一本介绍中苏美空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册。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中涉及空军的内容，一直少有翔实的介绍。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可用飞机只剩三十余架，面对不断增加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已无力反击，制空权全部落入日本空军之手。　　当时，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为名，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 年 8 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 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 1942 年 6 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 2.5 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 1285 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五千余人，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近些年来，关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报道，屡屡见于各种媒体，而了解苏联志愿航空队历史的人，却还是不太多见。　　“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不少我到过的抗战纪念馆里，都是一片空白。”孙维韬说。　　1980 年之前，孙维韬在中国空军服役三十年，曾长期担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翻译。他说，自上世纪 60 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段历史就少有人提了。“但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留传下去。”　　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孙维韬，曾经受邀到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做报告，当他提及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的历史，座中居然无人知晓。　　“那是给沈阳军区培养干部的地方，还是军人呢，都不知道。”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除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外，还参加了保卫南昌、广州、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空战。据统计，至 1940 年，日本共损失飞机 986 架，这与苏联志愿飞行员的作用密不可分。　　1938 年 2 月 23 日，由波雷宁大尉率队，28 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

领的松山机场，一役击毁日机 40 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三年使用的航空汽油。 1939 年 8 月 14 日，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 5 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二十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 库里申科的事迹，在当时传遍中国，可是在他的祖国却毫无反响。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考入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国，人们一直缅怀着一位苏联飞行员，他的姓和你一样。我们早就想问你，你是否是他的亲属？" 直到此时，莫娜才知道了她死去父亲的下落。 1958 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墓地。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像库里申科一样，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一共有 236 人。 被有意无意淡忘或掩蔽的历史，又何止于此。 陈子口一直遗憾没有见过六叔陈端口的照片。 1945 年 4 月 10 日，陈端口驾驶的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敌人进攻时，因低空扫射不幸被日寇炮火击中，牺牲在湖北老河口地区。那时，陈子口还没有出生。 陈子口记得，"文革"中，家里人偷偷摸摸地焚烧旧照片时，他从火焰抽出一张烧焦了的吊唁场景的照片，据说是当时为六叔开的追悼会。 1938 年，中国国土战火遍地，二十岁的陈端口决定放弃测量局安稳悠闲的工作，赴沦陷区从军。他背着家人，偷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北京南下报考航校。 五十年后，陈子口拜访了六叔当年在航校的同学、时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邢海帆，希望能从他那里看到六叔的遗照，可惜，邢海帆家里当年的照片、资料也全部被焚毁了。惟一一张当年的照片，是几年前一位在台湾的老战友赠送的。 邢海帆告诉他，当年的战友还活着的已是屈指可数，三分之二的人在战争中就牺牲了，现在有一小部分在台湾和美国，留在大陆的三人，朝鲜战争时牺牲了一位，另一位死于"文革"。 在《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附录——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里，关于"陈端口"的内容有：军衔上尉，籍贯河北宛平，1918 年出生，1945 年 4 月 10 日牺牲，牺牲原因：作战阵亡。收入这份名册的，还有 822 个名字，他们基本出生于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死于 1937 年至 1945 年间，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战事开始。其时，日本已储备 2200 架各型作战飞机，首批投入淞沪战场 440 架，他们认为，中国空军兵力有限，飞机老旧，性能落后，又无补充来源，三天之内就能消灭中国空军。

第三部分"历史就是历史"（2）

8 月 17 日清晨，中国空军第 5 大队和 25 中队奉命以 6 架霍克－3 飞机赴上海轰击虹口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驾驶 2510 号飞机紧跟中队长起飞。到达预定目标后，阎海文跟随长机从 2000 英尺高度依次俯冲低空投弹集中目标。敌人架在楼顶上的机枪向我机开火，阎海文的飞机被击中无法操纵，跳伞落入敌阵，被数十名日军包围，并呼喊着"活捉支那飞行员!"

阎海文冷静地等着日军靠近，用自卫手枪连续击毙五名日军，日军退了回去，有的要开枪，被鬼子头目制止，并喊话要中国飞行员投降。阎海文从隐蔽处走出来，昂首挺立，眼见十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逼近，阎海文缓缓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板机……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8月19日，中国空军指挥部接到侦察机报告，大批日本军舰集结在白龙港附近海面，遂命令第4大队出动战斗机，掩护第2大队轰炸机前往轰炸……飞至南汇上空时，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的904号轰炸机发生故障尾部冒烟。当时南汇在我军控制之中，如迫降或跳伞都可能生还……一位26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位不满21岁的爱国飞行员，同心协力，从2000米高空对准就近的一艘敌舰冲去，火光闪处，浓烟腾起……敌舰因弹药库爆炸很快沉没。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无论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是英雄！”七十四岁的孙维韬提高了嗓音，几乎是喊着说。1938年5月中旬，历时三个月的徐州会战已近尾声。鉴于徐州会战的失利及日军对武汉等城市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日寇气焰。最初的考虑是轰炸日本本土，让日本人也尝尝挨炸弹的滋味。后来多数人认为投掷几颗炸弹作用有限，况且也不应像日本法西斯那样伤及平民，投炸弹不如撒传单，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一次反战宣传和示威性空袭。　　1938年5月19日，八名勇士两架飞机，分别由徐焕升、佟彦博驾驶，满载上百万份传单，向日本飞去。海面上是否会遇上敌舰攻击、敌机拦截，日本本土防空预警反应能力如何，都是未知数。　　5月20日凌晨2时45分，我双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首批传单。而后在福冈、佐贺、九州等城市，投放照明弹、撒传单。20日11时13分，双机降落在汉口机场。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吴玉章等，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气吞三岛，威震九州。日本举国骚然，6天之后，内阁大改组。1938年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武汉。中国空军对此早有准备，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4架。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十二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间，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2004年10月，初稿成形，加上各处收集来的近千张历史照片，书的大模样有了。航联会分别给北京市统战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送审稿件，希望能得到赞助出版。同时，撰写者、编审者着手编辑工作，统一体例，细致地打磨内容，核实资料。没想到，一转眼到了2005年6月，出版的事情还没着落。　　北京市统战部的回复是“同意出书，经费自理”。二战史研究会出具的审稿意见也很积极，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斗历程。”　　孙维韬他们最希望由空军蓝天出版社来出，觉得这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可书稿送去大半年了，出版社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找上门去，对方说，可以出，但是要有领导的正式批件。至于批件，要经过宣传部政治部外联部。什么时候能下来？说不准。能不能快点？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没法给领导下命令。　　这时航联会内部有两派意见。一种说，要么就等等吧，等蓝天出版社的回复。孙维韬认为，没法再等了。　　有主编大型辞书经验的他说服大家：“书的出版是有流程的。排版、制版、校对、印刷，都需要时间。”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虎队”老战士8月13日在北京的聚会，赶不上8月15日的活动……“中秋过了，谁还吃月饼呢？”孙维韬说，“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嘛让他们给拖黄！我们干的又不是坏事。”争执到后来，航联会的一位领导在电话里说：“你爱怎样怎样吧，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　　最后，几位老同志决定，自费出版，文责自负。　　“干嘛一定要出这本书？”不止一个人问过孙维韬。他的履历并不需要再靠这本书来增加分量了。　　“我就是希望把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地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抗战胜利六十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都

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人一生中有几个六十年啊，如果这次放弃了，还能等到七十周年吗？”他相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950 年，十九岁的孙维韬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今黑龙江大学）被紧急选入志愿军空三师，担任俄语翻译。当时他才刚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只掌握了 1300 个生活用单词，语法还没有学完。而空三师是一个刚由步兵师组建成的空军部队，按计划，入朝前各级干部要接受苏联空军三个月的突击培训。课程包括航空气象学、领航学、雷达使用、各种飞机性能和识别办法等等。那么多生词和技术术语，别说译成俄语，连中文都是头一次听说。　　果然，孙维韬第一天在课堂上当翻译就砸了锅。被苏联专家用教鞭指着他的鼻子说：“下去，你这个不够格的小翻译！”　　但他并没有退缩，擦掉眼泪后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三个月后，当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公认的航空专业课的首席翻译。把他赶下讲台的那位苏联专家逢人就说，这个小翻译进步太快了。　　“知难而进，我这辈子所尝到的甜头，都是从这句话来的。而且，你看，事实证明，我们胜利了，书放在这儿呢！”他哈哈大笑。

第三部分“历史就是历史”（3）

从 6 月 30 日和印刷厂签订合同，到 8 月 12 日出书，这四十天左右的时间，正是北京酷暑难熬的日子。20 万字、1000 张图片、总共 326 页画册的五次校对，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由周智弘、孙维韬、温有祥等几位平均年龄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完成的。　　曾经想找一些大学生来帮着校对，但是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钱。孙维韬说也可以理解，他们都要勤工俭学。可是，因为经费有限，他们这些位老先生出门查资料、去图书馆，连出租车也舍不得做，都是拿着离休证去坐免费公共汽车，哪儿去找这笔支出呢？　　能动员的家人全被动员起来了，周智弘的儿子女婿分别捐款资助，孙维韬的老伴、导弹设计高级工程师温家琦，也被拉来作义务校对。封面设计一打听要几千元，平时喜欢画画的孙维韬干脆自己动手。书名的题写，找的是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月忠，“免费的”。　　3 月体检时，孙维韬查出白血球总数过高，吃抗生素打针都没有作用，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检查，他一直拖着不去。　　“我没法去啊。”他说，“当时是什么情景，刘兴军，大面积心梗，抢救之后，在家躺着呢。周智弘，脑溢血，还在住院。彭谦，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了。”　　“周智弘当时和我说，你千万不能撒手，你一撒手，咱们就完了。”孙维韬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撒手。八十岁的周智弘，原空军航校参谋长，笕桥航校毕业。在他住院的十九天里，硬是坚持半天打点滴，半天校稿。　　　编辑费、稿费可以不算；没钱买书号，可以作为内部发行。可是要出版，印刷的钱总要有着落才行啊。这可不是坐公共汽车就能剩得出来的数目。　　还好，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表示可以赞助 10 万元。加上航联会成员的捐助，编委会、编审组成员再各自掏点，总算凑起来差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笔 10 万元的款项要到年底才能兑现，哪家印刷厂愿意先干活后拿钱呢？　　大热天里，找了几家北京的印刷厂，谁都不肯干这种买卖。这时，孙维韬想起了廊坊市海翔印刷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孙维韬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1989 年离休后，他受聘民政部，任中福企业莫斯科总代表开展对外经贸业务，回国后，曾写过一本记述这六年经历的书，就是由这家公司印制的。后来，孙维韬的女儿单位有一笔印刷的业务，也交给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负责人范学增、杨晶是夫妻俩，很感激孙维韬给他们牵的线，一直说要给他一笔回扣，被孙维韬拒绝了。孙维韬向他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不能少赚钱或者不赚钱，算是帮自己这个忙。　　这时候已经是 6 月底，要求是 8 月 13 日必须见书，128 克铜版纸，1000 多张照片，四彩印刷，16 开本，326 页，5000 本印量，总共 16 万元费用。6 万元买纸备料的启动资金由几个老同志你两万我一万预先垫付，剩下的 10 万元年底才能兑现。而之前谈的印刷厂，

25万元都不肯干。　　“5000本16万，一本平均才30元多点，封面的费用还没算。折合下来，一页一毛钱都不到。这账就怕细算。”孙维韬感慨，“我太感激他们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出不来这本书。”　　为了赶这本书的进度，小范和小杨停掉了公司里其他所有业务，全力以赴。光是送校样，取校样，开车从廊坊到北京来回三百公里，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汽车油钱一个月花了两千多元。开始的价钱是按每本画册300页计算的，后来由于增加了“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参考书目”等内容，一下超出二十多页，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些费用都没有追加。小范对孙维韬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太不容易了，让人没法和你们细算钱的事。　　被感动的还有孙维韬住处大院里的田雨文印室从河南来的小雷一家人。因为经常在这里打印、复印、扫描照片，孙维韬和他们一家也熟悉起来。知道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后，小雷曾说“不要钱了。你们的精神比给我们钱还值钱”，孙维韬不答应，那怎么行，你还得养家糊口。于是田雨文印室对这本画册实施优惠政策，复印一张三毛，这里只要五分；扫描照片一张五元，这里一元。而且随叫随到，不厌其烦。　　“给我们省了好多钱啊！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孙维韬说。最有意思的是，小雷还给老孙送来一箱牛奶，说老先生太辛苦了，慰劳一下。“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却能这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种‘热’和之前的‘冷’，怎么能不让人感慨。”　　因为是内部发行，《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只能赠送，不能发行。孙维韬和夫人自费寄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四十多个图书馆，邮费就花了一千多元。他举着这本沉甸甸的图册：“这一本就是三斤重，一次我俩也就是能拿个三五本。”他很享受这种“写书、出书、送书”的一条龙服务，“年纪越大，越有紧迫感要把自己知道的留给后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就足够了。”　　2005年5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总统普京及前苏联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大型画册《胜利的回忆》，所用的100余幅照片和史料素材，就是选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中的苏联部分。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2005年8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选用了书中的220余张历史图片，配以十余架二战飞机模型以及由当年参加抗战的空军老战士提供的二十余件文物，举办了半年期的《中国战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展》主题展览。

第三部分白昼中的烟花（图）

白昼中的烟花周晓枫《隐秘盛开》封面及插图

　　持续一生的暗恋或许是别人眼里的传奇，但对当事者来说，无疑一场情感灾难。明知道得不到响应，依然难以自拔，暗恋有张盲人的脸。我以为，持续一生的暗恋或许是别人眼里的传奇，但对当事者来说，无疑一场情感灾难。如果说暗恋是传奇，常常是让人抱有怜悯的传奇；暗恋者的受困，对他来说也许是不乏享受的苦难。少年时期，我信赖过暗恋，因为它的绝对、宁静与无告；后来，成长到变老，我有一颗轻讽的心看待世事，包括暗恋。太多暗恋者以眼泪灌溉自己，在自怜中愈加软弱，然后把受挫的情史美化成受难神话。我不喜欢那种自我舔食的陶醉感。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看稿子惯于带有校对般的技术冷静——是啊，日复一日地处理文字，难免不染上职业麻木。但担任《隐秘盛开》的责任编辑，在我的阅读史上是个意外：我被感动得泣不成声，几次不得不停下来，等情绪平稳些才能再次进入小说。许多许多年没有这种情况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太漫长了，我根本想不起。《隐秘盛开》讲述了一个名叫潘红霞的平凡女性，令人疼痛的却至死也不能放弃的暗恋。作

者蒋韵没有“文艺化”女主人公，潘红霞既不漂亮也不难看，有张满月似的健康的圆脸，身上充满乐观而善意的温暖。如此普通，让人猜想不到，她是一个爱的天才。所谓天才，意味着非凡的能量、创造奇迹的可能，以及，几乎宿命的悲剧感。潘红霞就如此，爱上刘思扬，却终生守口如瓶。爱情本身并没有成就果实，但潘红霞酿造了自己，直到，圆熟之后与梗断开……潘红霞的最后命运是患乳腺癌死去，似乎尘世纷乱，容不下她那么纯粹、饱满又持久的情感方式。只有在临死前，潘红霞决心专程前往，想告诉刘思扬他是自己一生的眷恋。并非因病患而原谅自己去打扰他的生活，也不是挣扎到尽头的了断——潘红霞是那种人，除非确保自己的爱是一个礼物，否则她不会给予——就像小说中的语文老师留给小玲珑的遗书，是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曾被怎样刻骨铭心、奋不顾身地爱过。他们爱到已经不奢望“在一起”这样童话的、也是世俗的幸福结局。如是，他们也从受囚般的暗恋里解放了自己，并把它作为情感上的滋养，像不被光照的花朵依然把芬芳弥散在黑暗里。　　当然不必把潘红霞圣化。她也试图挣扎，她的短暂婚姻，就是幻想从对刘思扬的无望专注中得到解脱，但一个人爱并且以怎样的方式爱，并非出于选择。置身于真正的爱里，我们谈不上奉献，因为那是情不自禁，那是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我依然被潘红霞身上的气息所打动，她心中汹涌的激情与永不表白的沉默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让我认出，她是人间版的“人鱼公主”。于是我在封底这样写下：“小人鱼步步走在刀刃上，但这种疼痛始终不被诉说，使不知情的王子得以一直享用他的幸福。可能人和神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无法像神那样忘我无私而又毫无噪音地爱着，并牺牲。尘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以神的完美方式来爱一个人。隐秘盛开，那寂静中难以抑止的激情……他们是爱的天才。”　　我忍不住推荐《隐秘盛开》，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它让我体会到职业自豪感和荣耀。令人欣慰的是，朋友中的许多人，与我有着一样边读小说、边流下多年未遇的眼泪。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今天，爱情和欲望似乎可以成为相互替换的词语；当我们习惯于把“爱”诉诸生理解决的时候，不说出口的爱情当然看起来像怯懦，不会被理解为更独立的承担。喧嚣中，我们还能听清什么呢？我想起有些动物的低鸣，因为分贝不在人类的倾听区域就被当作不存在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倾听，需要怎样的耐心和珍惜，才能共同分享那寂静里的低音区？有足够敏感的听觉，才能听到隐秘盛开中，一朵无声的花如何在怒放中抵达自己的极限。　　记得编辑这本小说的过程中，赶上去浙江上虞出差。那里有个奇怪的习惯，举行婚礼时放烟花——是在白天。所以，根本看不出任何绚丽，原本华美的烟花，只剩下潦草的烟雾、零星的光。我想假如刘斯扬遭遇不幸身置黑暗，或许才能认识到潘红霞的光亮；假设没有意外，刘斯扬永远作为生活的宠儿存在，潘红霞的爱情也不过是白昼施放的焰火，再美的绽放也不会被目睹。不幸的是，焰火，不管是不是欣赏，它只燃烧唯一的一次……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焰火是天堂的作物，而潘红霞的爱近于神迹。对《隐秘盛开》的阅读，让我觉得，自己正在隐约地随教堂的钟声出发，完成秘密的审美和救赎。

第三部分贫嘴的孩子有糖吃（图）

贫嘴的孩子有糖吃丁杨

他颇有成为相声、评书高段票友的可能，搞搞“脱口秀”估计也能胜任。　　　　小时候，常听老人嘱咐——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听话”的含义大约等于少顶嘴多顺从。等到将这道理用于实践，发现很多时候做个听话的孩子，别说吃糖，连喝汤的份儿都没有。　　不知在写字儿这件事上这话是否适用，对于至今仍被大多数人忽略且受一小撮人青睐的萨苏来说，无论在口头还是笔下，他这贫嘴的孩子绝对过得甜不可言。　　萨苏本姓弓，学信息出身，现在旅居日本，有妻有女，主业做网络工程师，拿写东西调节身心排遣情绪。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用中国厨子，娶日本太太，住英国花园洋房’，兄弟前两条都占了，厨子要自己来担纲……”他的文字最初是在西西河中文网上招来第一批拥趸（如今可叫“萨粉”），那些机灵俏皮的篇什有着同其他网上帖子相似的无拘无束，可是看多了你就会发现这种貌似自在的文字是有板有眼的，电脑后面那个写手在敲击键盘的时候，大抵是胸有成竹、振振有辞的。那些时时在论坛上追着萨苏帖子看的萨粉，称他为“萨老大”，扑面而来的江湖气印证了萨苏甩出来的这些文字在小范围内多么深入人心。　　我是在 2005 年夏天某个闷热难当的下午翻看萨苏印在纸上的第一本书——《中国厨子》，薄薄一小册，拿得起就放不下。从出版《中国厨子》的同心出版社到家里，也就步行十分钟的距离，记得那天我走了快半个小时——不慎在下楼的时候读了第一页，接着眼神儿明显不够用，瞄着路就看不了字，盯着字又瞅不到路。就这么一路边看边笑，并且不是那种无声窃笑，而是不能自持的有声版。其间读完了第一章，躲过电线杆子若干，绕开树下搓麻人士两群，不小心踢到袖珍垃圾堆一个。擦肩而过的二三路人还以为我被晒得神经了。天还没黑透就把这本书看完了，不是浏览，而是品味，可见篇幅有多少，非常之意犹未尽。　　通过书来打量萨苏，会觉得他是个神秘的文坛外写手，虽然他在“自序”里用文字露了一小脸。读者随着他极富口语魅力和民间意味的文字叫绝、大笑，这文字越精彩，文字后面那个人，反而更模糊。　　显而易见他肚子里有不少干货，估计憋着劲儿先用妙笔引逗得读者上钩，然后一截一截地往外倒饬。有了好故事，文字当然也得搭调，萨苏的风格不仅仅是京味儿幽默，他的行文读来极其口语化，更像是单口相声，捧哏逗哏他一人儿包圆了。最初的网络写作落下了深谙读者脾气的“病根儿”，他知道怎么写让你手不释卷。　　在《中国厨子》里，北京贵宾楼的大师傅几乎个个能在天桥玩儿数来宝，善良、热心又诙谐可爱。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大厨们分析外宾吃猴子的可能性，“吃几百只猴子，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个外宾所在的国家不大，外宾加使馆工作人员，一顿饭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无论清蒸还是红烧，就算一人抱一个猴子啃，也没这么大胃口。”再看《全素宴》，说印度人吃饭省事儿，“要说印度朋友，饮食上应该是最省事儿的，为什么呢？人家有米饭和咖喱好像就行了，有的连勺都不用。饮料？五十年代的自来水，拧开就喝，吃嘛嘛香，这就是体质。人家恒河里死猫死狗漂着，打了水就喝都没事，何怕你中国这点子不成器的细菌呢？”这么“贫”的文字，几乎让人隐隐看到躲在文字后面萨苏那一脸得意坏笑，他在另一个国度凭着心底反复翻炒的幼时记忆和锦上添花的虚构，聊解与中文隔海相望之饥。　　之后的《嫁给太监》，书名是够吸引眼球的，翻开读读，比上一本少了些抖包袱散笑料，多了几分对人情冷暖的咂摸，对前朝事往昔人的追念与神往。书中写了叫“夏一跳”的太监，和作者的程姥姥相守几十年。程姥姥当年之所以选择跟夏一跳过一辈子，只因为他“人好”，是个“靠得住的人”，遗憾于“可惜的是命短，没落着我伺候他，没享着福。”这样的叙述，一下子会把我们带入童年时午后的某个四合院，几个孩子围着牙齿不全说话漏风却堪称“故事篓子”的某位老奶奶，听她讲古。那时那地，她就是说着这样的话啊。　　北京秋天的时候，见到回国的萨苏。之前遇到过许多纸上文采飞扬，本人乏味木讷的作者，所谓文字与人格彼此拧巴的那种，而“萨老大”，绝对人如其文！乍一看萨苏俨然白领海归，礼貌端庄，可是大家还未落座，彼此换名片的时候他已经隆重开讲。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语言天赋和观察能力的双重强人。他的表达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并不多，却绝无平铺直叙的形式，简简单单一件事儿，由他嘴里遛达出来就可乐。他颇有成为相声、评书高段票友的可能，搞搞“脱口秀”估计也能胜任。萨苏不但自己喜欢说故事，还具备调动大家表达潜能的本事，那天到了最后，整个饭馆的客人都快走光了，就剩我们一桌人，争先恐后地喷话。席间多位女萨粉，年龄跨度不小，萨苏以绅士般的细致周到，不但一一敬酒，还不时对略嫌沉默的某人施以关注，走上前来问候。我不认为这是萨苏旅日多年的“日式”客套，宁愿相信是他酒后的真情流露。　　我问萨苏，日本的生活压力那么大，工作又忙，哪有时间写作呢？他说，就如同人们总有时间休闲一样，他用写作调剂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天忙完工作，写上几千字，

神清气爽，基本是手随笔走，不刻意，很流畅。写这些东西，是令他太快乐的事。出了两本书，第三本第四本呼之欲出，他说他还有许多故事没有写出来，而那些未诉诸文字的故事是最让他牵挂的。他还要写童话，说是给女儿看的。突然想起他曾在文章里写到，在日本的家里，他在楼下写东西下厨，又不放心楼上睡着的女儿，于是把电脑摄像头对准闺女，让远在北京的老妈在电脑前面帮着看孩子，一旦有情况，就给他发短信。实际上，萨苏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贫嘴孩子，如照看玩具般留意生活的点滴，搜集记忆中的只言片语，还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写下来，娓娓讲给更多的人听。　　他的文字，或许经不起真正意义上的推敲，却会带给萨粉久违的阅读愉悦。这样的文字能让端着架子装模做样的人从架子上笑得掉下来，如果最终无动于衷，我们只能认为，那个人恐怕是失去了笑神经。　　　《中国厨子》《嫁给太监》　萨苏　著　同心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第三部分最勇敢的白日梦（1）（图）

最勇敢的白日梦苏葵　《亨利与琼》小说及 DVD 封面

很多时候，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说不出为什么。不知因为什么而开始，不知为什么会结束。　　　她已经弄不清是怎么来到池塘边的了。记忆是有的，但即便是自己的记忆也有欺骗性，她知道，人们有时候会根据心理的需求来矫正感觉或记忆。多么可怕呀，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她有时甚至弄不清他们的爱是不是真实的。　　但是水边的记忆是美好的。初秋的夜晚，夜鸟在池塘边大树的枝桠上说梦话。月光透过那些托梦的枝桠，照在她的碎花裙子上，也洒到那潭如镜的水面上。他讲到了童年。他在海里游，弟弟在岸上跑，直到弟弟跑累了，他还在海里继续划水……他是海的儿子。　　那一刻她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了。她命里注定地爱上了他。临别时，在池塘边湿滑的台阶上，他牵了她的手。　　　阿娜伊丝·宁是一个非凡的小女人，一个不容忽视的女作家，勇敢的白日梦者。她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即便是那些博览群书的作家和学者，也不太熟悉这个女子和她所做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是上世纪在美国闹得天翻地覆的那场“性解放”运动的教母，但我们对她的了解远远不及另一个非凡女子西蒙娜·波伏娃。后者的《第二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国的知识界广为流传，而阿娜伊丝的《Delta of Venus》（有人直译为《爱神三角洲》）在我们这里却鲜为人知。在西方，她被称为身体力行的性解放先驱：“不论什么爱情，我都无法抵抗，我的血液开始起舞，我的双腿张开。”　　《Delta of Venus》堪称现代女性性文学的启蒙作品，它是阿娜伊丝在上世纪 30 年代以每页一美元的价格，为一个神秘的收藏家所写的一些性小说。当时那位神秘收藏家的唯一要求是：不要任何诗意，只要性的故事。这种每页一美元的写作，可能促使了阿娜伊丝对性文学的深刻研究，或许也是她尝试偷情、同性恋甚至乱伦的某种诱因。但是，阿娜伊丝对于性的认识始终是浪漫而唯美的，她在给那个神秘收藏家的一封信中写道：“性在变得直露、机械、过度，变成一种机械的强迫观念后，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和魔力，成了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情感、饥饿、欲望、情欲、冲动、一时的奇想、更深层的关系，都能改变性的色彩、滋味和强度，不把他们与性结合起来，是多么的错误啊。”正因如此，阿娜伊丝·宁在书写那些性小说时，本能地用女性独特的敏感去描写性，从而创造了一种女人的语言。那些性小说在 1977 年阿娜伊丝本人谢世后才得以正式结集出版。两年内，该作品的销售量就多达二百多万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到 1990 年代，仅在美国东部，该作品就已经发行到第十五版。《Delta of Venus》的文字不但充满了诗歌的音乐感，而且冲破了男性独霸性文学的局面，以领先于时代的勇气，成为性文学领域女性语言的开拓者。　　1903 年，阿娜伊丝·宁（Anais Nin）出生在巴黎。父亲是西班牙

音乐家，妈妈是法国歌手。阿娜伊丝九岁时父母离异，十一岁时，妈妈带她和她的兄弟到了美国的纽约。到纽约后，阿娜伊丝被送到公立学校念书，可她只喜欢英文和文学，不喜欢标准式的教育，所以很快就退学了。之后，她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她不用指南，而是按照书名的字母排列，一本本地读过去。与此同时，她还学习了西班牙舞蹈，达到相当水平。　　1923 年，阿娜伊丝与银行职员雨果・圭勒结婚，定居在纽约市皇后区。次年，她随丈夫到了法国巴黎，直至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娜伊丝返回美国，定居在纽约市。在巴黎其间，阿娜伊丝结识了亨利・米勒并与其结下终身的友谊。阿娜伊丝与亨利的友谊和恋情，不仅对两人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忽略的重大事件——至少，直接影响了《北回归线》和《亨利与琼》两部作品。　　1932 年，阿奈丝发表了《D.H.劳伦斯：非专业研究》，这是对劳伦斯的性文学作品的首部女性评价；也是阿娜伊丝确定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的里程碑。　　我注意到阿娜伊丝其人，是看了大导演菲利普・考夫曼 1990 年拍摄的《亨利与琼》（又译《第三情》）——根据阿娜伊丝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作品不仅记载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重要的事件——亨利・米勒与阿娜伊丝・宁之间的情事；而且在涉及女性问题的电影里，这无疑是一部不可忽视的、致力于探讨女性最隐秘的深层内涵的一部力作。至少，考夫曼努力地（或者说非常尊重原著地）去做了，把女人最原始的思想、梦境、直觉、本能、情欲和不贞统统展现出来，通过阿娜伊丝这个妩媚而勇敢的小女人，考夫曼在银幕上再现了女人的思想、行为和她们的性，以中立的态度。他把真实的欲望、迸发的激情、隐秘的放纵揉进诗意的迷人画面中，使这部影片散发出无法抵挡的魅力。

第三部分最勇敢的白日梦（2）

在电影里，一切都是围绕着阿娜伊丝展开的，亨利和琼只不过是阿娜伊丝人生中经历的一段故事，一个插曲——或许是段难忘的插曲，但也不过是一段没有句号的故事。　　阿娜伊丝是个有钱有闲也有点才华的年轻的女子。在上个世纪初期，她和丈夫从美国来到了巴黎——注意，整个故事发生在巴黎，只能在巴黎，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她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太正常也太平庸，所有的激情似乎只能来自阅读。即便作为丈夫的“小杨柳”生活在宠爱之中，但日常生活的乏善可陈，使得她除了对劳伦斯推崇备至之外，也只能在自己的日记里挥霍想像。　　偶然地，她认识了亨利——放浪、风流、极端自我、自以为是的一个家伙，从纽约布鲁克林来到巴黎的落魄作家。缘着亨利，阿娜伊丝又认识了亨利妖艳、堕落、妩媚的太太——琼。琼告诉阿娜伊丝，她说：我做过最不道德，最下流的事，但我总是以极美的方式去做……我现在觉得很无邪。　　即便是下流的事情也要以极美的方式去做，这真是百分百的女人的思维方式。以为用美丽的方式做的一切都会是美丽无邪的。女人为美丽而活着。于是，阿娜伊丝迷上了琼，她对琼的与常人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感到十二万分的新鲜，她对琼周身散发着的所有气息都感到好奇甚至崇敬——琼说谎、酗酒但始终美丽着，琼的流浪艺人出身，琼的漂泊流浪居无定所，琼有的那些神秘而富有的干爹……琼这个公众眼里彻头彻尾的“坏女人”，在阿娜伊丝眼里却变成了自由和艺术的化身，劳伦斯的化身。在阿娜伊丝看来，琼就像玻璃一样美得透明而无邪——或许，阿娜伊丝在琼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白日梦。她怀着圣徒般的虔诚吻了琼。　　但是接着，琼又飘走了——回美国参加巡回演出。阿娜伊丝像虚脱了一般地失落，她病倒了。　　那时候，亨利只是个心比天高的无名作家，他靠着太太琼给他的钱在巴黎发酵着他的灵感。他住在爬满蟑螂的破房子里，写一本以琼为素材的小说。但更多的时候，他狎妓、酗酒、和一群破落的流浪艺人一起疯癫……　　出于好奇，还是为了体验琼的生活、延续对琼的爱？阿娜伊丝开始试图进入到亨利的圈子里去，她小心翼翼、满心好奇地看到了全然不同的图景：充满了癫狂、刺激和激情的人们，做着反

常的、不伦的但是充满着力量的事情。渐渐地，她开始陷进去了，陷入亨利的生活，陷入亨利的身体，陷入了性带来的迷乱、疯狂和强有力的撼动之中——她爱上了亨利，或者说爱上了亨利的生活方式。他们疯狂地让彼此的躯体进入、融合，性已经变得不再是生理的需求，而成了思想的需求。阿娜伊丝说，在这样的爱之中，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强壮和纯洁……在堕落中感受纯洁，这就是那些艺人们生活的全部吗？　　阿娜伊丝开始写作，也是以琼为素材——琼成了她和亨利共同的女人。除了做爱，他们便一起探究琼。　　亨利说，他不明白琼为何总是会嫉妒、伤害，总是要说谎，不停地说谎。　　阿娜伊丝却说："也许你没问对问题。如果是我，我会问'她为什么需要说谎？''她怕什么？'或者'她在怕谁？'"这才是女人想到的问题。　　对于相同的事物，男人和女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阿娜伊丝的深刻，是在日后才慢慢得到人们的注意的。正如后来《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所称：她的作品是第一次由女性作家以完全开放的风格撰写的性文学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语言的创始人，是缓慢发展起来、却有深刻影响的现代女性性文学的创始人。考夫曼贵在尊重原著，在电影里他把"女人的观点"郑重地摆了出来。在我看来，这正是电影的严肃和可贵之处。更为严肃的是，考夫曼没有炫耀艺人们的所谓另类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作为影片的编导，他始终清醒着。他包容着阿娜伊丝的任何尝试，他给了女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给琼，也给了阿娜伊丝。他由着她们去做梦，去任性，但是他始终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容许不正常的欢乐扼杀掉正常的、健康的快乐。　　终于，在电影就要结束的时候，阿娜伊丝从昏昏噩噩的白日梦中清醒过来——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阿娜伊丝在某个坐上了丈夫的汽车，远离亨利而去了。那意味着她将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她将告别那些癫狂的体验——又一块美丽的玻璃打碎了，那个曾经懵懂的"小杨柳"无声地哭了……　　后来她写道——　　　　那个早上我哭了　　我哭是因为我爱街道　　带我离开了亨利　　使我重又回到他的身边　　我哭是因为我成为女人　　过程是如此痛苦　　我哭是因为从现在起　　我将不再流泪　　我哭是因为失去了痛苦　　可我还不习惯他的缺席……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失恋，正如那不是一场普通的恋爱。那是一次蜕变，化蛹为蝶的蜕变。玻璃碎了，白日梦醒了——那是她在巴黎花了十六年的时间做的一场勇敢的白日梦啊。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代价，原来如此的昂贵。　　阿娜伊丝的原著如今也出版了中文版，而根据其原著改编的电影我已经看了四遍，故事发生的地方巴黎，我也长长短短地住过四次。我一直想，假如亨利与阿娜伊丝不是相遇在巴黎，还会发生这段故事吗？亨利还能写出《北回归线》吗？阿娜伊丝能成为后来的"性解放"运动的教母吗？　　不会。不能。巴黎，只有巴黎，才是最绝妙的梦床。　　在巴黎，淫雨时断时续的夏天，我喜欢披件短风衣在拉丁区幽深的小巷子里瞎逛。眼瞅着雨丝随着教堂的钟声一起，飘到那些一间连着一间的书店里。书店真多啊，压在最下面书本底下的尘土，都知道一些陈年的秘密——文人或者艺术家的风流韵事。雨天里，空气里尽是冷冷的蓝调——蓝得像书店隔壁的咖啡馆里播放的爵士乐，萨克司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爵士鼓敲着细雨的节奏，时紧时缓。这样的气氛，诗意又包容，最是做白日梦的好时候。　　夜里我不常去蒙马特和红磨房那边，没有人带我。只有一次，在冬天，他带我去了那边。也只不过在蒙马特高地一带的巷子里转转，去咖啡馆里坐坐，到底没敢走进任何一间风月铺子——我们不是亨利也不是阿娜伊丝，我们太规矩或者说太平庸。因为天冷，到了半夜也很少见到站在街边揽客的女子。但是，即使如今，夜里从那些酒吧、咖啡馆或者风月铺子里溢出来的暖烘烘的人气，还是使那一带的夜晚充满诗意的淫荡、隐秘的骚气和暧昧的诱惑——足以撩拨起人性最本质的冲动。或许，那正是开掘艺术之梦的某种力量吧。白天我常去蒙马特那边。有时候天蓝得像凝固了似的，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的镶嵌小丘高地顶上，没有一丝云彩。今天的画画的家伙们依然沿袭了多年前那些玩艺术者的"淘金"方式——搬一只小铁椅摆一个画架，在树荫下慢条斯理、一丝不苟地作画，累了就去近旁烟雾腾腾的咖啡馆坐坐——多年以前，乔治·桑和萧邦也在那里泡过光阴的。我也时常泡在咖

啡馆里，写张明信片，喝杯咖啡抽只烟，或者盯着那些画画的人发呆。有时就想，那个在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中放着伦敦的好日子不过，却离家出走跑到巴黎来发疯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不是也在小丘一带的蓝天下做过他的画家梦呢？反正，毕加索是在这一带混过的，小丘广场附近的小巷里有毕加索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口有铜牌为证。而昔日更多的有名或无名的艺术家，在这里留下了多少故事，就只有巷子顶上的蓝天知道了……　　当然，后来亨利·米勒出名了。在他那本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北回归线》中，上世纪 30 年代在巴黎那段穷困潦倒却精神充实的日子，成了他最乐意回忆起的一段往事。恐怕不止因为阿娜伊丝，那段时期，他生命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女人。　　亨利一生结过五次婚，但只有第二任太太琼对他的文学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琼在 1923 年遇到亨利·米勒，当时她是纽约百老汇的舞蹈演员，而亨利是西联公司的人事经理。次年亨利娶了琼，并在琼的鞭策下开始专事写作。期间，琼曾经使尽浑身解数来养活两人。1931 年琼从纽约来巴黎看望亨利时，他把琼介绍给了阿娜伊丝。这两个女人立即被对方的魅力所迷惑倾倒。这段迷离纠缠的激情，一直持续到琼 1932 年 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琼返回纽约时告一段落。1932 年 10 月，当琼再次回到巴黎时，一场复杂的感情纠葛爆发了——这场三角恋不同寻常，不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是三方势均力敌的较量——每一个人都深爱着另外的两个，只是琼不能容忍这种三角关系。最终，亨利和琼在 1932 年年底离婚，阿娜伊丝的介入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两年后，亨利在巴黎出版了《北回归线》，阿娜伊丝·宁为这本非同寻常的书做了序；五年后亨利又出版了《南回归线》。这两本书以大胆直露的语言和性描写，给西方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欧洲文学先锋派的先驱。当时，亨利的作品在法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到查禁。1961 年，经过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诉讼，《北回归线》终于在美国出版——亨利·米勒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甚至被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誉为自由和性革命的先知。随后他的其他作品陆续解除了禁令，米勒的作品终于得到世界文坛的承认。　　在与亨利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中，阿娜伊丝的作品的命运大致与亨利的相同。　　阿娜伊丝·宁回到美国后，在 40 年代开始专心从事性文学创作，但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发表她的作品。于是，阿娜伊丝只好自己出钱印刷发行自己的作品。由于她对女性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描述和见解非常独特，阿娜伊丝的“地下”作品依然赢得了不少读者。60 年代，美国开始了“性解放”运动，阿娜伊丝的作品更是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那时，女权运动者几乎人手一本阿娜伊丝的书。“天哪，居然有个女人真正享受完美的生活——她独立地走遍世界，独立地生活，她怎么想就怎么做，她掌握着自己的性感，自己的财产和一切!”这是 60 年代一个美国妇女在日记中写下的心声。而那个时候，她们心中的女神阿娜伊丝已经年近花甲，她的小说和散文不但在美国迅速窜红，而且成为“性解放”运动的启蒙作品。同时，阿娜伊丝也成为女性文学代言人。70 年代以后，阿娜伊丝被认为是现代女性性文学的开拓者，对世界文坛的性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 年，正在性解放运动达到巅峰的时候，教母阿娜伊丝·宁谢世了。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悼文称：阿娜伊丝“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由于她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少高等学府的文学系设立了比较文学的性文学专业，阿娜伊丝的作品不仅是这个专业的启蒙读物，也是被讨论最多的读物。在纽约大学，自 1977 阿娜伊丝辞世后年开始设立了“阿娜伊丝·宁纪念奖学金”，每年作为荣誉奖资助发给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位博士生。　　2003 年年初，在阿娜伊丝诞辰百周年之时，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再次举办了隆重的“性文学之夜”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位非凡的女人。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1）

香港词人记痕沈胜衣

通过词人而记录社会、时代痕迹之外，还常常借以浇私己幽微心事之块垒，记下个人的旧日心痕。　　　题记　　　必也正名乎，本文要谈的“词”，并非“蝶恋花”、“念奴娇”那样的古词，而是流行歌曲的词。说起来，流行歌词才是词的正宗、本义：“词”本就起源于民间，传唱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方为文人学士采用的，因此把流行歌词的作者称为今之“词人”，怕也不是僭越。　　香港，是现代化国际都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交汇处，中西古今，在这个港湾浮城结合得最为诡丽，其重要的产物之一，便是流行歌曲。1999 年春，我曾和几个朋友合编成一厚册的《今词选》，首度循传统诗词选的惯例，以词人系词，汇集了一二十年来的流行歌词佳作。有了这一批原始材料，我随即便选择香港现代流行歌坛中，作品数量多、影响大、有独特个人风格、取得一定成就的几个词人，略述一己心得，写下本文。其目的也正如选编《今词选》，是为了回顾自己听着香港流行歌曲长大的青春心灵史；亦是以受惠者的身份，向那些优秀的词人和歌曲作出一份致谢和致敬；还抱了一点野心，希望籍此考察上世纪香港这一独特时空的世情轨迹、人心与人生。当然，这一由小到大的递进关系也可以倒过来：题目用“记痕”一词，是安迪兄看了初稿后的意见，我采用了，就因为我在通过词人而记录社会、时代痕迹之外，还常常借以浇私己幽微心事之块垒，记下个人的旧日心痕。　　文章完成后，2002 年春曾略为修订补充，但总体来说还是上世纪末的旧作。然而今天回头看去，其中的观点、看法、判断仍是成立的、应验的，所以现在只作一些文字上的订正。至于采用的资料（歌词）也不增添了，所论及的词人，有些我后来另写过评述，则本文就作为对他们上世纪创作的一番盘点吧，算是一个“世纪标本”。　　　郑国江、卢国沾、许冠杰、黎彼得：　　少年悲欢　　　香港文化杂汇，昔日上海文化的复制、殖民地的色彩、本土地域文化传统，使乐坛在七十年代（指上世纪，下同）以前基本是国语歌、英文歌、粤曲的天下。而作为独特自身标记的粤语流行歌曲，是从七十年代正式起步的，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是少年；八十年代中后期，是青年；九十年代以来，是中年——恰好对应香港这一现代都市的发展期、成熟期和后现代调整期。　　看看郑、卢、许、黎这“少年时代”四大家之作，大致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些侧面影像。　　社会起步发展时期，创业艰苦，现实变幻，工作紧张，生活困难，流行歌曲便承担起给人们鼓劲、勉励和开解的任务。如许冠杰、黎彼得合作的《这一曲送给你》说：“如果君心里 / 常觉有顾虑”，那么“这一曲送给你”，说“人生有若游戏 / 他朝总有转机”，“愿能助你郁结消除”。郑国江也为人们《唱一首好歌》，有“想找到真的爱 / 愿天天都奔波”的鼓励，也有“忧得几多 / 满天风雨会渐过 / 冷天总会过……困境好快过”的安慰；为人们《喝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春风一吹草再苏 / 永远不见绝路 / 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 / 何事悲观信命数”，希望“将一声声叹息 / 化作生命力”；他愿与你《风雨同路》，“同度困苦与厄困”，要人们“不必怕多变幻”，“珍惜今天 / 盼望以后”；为孤独的奋斗者打气的《谁能明白我》则说：“昂然踏着前路去 / 追赶理想旅途上 / 前行步步怀自信 / 风吹雨打不退让 / 无论我去到哪方 / 心里梦想不变样……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 / 我继续独自寻路向 / 常为以往梦想发狂 / 耐心摸索路途上 / 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 / 到困倦我自弹自唱……奔向目标不退让”；还有《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 / 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 / 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寸寸 / 往日那份冲劲自信不会断……争胜的心是长远……只管耕耘成败不去算。”卢国沾则借电视剧、尤其是武侠剧的主题曲激发人们的昂扬斗志，如《天蚕变》：“命运在冷笑 / 暗示前无路”，周围都是警告，“山头猛虎满布”，但敢于“高视阔步”，“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 / 寂寞是命途”，承受抛开爱慕的代价，“永不信命数 / 经得起波涛 / 更感自傲……让我攀险峰 / 再与天比高”；《大内群英》：“我嗟叹大志不能遂 / 名利负累 / 傲气一生竟多畏惧 / 面对绝境 / 难道我会颓然后退 / 胜负存亡 / 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落下圣旨判了罪！”黎彼得的《天边一只雁》则用寓言手法，宣扬积极入世：“紧张社会斗争多险恶”，

使人宁愿做天边雁，可以不必西装革履，“抛开世俗的闷烦”，然而到真的做了天边雁，“长日对碧海与青山”，才明白这种出世隐者生活虽逍遥，但“无伴侣开解太孤单”，于是“怀念到缤纷社会始终多可爱 / 悲哀快乐有循环 / 当然有直有转弯”，“心底幻像已消散”，“回复新生”，重投社会。　　毕竟拼搏者是弱小的，社会的黑暗是沉重的，会付出惨重代价，会有迷惑、疲倦、怀旧，沧桑感乃至低落情绪都应得到反映，像卢国沾的《大地恩情》、《渔火闪闪》等便是如此。不过最终还是得挣扎向前，如郑国江有意无意间给那只重回人间的雁写了回应式续篇式的《孤雁》：“心里害怕芦苇的深处 / 再起杀禽声 / 不想多望 / 人面太狰狞”，“河边满地有伏兵 / 小小孤雁流浪飘零 / 忍着痛苦路重认”，但“行踪纵然不定”，“不想奢望前路安宁”，“虽已倦困仍要飞越重洋 / 尽管西风劲”；也为《似水流年》怅惘，“我的心又似小木船 / 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　　鼓劲之外，歌曲也不忘用人生哲理给予劝慰，如果真的争取过仍无法名成利就，那至少要为人们的感受留退路，让人们不必过于执著，不妨及时行乐等等。如许冠杰、黎彼得合作的《有酒今朝醉》，又如《浪子心声》：“难分真与假 / 人面多险诈……命里有时终须有 / 命里无时莫强求”，“名利息间似雾化”，那么“行善积福最乐也”。郑国江的《随想曲》：“名利我可以轻放手”，“不惯全力寻求”，“渴望是心中富有 / 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 / 心里无欲无求”；《星光的背影》：“我愿像浮云 / 轻轻的飘远了 / 抛开一切好逍遥”，“放下名利的纷扰”。卢国沾的《戏剧人生》：“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 / 尽力 / 毋问收获……快乐时要快乐”。　　情歌也不无相关社会情绪的折射。社会变局中，爱难以捉摸、常易失落，如郑国江的《爱的种子》、《赤的疑惑》、《不装饰你的梦》，还有那短促的《几段情歌》，优美的钢琴，云淡风轻，心细细的痛：“情人像是梦中花朵 / 难为我结真的爱果……平静水面轻泛微波 / 心底爱跟清风飘过 / 只一刹又回复当初 / 深印在我的心窝”。卢国沾的《风雨命运》：“此生早已永属你 / 可惜此际却未见你”，一切像被命运安排成这样，只能《找不着借口》地“眷恋半段《残梦》”。　　爱的失落也有为了事业去闯荡天下而不得不告别情人的原因。当时的别离情歌便常常透露出这种社会背景，如卢国沾的《人在旅途洒泪时》，郑的《我要走天涯》、《风继续吹》等。　　当然也有坚执的爱，以给拼搏者精神上的支持。如卢国沾的《紫水晶》：“人海中 / 不管数变迁”，“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万里相分依然怀念”，“誓约坚贞不会改变”，“共我已经经过千般考验 / 悠悠数十年 / 心不变”；以及许冠杰、黎彼得合作的《印象》、《夜夜念奴娇》，许冠杰的《难忘你》、《纸船》，郑国江的《分分钟需要你》等。　　市井世态、小市民心声在许冠杰唱的歌里得到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如他作的《半斤八两》，写“打工仔”的种种辛酸，他和黎彼得合作的《尖沙咀SUSIE》，写游手好闲的少女，日夜追逐新衣、舞会、飞车，歌曲最后是当时文艺的自觉的道德劝世：“但望阿SUSIE光阴咪（别）乱散 / 青春一去空悲叹”。　　还有乡土气息，是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对乡村的眷恋。如郑国江的《童年时》，回忆在家乡两小无猜的朦胧初恋，阡陌上采花插襟、花树上刻下两个心形、打秋千痴话要飞到星月上的小儿女情态，感叹何时能双双重回阡陌，重拾这一切。　　再听这些旧歌，多少有隔世之感。但无论今天觉得它们如何幼稚可笑，毕竟是一份真实的记忆，可当一个城市的野史笔记来看。这份“野史笔记”在写法上还有几个明显的时代和地方烙印：　　一是融会了古典文学以及粤曲小调的文言风格，如郑国江的《在水中央》、《再见杨柳》，许冠杰的《等玉人》、《双星情歌》，许冠杰、黎彼得合作的《梨涡浅笑》、《知音梦里寻》等；二是融入大量口语、俚语，以许冠杰、黎彼得之作为代表；三是电视剧、尤其武侠剧主题歌较多较流行，因为其时电视正大举进入社会，风光得很，卢国沾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现在武侠剧也还常有，只是其主题歌不再那么风行了，人们听来不再心潮激动、热血澎湃。人在少年时，还可以发发梦，特别是英雄梦；而社会发展的起步阶段，生活尚展示各种可能性，鼓励创造、允许争取，还提倡侠义之道，这是武侠剧、歌大行其道的背景。后来呢？用一句粤俚说便是：“哪还有这支歌唱呢！”——噢，有的，1987年，RAIDAS乐队也唱过一首武侠剧主题曲《饮马江湖》，先是“凭着佩

剑补救江湖”的昂扬，随后却在反思、感叹“难做半个名士”，点睛的是这一句：“谁人再说公义 / 正是故作无知!”　　这已是另一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认知，它的作者，是下面要谈到的拆散了梦的林夕。　　少年梦、少年时代就是这样一去不回了。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2）

林夕：　　把梦拆散的孩子　　　如果要为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词坛选出一个代表人物，非林夕莫属。他是新崛起词人中的佼佼者，风头最劲，影响最大，作品不但数量极多，更重要的是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牵引着潮流的转变;香港流行歌曲由青年期到中年期的状貌，进而香港这个都市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精神，都在他的词里得到了反映，他是这一切的代言人乃至创造者。　　他出道不算早，首度集中亮相，是 1987 年 RAIDAS 在乐队浪潮中应运而生时，他作为幕后主笔写的一系列作品；但起点很高，一出手已达到令人瞩目的水准，与八十年代精神“一步接轨”。　　《别人的歌》写卖唱歌手的辛酸痛苦，他们认真唱着的，是成名歌星的歌，人们随意点唱、公式拍掌，但“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风光是别人的风光，卖唱歌手永远没有自己的身份、名字，一生只会像那被人翻来覆去唱着的歌，“重复的度过”。在这首反讽地流行一时的名作和其他即使不那么出名的作品中，林夕为受压抑的一代青年造像。他们被现实压制，与社会对峙，不肯融入规范却又找不到出路，只有在种种虚幻中消耗人生:《没有路人的都市》是不耐现世的吟唱，爱的空间堆满琐碎事、诱惑和抉择，只能“偶尔妄想”“走在未来没有路人的都市”，才能推开纷扰，“想到永久的意义”，“爱得专注”。或者往回走，躲到古老的《传说》里寻找真正的爱情，“寄情戏曲与文字”，因为，“俗世的爱侣谁可永相恋 / 谈情游戏我早厌倦”，“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孤独的受伤者，《不愿置评》世人如观众般的“努力查问”和“习惯地慰问”，拒绝解释内心感情，“对答已极纯熟……每次都像念书 / 循例答道天气不俗”，乃至直接“报以冷的回眸”，就像那个《吸烟的女人》,“独自驾车与寂寥随处荡 / 她惯了靠吸烟 / 替代独自谈话……拒绝期望 / 就让一支烟 / 点起一张很想见的脸…….烧出一早封锁了的梦……让上升的烟 / 遮掩窗边不想见的路 / 谁人想发现 / 身边满是告示!”《杯中冷巷》说的是社会没有出路，人们只有借舞会发泄，在这里仿佛可以“两脚到处去踏去闯 / 迈向不知的远方”，用这种幻象来安慰、平抚自己，用酒精去溶化苦闷、治疗困扰，用舞会灯光来充作内心的曙光。《低调感觉》则描绘“抑压的梦想 / 永没形象 / 到街上 / 没固定方向”，“灰冷的月光 / 脚下浮荡……路却像灰网 / 围住我的孤独躯壳 / 我忘记一切感动 / 忘记了炽热阳光 / 我忘记内心感觉 / 忘记未浮现的期望”。丧失，不但是感受，还是切身的现实：从前欢聚畅叙，半夜的吵闹、对骂与无聊玩笑，都“不觉荒谬”、“不会追究”，无奈这种无忧的日子终会到尽头，到了要在社会中拼搏之时，“觉得不可以这样”了，《热闹过后》，“令我放心的挚友相继流走”。“大家纷纷找得到恋爱 / 还换到无数困恼与事业”,“日子充塞种种感觉 / 麻木了便觉世界每日如是”。“谁会永远念旧”呢？“总要借口才借故聚头”，然而重聚却仿佛陌生，“当天的好友 / 没再出现”，“回头望真正的好友 / 渐次失落 / 人永远寂寞”。《某月某日》是对后来的庸碌生活的进一步展示：“习惯问候或分手 / 安慰笑容近况和寄望……习惯会面或告别 / 浅笑喝茶睡觉和说话”，最绝的是最后一句：“于某一刹那说失意 / 每日如是”——连倾诉失意都不过是刻板日子中的固定节目，反讽与无奈尽在其中。类似在宣泄不满的同时自嘲反讽的，还有《穿黑衣的少年》，他用恋爱来解闷，戴黑边粗框眼镜，穿黑色反领风衣，仿佛故意暗示沧桑、忧郁的感受，他是“为冷漠装出冷漠”，“爱把冰冷公演 / 习惯集体高呼空虚冷漠 / 不懂慨叹 / 但表示痛苦便要努力冰冷”。　　RAIDAS 之外，林夕也为别的歌手创作了大批精彩的作品。如《心病》：“从前大谈未来 /是否想到活到今天竟已无

说话 / 点起香烟 / 侵蚀年华 / 灿烂尽时 / 随处躺下……”这是一首情歌，但谁又能说所写的不是现代都市人的“心病”呢？　　《风花雪月》更是直接写照，日子奔奔波波，“嘻嘻哈哈跟人说我炒美金有赚”，赚钱后的消遣无非是卡拉 OK，“而叮叮当当当年我吉他已不会弹”，“紧紧张张找人到处玩 / 要分分钟钟消磨得灿烂 / 而轻轻松松一个人去看海——刺激有限！”乃至“生生死死的情感已经觉得太烦”。“要这要那都有了 / 热热闹闹早预料 / 这里那里却有点似缺少！”词人的叹喟尽在其中。　　现代人总是在得到的同时失去。青春与爱是这样，且听《天若有情》的悲凉祈求：“只求望一望 / 让爱火永远的高烧 / 青春请你归来 / 再伴我一会”；且听《似是故人来》的透彻认识：“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粤语，合衬之意）”，“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生命苦短，“执子之手却又分手爱得有还无”。　　亲情与纯真也是这样，《赤子》无限感叹：“跌跌碰碰里投进声声色色间 / 谁伴我看长夜变蓝 / 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间 / 谁愿永永远远变得短暂 / 冷冷暖暖里情意亲亲疏疏间 / 人大了要长聚更难”,“你我似醉了 / 无法清清楚楚讲 / 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 / 世界太冷了 / 谁会伸出一双手 / 围住你再营造暖流 / 说说笑笑里曾觉得欢欢喜喜 / 谁料老了变了另有天地 / 世界太阔了 / 由你出生当天起 / 童稚已每年渐远离……”　　孤独，还常常来自人的自我封闭。一种是《侧面》说的自我掩盖，“夜晚会面 / 白天道别 / 才没有弱点”，加上人心的隔阂，以至恋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侧面，无法“窥看思想的背面”。另一种是《让我孤单过这一晚》式的拒斥：当夜色来临，不想说话，不想找关注自己的人，有一种刹那的苦闷不想解释，就算情侣，也无法进入孤单充塞的生命的另一半，总有对其关上心门的一夜；只需要孤独，“抹去繁华”，与长夜对坐；“闹市太喧哗太闪耀”了，只想一个人看看浪潮、听听童谣；只愿世界在这夜遗忘自己，让自己可以做这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重拾自我。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变化悄然发生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旧风格悄然退场，林夕就像他在《不夜情》中写的那样改变了自己：“热闹过后 / 时针倾斜 / 熟练的手势 / 将天与地都推卸”。技巧进一步纯熟，聪明的遣词用字俯拾即是，但内容则换上了大量编织得诡丽的情欲爱恨、动人的男女烦恼、灯红酒绿间的意乱情迷、抽象的感觉、具体而细微的情绪，感情向感官靠拢，悲哀与煽情共冶一炉，一个浮美、迷离的全新天地在他笔下展开。在这里，有《暧昧》的《春光乍泄》，“唇是我而眉是你”（《知己知彼》），《享受》着飞来飞去数不清的吻，（“二人不热吻做什么？”）“浑浑噩噩为一场气氛”（《你我之间》），“如果不自寻烦恼没有什么值得哀悼 / 我和你爱来爱去是否为了凑凑热闹 / 看日出日落没有什么大不了 / 再伤春悲秋小题大做犯不着……我们都来手舞足蹈 / 我们都该欢笑。”（《小题大做》）是啊，既然愿望是那样靠不住（《愿》写得布局精彩触目惊心，先是大谈“最美一幕 / 还未闭幕”、“最好知己 / 永在身旁”、“我想相聚 / 谁便再聚”等等好事，说“我自信有日如愿 / 纵使天高地厚 / 仍被我逆转”，然而到林忆莲轻轻唱出最后一句——“当结局未揭穿”，刹时前文的美好全部推翻，这时再想想那歌名，便更让人难过起来），那真的倒不如全情嬉戏，“倒不如找个 / 想去的地方 / 不用费思量 / 愉快的地方……不用再流浪 / 娱乐的地方”——《娱乐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游戏）》，“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变游戏”（还记得以前他说过“谈情游戏我早厌倦”吗？！）真诚一点，也只能是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编织一份心满意足，“如果要说何谓爱情 / 定是跟你动荡时闲话着世情”。但，因为明白“我的命中命中 /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暗涌》），及“因为我再不能够对爱情盲目崇拜”，就往往连这都保不住了，《教我如何爱一个我爱的人》？“只好每一次都加倍珍惜下一个恋人”，这已便是他们关于未来的清晰希望。至于从前和回忆，则更是一场《迷路》式的迷乱：“继续怀念你动作话语时间情境 / 是四月那雪景、八月那雨声……”　　由青春激荡、自我放逐、疏离现实、对抗社会、对人生作形而上的透视、对生活带批判色彩的反映，到拥抱浮华、游戏人生、解构爱情、关注和体贴快速变幻时代中的《怨男》哀女，林夕完成了一次优美顺畅的妥协性的战略转移。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3）

当然这不仅是个人的转变，更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底蕴的转变。九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配告一段落，规范建立完善，一切按部就班，上了轨道，空间收窄；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拼搏创业者，或已事业有成，或也稳定小康，八十年代彷徨与呐喊的少年也已长大成熟，知识分子所代言的对象，自然由劳工、小市民等低下阶层和热血青年，转为中产阶级、白领人士等社会新主流——而且他们自己的身份也如此改变了。　　在这新的局面中，适逢其会的林夕，与社会新风貌配合得特别绝妙可人，他和王菲、复出的张国荣（他们都是林夕新风格的受惠者）等歌手一起，向都市男女提供一份精致的精神美点：主食是倏忽来去的会心、小资情调的心灵安慰、轻佻的情绪发泄、眉来眼去的舒缓压力，不时来一点脱俗做甜品，鸡尾酒般的文化气息配些言不及义的思想用以提升格调。他们共同构成一种文化符号，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白领这样一种精神和生活风度：小心翼翼地，既与流腔俗调，又与偏激澎湃保持距离，差一点就颓废了，却用唯美的舞步及时刹住；将要躺进媚俗的怀里，却又用不羁的眼神口风撩拨之，两边都搔到痒处，但原来他还在中间飘游——依然是世纪末无根的一代，不过这无根不再表现得激越，带虚空、断裂的痛楚，而是舒服的漂浮；依然有心灵的怨悲嗟叹，动荡、迷惑、不安、无所适从，但这些却不再是属于象牙塔的，而是属于十字街头；依然是纵情声色的末世心态，但不再是“无中生有”——求出路不得便麻醉和放纵自己，而是“有中生无”——有了金钱事业地位做依傍的享受和游戏。八十年代的嬉皮士，变成了九十年代的优皮士、雅皮士。　　当年的达明一派出过一张唱片题为《神经》。也许现在人们需要的是浅浅的动心，而不再是时时绷紧神经了。1989 年达明一派还出过一张《意难平》，而 1996 年林夕为新达明写的《万人迷》里如是说：“别要一脸意难平！”这或许是巧合，或就是对旧日的明确回应——不错，要说“转向”，我在写达明一派的专文《哀艳达明词》（载 1998 年 11 月《万象》创刊号）中介绍的，黄耀明及短暂重组的达明一派“转向”的代表作，《爱色》、《甜美生活》、《晚节不保》，以及《边走边唱》等，就都是林夕所写的。他们与林夕一在幕前一在幕后成为新搭档（参后陈少琪一节）。《哀》文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与时并进，跳出旧日的折磨心灵消溶生命的形而上小圈子，下象牙塔而到十字街头，走入踏实人生……这些原不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体，却是我们平常人的自然选择。只是，新的一代可以从一开始就投进“万人迷”的声声色色间，而林夕、达明这些由旧入新的一代，虽已不再整天一脸意难平，但到底会在嬉笑的面目下流露旧日情怀的回响、偶尔的自伤自怜和留恋，以及因现实与内心双向消磨对自我的改造所带来的痛心、懊悔、苦涩、苍凉，如《忽尔今夏》、《这世界非我家》、《晚节不保》所反映的。　　因此简单的批判或赞扬并不能穷尽林夕们的变化，这里面实在有复杂的滋味，下举两首林夕九十年代的作品，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原其心迹。　　《懒洋洋》里有惊心的一句：“花 / 开过了就不愿意再成长 / 只剩下余香”。这正是林夕，以及他的盟友，以及时代和社会的精神写照。曾经开放过，瑰丽超拔，但一切方生方灭，（时间的脚步、时代的转换真是急促啊！）面对新的时代，都不愿意再生长下去了——其实，不说季候的转变，只以花本身而言，愿意就能永远生长、长开不谢吗？（愿望是何等的靠不住，想想刚才谈到的那首《愿》吧。）而且，有过灿烂的回忆，还有必要见好不收死缠烂打勉强支撑下去吗？不过，又到底有过成长中的心痕，因为接受过什么，就不能像《有心人》说的“但愿我可以没成长 / 完全凭直觉觅对象”，于是林夕在明白之后，只有采取一种“爱得懒洋洋”的慵倦姿态。我们都一样，只剩下余香。　　还有一首可视为心声自剖的，是《哀》文未曾展开介绍的《我们不是天使》：“不期望天天向上 / 只知道生命无常”，“飞不出欲望的围墙 / 总是堕落在谁的胸膛”，“我们不是天使 / 我们只是孩子 / 寻找可以安躺的

海港……沦落在五光十色里流浪”。就是这样，后来的林夕们，九十年代的我们，不再是、或终于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天使了，只是五光十色里的孩子！　　世界对梦是残酷的，那就像个顽皮的孩子，把梦拆开重新摆布，改头换面成“林夕”这样两个字，混迹于现实中，与之同台嬉戏，旁人不再认得这原本是“梦”了，或许才能保存它的一脉生机；或者说，与其梦被追剿、被支解，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去拆散它，换一种名义生存下去。　　是这样吧？2002年3月附记：2001年下半年，林夕出了一套《林夕音乐词典》，集中听了这批近年之作后，感到其新近作品的风貌与精神，仍正就是我在上文中指出的，那种红男绿女的浮世欢嬉——而且，这拿手好戏他越玩越泛滥。　　这《词典》里的歌，无非是被漂亮时髦的衣裳包装起来的心事、被霓虹照得闪亮异化成珠宝饰物的泪珠、在匆匆行色中稍为驻足的零散感慨、由少年们钟情的新潮物质堆砌起来的欢欣、用难辨真伪的疲倦与软弱点缀的风尘、理直气壮地拥抱着的后现代生活和情感……如歌名所示，《热血青年》变成了《模范生》（“别以为我还是个热血青年”，“我”“只想相爱，不想伤身 / 誓要快活，坚拒自刎”），《理想年代》被《失忆周末》替代（“无愿望也可过活”，“无需思想的周末”），他在《欲望之城》《带你看风景》，看到内心的《暗涌》到头来只不过托起了这么一个《漂流睡房》：“新鲜的寂寞新鲜的汗 / 转过了年轮转过了床”……早岁的大气内涵已无存，适时的小资格调更精彩；现世常见附庸风雅，他却是附庸时尚，把文人气质降到陪衬地位，去为市井流行的风情添色增彩——至少在这张《词典》中是如此。如他为黄耀明写了不少好歌，即使近年也有不少佳品，可该碟偏偏只选了《漂流睡房》和《春光乍泄》两首入时之作，不知是否有意为之，反正足以反映其近年的主调——这些歌使我想到的一个意象是：浮华声色中，一杯低度数的，不求醉人但求制造气氛与情调的，颜色漂亮杂七杂八的鸡尾酒上，漂浮着的那一堆晶莹、细腻、芬芳的泡沫。漂浮，我在上文已用过这个词。正是这样，这些轻轻浅浅的、悦耳如风听过就算的作品，与其说是向下的堕落，毋宁说是向上的浮起。我喜欢现世的水面，也留恋形而上的海底，然而在这一时代，只有少数人如刘以达还在痴迷奇诡、瑰丽、洁净的《水底乐园》（科学研究表明，最清洁、最未受污染的水源是深层海水），人们纷纷追求向上，由深海浮出水面（更不必说那些从不曾领略海底风光者了）。　　不过，恰就像人类从海洋中进化上岸后已再难回到他的家园（要回去也只有借助现代工业制造的工具，潜艇、潜水衣等，而无复本来面目），这是造化的规律、发展的必然，也是很好的象征。回不去了，所以我并没有批判林夕之意，因为我们与他一样，都无可挽救地漂浮于水面，生命就像浅酒上的泡沫又让情感陶醉于这种泡沫，生活就像怒海上的睡房又把灵魂寄居于如此睡房。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4）

潘源良：　　两个自我，或一种策略　　　在我心目中，潘源良是一个“异数”，作品左右逢源、雅俗并举，既是大众情歌的杰出弄潮儿，又“出人意料”地常会有脱俗超拔之作。别的作者也存在这种情形，但据我看不如他那么突出，因此很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讨论。先看他的情歌：《爱情陷阱》、《情已逝》、《痴情意外》（与时葆茵合作）、《容易受伤的女人》是其风靡万千民众的得意之作，分别令谭咏麟、张学友、陈慧娴、王菲的巨星地位得以确立。此外，风行一时的作品还有《还有》（情之微妙，要结束它吧，“尽力避免到最后还有”，然而，“就是害怕到最后 / 还有”），《最爱是谁》（爱之难以捉摸，人对自己的“最爱”并无绝对的答案，“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 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面对苦苦寻觅得来的眼前人，偏又后悔，对另一个她梦魂相牵），《闭着眼睛再见面》（一份“自怜的欺骗”），《遥远的她》，《半梦半醒》，《风雨故人来》，《海誓山盟》，《留住我吧》……即使一首不太出名的《失恋专家》，也有一个小故事可说说。此歌有两句：“背脊很酸 / 身躯很软 / 像块将酒精完全吸清光的海

绵”，十多年前在大学时，我曾借郭小霖这盒带给一个朋友，她还带时什么也没说，我以为北京女子对香港歌曲听不入耳，后来有次我们宵夜喝酒，她忍不住讲起她的失恋，说：“唉，我当时的感觉，就真像郭小霖唱的：‘背脊很酸 / 身躯很软’……”其情歌的刻画细微、妥贴人心可见一斑。　　然而，他又创作了一批“另类”的、直面社会的、带形而上思索的优秀作品，让我不止一次惊讶：原来这也是潘源良写的！比如，他是达明一派（及“后达明”）的主要作词者之一，像深刻展示时代病症的《四季交易会》，痛诉社会对青年压抑、残害的《没有张扬的命案》，揭露政客虚伪、善变的《同党》，刻画世态人心的《十个救火的少年》，感慨聚散、怀念好友的《今天应该很高兴》，反映自我分裂矛盾人格的《我有两个》，用比喻手法回顾香港历史、表达回归前港人心态的《明珠的婚姻》，叹息时间摧毁美好的《当美丽化作灰尘》，等等，都出自其手。又如达明之外，他为泰迪罗宾写的《乡愁》：“星 / 不闪也罢 / 让我看清楚家乡貌 / 长夜念过去 / 淌下了几滴泪 / 泪光中怎看见 / 是故乡的星……实在太远 / 已不可再归家 / 就是太远 / 每晚夜更想家……”这是“太空人”组曲之一，把对象置于茫茫太空，短短的篇幅，写出苍茫、刻骨的乡愁，即使从未远离家乡的人听来也会动容。现代都市人在灵魂深处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情意结，及一种有家难归无枝可依的愁绪（精神家园或是被自己忍痛割舍，或是被外力无情掠走），这首歌正牵动了那份“回不去了”的苍凉。　　潘源良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文人通病，无论在商业社会还是专制时代，都会有那么一批工匠式文人，听命而作，接受来单订做，只有才华没有个人主见，顾客或主子要什么，潮流风行什么，他都能以生花妙笔及时奉上。　　但我情愿提供另一种可能性：他并非毫无自我，《爱情陷阱》是真实的他，《四季交易会》也是真实的他，两种“主见”并存于他身上，他也“有两个”，通过不同形式展示出来的，都是有感而发的真情作品。　　对潘源良有信心，是因为我在他不少作品里发现智慧之光的闪烁。如《凭着爱》写到：“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 / 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这是爱情的哲理，也是生活的哲理，就是要经过那样的跌倒，才能明白和接受平常的爱与生活。类似的还有《你好吗？》中的“唯求一壶浓茶 / 来平静内心的风沙”，《偷闲加油站》中的“让你我完全投入平淡 / 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当然，这种返璞归真的论调即使在流行歌曲中都也是老生常谈了，那么我们看看他这方面其他的佳作。　　为达明写的几首作品：《你还爱我吗？》，一方面，因“现况天天在变化”而担心情感也会变，另一方面又觉得“没变动只怕僵化 / 习惯天天共对 / 怎么知道情会否简化”，矛盾中自有理性的思考。至于《同党》在讽刺左摇右摆面目不清的政客之余，所流露的自嘲（那歌词似可视为他对自己两面式的写作状况的认识），以及《玫瑰园》的智者心怀，我都已在《哀艳达明词》里谈过了。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为林子祥写的《昨日街头》。　　这歌先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小时候“瞒住母亲 / 报称功课做完”、到街头玩耍，那球场外的“安乐园”雪糕档、“百乐门大戏院”、橙子新鲜诱人的“万利”、卖鸡粥炒面的“老张”……，都给童年带来了欢乐，令他留下亲切的回忆。到现在，一切都几经改变：“老张”已拆迁，“百乐门”只留下旧入场券，“球场现在是七百个家庭同住的新村 / 鲜橙早已被装罐”……云云。老实说，类似的作品古今中外有如恒河沙数：过去的淳朴乐园如何如何，今天城市化工业化怎样怎样，今昔之叹，是文人的“强项”，尤其在“怀旧”成为一种“强势消费”的时下更是吃香。但潘源良的可贵之处、特别之处是能从另一角度去看待，接下来他写出一份明悟：“谁人现在为此数百万人筹划跟打算？”“原来在这社会 / 必须适应自然”，“莫问昨天的好 / 今天怎么不出现 / 谁人用过心机 / 了解地球在转”。这个角度也是一种高度，不但对人（数百万人的生计），而且对天——发展变化，是自然之道，我们总批判“适应社会”会造成自我的丧失，但为什么不想想，城市化工业化其实正是人在适应自然（规律）之道呢？地球总要转下去，有所丢失也是常理，为什么我们不对负载着我们辛勤奔波劳碌、为我们创造一切的这老地球，寄予一点同情，却还要去诅咒所得的一切呢？！　　因为有这些充满睿智的作品，使我相信他不会是一个应景文人。前述的“两个真我”，并不一定

是人格分裂、两副面具那样的贬义，还可理解为：有那么一种人，雅俗并存于心胸，既深入又浅出，随意挥洒，互无碍滞；甚至，所谓“雅”、“俗”只是我等无聊人的人为设置，真正智者的心目中本无这样的划分，万物等同，从其所好，随心而动，任由评说扰扰而并无计较。这是一种我景仰的境界。　　这会是潘源良吗？如果觉得似乎太夸张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他是借讨好世俗从而保全真正的追求。写主流情歌以维持生计，更维持他的词人地位——词人身份若不存，如何能让另类作品走向社会？这也许是悲剧，是无奈，是商业文化对高尚的压抑，令“雅”要沾“俗”的光才能生存；但也可以从好的角度想，视之为商业文化对高尚的贡献：因了“俗”的自由，“雅”才得以走进人群。　　我想起了“蓝战士”。八十年代有个摇滚乐队取名 Blue Jeans，“蓝战士”是音译意译结合，潘源良为他们写过一首歌，歌名就叫《蓝战士》，可推想是相当于乐队宣言的。这“地下乐队”所面对的是：“从前情怀再找不到”，“世界却爱新的一套”，“世人笑称他老套”，“知音偏偏找不到”，“受伤多得不可胜数 / 却换来冷嘲式劝告”……但，他们的信心不因此动摇，“他清楚 / 他的歌 / 真的好 / 尽管多么古老”，决心“战士路 / 只身走到老”——这，又何尝不是潘源良心灵一角激情的宣示呢？然而后来，作为一个团体的“蓝战士”终于不能把战士路走到老，散伙了。无法维持下去有生计的原因，也有不肯适应商业文化游戏规则的原因，包括接受不了市场对个性的摆布制约，不肯在“来单订货”面前低头，于是，其主要成员黄良升宁愿向社会低了头，转行去做保险顾问——既然斗不过了，与其挣挣扎扎、委曲求全，使心爱的事业变质变味，不如干脆放手，不让形而上负担形而下的重压，老老实实做个“社会人”去弄两口饭吃，倒还可以使理想干干净净地保存在回忆中，这，是一种选择。　　可是面对类似情况，也有人不曾放弃。虽已“梦似烟花心似水”（《烟花句》），然而因为太心爱、觉可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长处等等原因，坚持下来，在出世与入世间求得一种平衡，有机会就去写非主流的心声之作，平时则写些大路货色、垃圾作品以求生存，但也尽可能写得像样一些，在媚俗的面目下悄悄注入一点思想的元素，这，是另一种选择。“一生四面八方 / 都有着恶运埋藏 / 你我也一样 / 只有抵抗。”（《结伴同航》）抵抗的方式，是黄良升那样彻底的决绝、“卖身不卖艺”，还是潘源良这种明智、通达的策略，真的说不上谁更好，也说不上哪种选择更能维护理想和心爱事业的尊严、高洁，总之，面对现实的恶运，存在着这样的选择吧——也许，我说的已经不是、或不仅仅是潘源良了。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5）

林振强：　　手中失去，心底爱抚　　　林振强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被离弃者、被压抑者，及自外于社会主流者的描写。这类题材其实也算常见，且不能说林振强写得最好，只是觉得他对这个主题写得较多，取材较广，塑造的这类人物较全面，因而可以以他为例，展示流行歌曲中的这一领域。　　情歌是流行歌曲中的主要类别，首先出场的自然是失恋者。林振强笔下“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为黄凯芹写的歌名）林林总总：有被玩弄如《小丑》的，“街坊笑他太笨 / 将心送给女人 / 应知这种态度 / 今天已经老土”。有穿起情人留下的毛衣当是跟情人再次抱拥，让它“从此每天饰演你”，回味旧日一场好戏，“准许我做旧角色 / 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的《傻女》。有弹吉他的男子，“我在笑我似个笑话 / 一生都追踪空气”，痴心苦等，既盼她跟新欢快乐，又怕新欢伤了她的心、愿意随时再接受她（《吉他低泣时》）。有弹钢琴的女子，奏出旧日彼此喜欢的老调子，不禁泪下，“激奋敲琴”（《雨夜钢琴》）。还有什么也不弹的，但偏偏听到夜店里播着“旧日你喜欢哼的歌”，于是“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闭起眼睛想过去”，感受《绝对空虚》的痛苦，只但愿自己没有往昔、没有记忆。然而，也有人在一把风扇的懒懒转动下，不经意想起多年旧爱，“唯荡进淡淡记忆中 / 不舍

去 / 在打转 / 在转”(《也许》)。《我和你》并肩走过的四季那么美，是难怪会“闲时留在过往中打转 / 轻抚琐碎的旧片断 / 仍是那么眷恋”的了。《一些事一些情》总长系于心，“从前虽已是静如水 / 沿途望望旧日散聚 / 仍然静静掉下眼泪……繁忙的岁月令人疲累 / 只好夜半随回忆荡远去”。记忆是如此重要，以至有时候，明知“没法可相恋到底”，但为了“让记忆添一分美丽”，唯求相伴《最后一夜》——说什么“有没有将来”呢？“以后未来是个谜 / 不必牵强说盟誓”。但有时又厌倦了“凭着游戏来代替闷”的一夜情，到底“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拒绝再玩》不羁偷欢的把戏。可恨的《偷心者》，令从前喜欢的雨天都变了色成为《蓝雨》；然而不是所有故事都可指证谁对谁错的，情形也可能是：“哭你我坚持 / 仍然未能成事”，“我痛心你我坚持 / 却终于理智”。(《再会了》)爱走到如此地步，怎不教人有刻骨的《倦》意…… 看厌了男女情爱，我们且听听另一种告别之歌。1989 年陈慧娴暂别乐坛离开香港时，林振强为她写下了《千千阕歌》这首经典作品：“明日纵使千千阕歌 / 飘于远方我路上 / 来日纵使千千晚星 / 亮过今晚月亮 / 都比不起这宵美丽 / 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 因你今晚共我唱……”当我们也逢着盛宴将散时，这样的歌，岂能不引起内心共鸣；而当已来到从前说的“来日”，回望长逝不回的良宵佳日的一切，重温此歌，更是感慨系之矣。 陈慧娴早年一曲《反叛》也是林振强写的，说师长关心，要她温习功课；亲戚夸张：“沙滩中充满坏人”；爸爸紧张，“不准穿短裤热裙”；“妈妈天天训导 / 说少女要留心 / 男孩如凝望你入神 / 万别让他接近”。自感常常像个犯人，“每次我说我不满 / 尊长即加倍主观 / 次次判我不对 / 太似冒牌法官”。这种“到处有太多审判”、“但被限制怎去玩”、“成年人常令我烦闷”的苦闷和反叛心态，怕不仅仅让青春期少男少女会心的吧？ 人与社会的相互拒斥其实还可由少年阶段往前推，也许就是天生的。像《三人行》里的小女孩，“童年时逢开窗 / 便会望见会飞大象……飞象如共我 / 常在天上漫游”，旁人骂她“失常”，但她“任人胡说只是坚持”，已懂得“漫长漫长路间 / 我伴我闲谈”。长大后，更是不去管别人说我“自满，以心做伴”的闲话，“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也好，反正“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 这首歌有一份自得其乐的悠然，但自我放逐、在现实主流之外保持独立的胸怀与眼光，并不是总有这种好心情的。会惆怅，像《这一个夜》，“坐于窄巷”，“脚边一只 / 破旧皮箱”，奏着吉他唱着带凉意的孤独的歌，慨叹“何时才付满空虚帐单”；也会愤怒、迷惘，目睹世上“私心将彼我封锁 / 香槟侧边太多肚饿 / 政客说慌偏偏却通过……老妇幼子也中枪火”，种种肮脏令“蓝天碧海都不好看”，而祈愿“世界不分肤色 / 不分你我”等等，却被世人“笑我太天真太傻”，只有悲歌质问《一切为何》。 被离弃、被伤害不仅仅来自横向的社会现实，更有纵向的——时间。这方面，林振强写过两首关于和涉及怀念父亲的歌。《空凳》，写“曾在远远的以前 / 这凳子里 / 父亲仿似巨人”，“在远远的以前 / 凳子很美/ 父亲很少皱纹”。如今，时间已永远带走了父亲，想要和他再度促膝而坐已不能，追悔“过去我说我最是要紧”、“懒说半句我爱他”，但，“听我叫喊 / 只得一张空凳”。 《追忆》则先写童年时看走江湖耍把戏艺人的表演，然而戏班终要离去，令“我”开心的木偶不会留下；然后，“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 / 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 / 首次跟他喝啖酒”，然而父亲也终于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禁问：“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 / 像时日总未逗留？” 描述父子情的亲切，之前还有许冠杰写的一首《父亲的钢琴》，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作品。然而到九十年代，达明另一重要词作者周耀辉为黄耀明写的《你真伟大》则如是说：“为何为何爸爸你懒去听我说话 / 为何为何爸爸你永远要我听话”，“爸爸爸爸如全知”，“说我太过放肆 / 孩儿孩儿如无知”，“何时何时爸爸你我放弃有高下”，“你那样永恒 / 你那样坚壮 / 你那样伟大 / 你似上帝我却似蝼蚁”，“是你生我是你在锁我”，“是你给我 / 望你别给我 / 望你不要关心太多 / 若你经过 / 让我亦经过 / 让我飞去 / 即使折堕”。前后对比，社会伦理、人心思潮的转化，在“父与子”这一题材上都悄然得到印证。 不过这只是插话，《追忆》更令我看重的，是它接下来的对流逝的领悟和豁达：“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庆幸 /

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 /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 现仍在心内逗留”。　　前面介绍的情歌已有好几首写到过回忆，看来林振强对此颇有心得。这也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但在香港流行歌曲的范围内，要数直接以“追忆”为题的这首，曾带给我最深的感动与感触——在我知道自己将为人父时，恰好曾重听此歌，看着林子祥牵着儿子的手、唱着它来作为其二十年回顾纪念演唱会的压轴。　　成长的困惑、失落后的孤独、孤独中对生命本质的最深领悟与感激，都包含在这首歌中。　　是的，时间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它掠走一切美好，改变、击溃、扫落、乃至毁掉我们。而人类要对抗时间（是对抗，求不败，而不是战胜——不存在战胜时间的方法），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生育，用下一代的生命延续我们，使自己无法兑现的愿望不至灭绝无形；二是记忆，用追忆来把美好留在心里，求得永恒。仅在这两点上，时间是无能为力的。　　岁月无情，时日不挽，但我们可以抚摸着心底留下的印记，“从前谁曾燃亮我的心”，不管人、物、事、情，都“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正如泰戈尔说过：“把我们手中丢失的一切，放在心里爱抚”。　　不但对付时间如此，怕这也是所有被离弃者、被压抑者、被伤害者、自外于社会主流者的法宝吧。　　也只能这样了。

第四部分香港词人记痕（6）

陈少琪：　　留在平原身后的山峰　　　我用这个心爱的词人来结束全文，因为，在他身上似乎隐含着一种“终结”或者“终极”的意味。　　当然他的词本身也极出色。他最主要的、成就最大的作品，是当年为达明一派写的，它们以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关注社会，叹喟人生，讽喻政治，为受挫、颓废、迷惘、幻灭、虚无、失落、灰暗、不满、愤怒、苦闷、焦躁……的一代人代言。如我在《哀艳达明词》中介绍过的，《石头记》（与迈克等合作）、《马路天使》（与黄耀明合作）、《迷惘夜车》、《伤逝》、《迷恋》、《今夜星光灿烂》、《诸神的黄昏》、《禁色》、《血色蔷薇》、《弃》、《后窗》、《无风的秋季》、《美好新世界》、《神奇女侠》、《溜冰滚族》、《最佳朋友》、《溜走的激情》、《爱的作弄》、《你你我我》、《你望我望》、《惑星》等等令人难忘的歌曲。　　而进入九十年代，他明显地佳作减少了，影响下降了，几乎可以不必一提。是江郎才尽吗？我情愿理解为：他属于并留在了一个过去的时代，有达明一派的八十年代。　　他不像林夕那样能及时把握时代变迁，与时俱进——林夕未为当年的达明写过词，到达明散伙后他才成为他们的主要作词者之一，前面已说过，达明“转向”的几首重要作品，都出自林夕之手。而此前达明一派的“御用填词人”、准成员却是陈少琪。我点算了一下，达明未散伙前的作品，除去混音翻唱的外，大约有七十首，由陈作词的就占了三十二首（包括五首合作）！到达明一派分手各自发展（中间短暂重组）时期，也就是“转向”后，明与达分别共出了十多张专辑，他却只为刘以达写过一首词——黄耀明独立出版的第一张唱片《信望爱》，文案最后一页是张模糊灰调的照片，只有垂首抽泣的明，和一行小字：“献给刘以达、陈少琪及俞琤”。在灰凉的背景下，把达明一派时代他的标志、那飘洒飞扬的长发剪掉了的明，那样一个大男人，就那么突兀地，如孩子般无助地痛哭饮泣着，令我动容，至今难忘。天作之合的同心者的分手，是世间最令人悲恸伤感的事。后来明与达曾重新合作，陈少琪却始终再也没有在明的新路上出现。这里面大概牵涉一些个人因素，但他与林夕的交叉换位，也无疑可视为一个象征。　　他也不像潘源良，在出世入世间那么左右逢源举重若轻有两支笔。他的拿手好戏，还是当年那些颇得英美现代诗精髓、如狂剑乱刀挑开人性与社会黑幕的愤世嫉俗之作。　　然而，批判的思想、宣泄与控诉，至少在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是不再吃香了，人们的末世情怀已转为林夕的那种，听众已不愿聚精会神地让被生活磨倦了的心又被深刻的理念、沉重的歌声再磨倦一次。盛宴结束了，可他是散去的人群中最不能适应新时代新潮流的一个，连当年的战友，明与达，都调整了面对时代的姿态和距离，告别了武

器，调节好自身，或会依然执著迷恋，却又已在现实中颓然平静下来，适应着生活的打磨，厌倦了过去那些广大的主题、形而上的冲动，关心起细碎、可亲的身边事情……那么，不合时宜的他星沉雨过，“灿烂不再”，就是一个寓言般的必然了。　　当我翻看他为达明一派写的陈年旧作，不禁有点黯然神伤，因为从中竟发现不少一语成谶的、可作为他日后遭遇注脚的、及今昔恰成比照的东西。且随便挑一些，虽然各有其原旨，但也不妨串连而成陈少琪在九十年代的情状。先是最早期的《长征》，里面有奋斗者的迷惘：“前路满是疑问……沿路满是迷惑 / 没有指引”，但却有知心伙伴“补救我裂痕”、“广阔我胸襟”、“尽破灭疑问”、“为我指引”，于是欣然高歌：“回复我热情 / 前路看清”，可以“长路远征 / 疲倦也未停。”然而到后来，一切《乱》了，“世间一切在变样 / 变了样”（《血色蔷薇》）。他“似难习惯地面无数变幻 / 人面压迫的空间 / 已难面对日夜城市灿烂……”（《崩裂》）只能叹息那《溜走的激情》：“谁会料到难再共你奋斗！”而“哀求 / 问你心能否 / 轻抛开拥有着成就”是无人理会的，因为人人都随着时代的步调前进，只有他：“我所走 / 仿似是退后！”那就循与世俗相反的方向《上路》吧：“旧梦褪散 / 骤觉已晚 / 心灰意冷 / 沙滚滚 / 忆失却光阴……路更弯 / 烟雨更冷 / 独往返 / 哭笑顾盼……寒夜对影慨叹 / 天苍苍 / 今天各一方……夜月悄悄 / 独在冷照 / 芳踪杳杳”（与迈克合写）。这时并肩长征已变成了《一个人在途上》，既然“寻遍世上 / 却也找不到纯真”，身边的声音虽近却“找不到旁人留心”，那只有以晚空星际做知心、良朋、情人（与黄耀明合写）。也仍有怀念：“那夜梦幻又默默闪……沉思千百遍。”（《迷恋》）但也只好告诉人们“别要为我等候”，“此际踏向梦幻 / 越过万里阻限……此际越过夜静 / 路向没法肯定 / 寒风和应。”（《别等》）　　以上当然只是借题发挥。换一个角度来体味歌意，则又另有可注意的地方：诉说别离之情，让对方别再等他，这题材并不鲜见，香港当代流行歌曲初始阶段就有不少，问题是那时的告别，如“郑国江……少年悲欢”一节所举，是为了事业等人生目标告别心上人，虽然痛苦，但有失有得，也还有充实的一面，不失初生天地的悲壮；而到陈少琪 1987 年写的这首《别等》，“此际越过夜静 / 路向没法肯定 / 寒风和应”几句所透露的，却是没有明确路向、没有清晰追求，有点为告别而告别的彷徨、绝望意味，似可让人领略到一种毫无价值的自甘割舍与孤独的虚幻人心、虚无人生。不同时代的“别等”，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底蕴。　　前面说到林振强对被离弃者、被压抑者、受伤者、失意者、自外于社会主流者的塑造，实际上这个题材要论深刻，还数陈少琪，尤其为达明一派写的这类作品，往往到了形而上的层次和触目惊心的地步。替其他歌手所写值得一提的则有《夜机》（这也是为陈慧娴暂别乐坛而作，但与林振强的《千千阙歌》相比，则情绪更迷乱，调子更灰暗）、《霓虹玩偶》、《分手总要在雨天》、《酒店大堂》、《墙上的肖像》等，而在我心灵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是苏芮唱的《若即若离》。　　这首为情所伤的孤独者之歌里有两句：“蓝色忧郁境地 / 围起一生隐秘。”是我念大学时极喜欢的，以至用“蓝色境地”做了自己诗集的名字，那时，我就是这样一个蓝色少年。到毕业后，随着心境与人事的改变，我对此歌的喜爱转为其歌名“若即若离”了。有一段日子，我离开了“蓝色境地”却又抓不住生活中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整个人如此虚浮，承受着生命之轻。那时我曾在一篇《人生如歌》中无意中写下一句：“我喜欢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引来了两个知心好友触及本质的浩叹质问和痛切冷语：“你恋着若即若离的感觉你不愿看得太真了吗？”我虽明知“若即若离”是一种“灰色轨迹”，但也甘心于此而不愿重回旧日的黑暗深渊继续自毁。不久，有如天意注定，我就在那两个好友所在的老城里、旧街上一间即将关闭的小店中买到苏芮这张唱片——比购买的地方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歌曲内容与时间的巧合，因为我是视那种状态为必要的过渡阶段的，后来又曾借另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人生如戏·90 男欢女爱》告诉朋友：“放心，别为我着急”，“若即若离的灰色轨迹总会走完的”；而其实就在买苏芮那唱片之时，我已开始由虚浮渐渐着陆，新的安身立命，则正部分地反映在用作那张专辑题目的一曲《凭着爱》中：“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 / 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这唱片于我真是一

个适时的好纪念了，里面两首歌，分别代表着旧我和新我：由“蓝色境地”，到“若即若离”，最后转为追寻“简简单单”的开心，生活、思想如是递进。　　——可是，陈少琪写的是旧我之歌《若即若离》，而非新我的《凭着爱》，先前已提过了，后者是潘源良写的。这多像一个恰好的比喻，让我通过与自己生命阶段巧合的对照，再次得到证实：陈少琪，他属于逝去的年代。　　然而这又有什么呢？已经足够了吧，像 1989 年他为张国荣暂别乐坛而写的《风再起时》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歌 / 最后总算唱过 / 何用再争取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他已经到达过峰顶，只不过不曾在下坡后抵达平原而已。但山峰还是山峰，留在那儿，虽寂天寞地，却不会消失。在各自“上路”的多年后，黄耀明解释自己的变化时说过：“一个人不妥协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坚持着不改变自己，你必定会失去更多。”这是明理之论。然而也不是绝对的，至少这话可以从逻辑上反推为：如果一个人情愿失去更多，那他就可以做到不妥协。当对黄的“转向”抱欣赏态度、且本身就属于“转向”者的我，怀着朝花夕拾一类的心情回望过去，对自己流散的青春岁月有着怎样的珍爱，我就会对陈少琪有着怎样的敬意。此致，敬礼，平原上的人，向寂寞的山峰！　　　　1999 年 4 月写就，2002 年 3 月修订，2005 年 11 月再订正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1）（图）

周星驰龙套家族荣超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除了他本人以及经常与他搭戏的那些人以外，偶尔出来轧一角露个脸的龙套们也都有好玩的地方。正如尹天仇在《喜剧之王》里所说：“临时演员也是演员……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没错，其实那些在周星驰你可能名字都叫不上的龙套们，总是会崩发出不一样的光芒，或者会震得你七昏八素，或者会让你笑得撕心裂肺，尽管有时候他们只是露出那么一小脸，但已足以名垂“星”史，笑傲群雄了。　　本文挖空心思找出这些龙套，主要是满足个人的恶趣味，银幕上总是大明星挥洒着最多的光芒，但并不意味着龙套们就可以忽略不记。如果没有他们甘做绿叶，周星驰的电影或许又是另一幅模样；反之，这些龙套们为什么总是会在周星驰的电影中留给观众的印象最为深刻？而当他们一旦离开周星驰却几乎被埋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秋，息影了二十多年，然后以祖母级的年龄出演了她一生中最为精彩的角色，这同样是相当令人玩味的。　　当然，在周星驰电影中出现过的演员名单远远超出以下列举的这些，那些没有被提到的名字，那些同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路人甲乙丙丁，或许在某一日，突然就触动了你的内心，令你会心一笑，也不一定。　　　　戏骨

吴孟达　　所谓“戏骨”是指那些演戏基本已经达到戏我两忘，人戏合一之境界的演员们，有句话常来形容这样一种人，说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戏”。周星驰电影中的“戏骨”则以吴孟达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吴孟达，1953 年 1 月 2 日出生，祖籍福建省厦门，1971 年，考进无线电视台第三期艺员训练班，从此开始其演艺生涯。不需要任何统计，亦可肯定吴孟达在周星驰作品里拥有无数个记录，譬如出镜率最高的配角、合作时间最久的演员、最具知名度的绿叶等等。他与周星驰最早的合作要追溯到 1983 年版的《射雕英雄传》，其中周星驰饰演了一名“宋兵乙”，即一出场即被杀掉的那种龙套，而吴孟达当时的待遇要比他好一点点，

出演一个稍有戏份的丐帮“彭长老”。　　自打《赌圣》开始，吴孟达就成为周星驰身边不可或缺的超级绿叶，亦是含金量最高的搭档。你可以说他是永远的配角，也可以称他为周星驰身边的超级大龙套。一旦离开周星驰，吴孟达亦都很难迸发出不一样的光芒。起码在这两年，他基本上没有演出过任何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有记者曾经让周星驰形容一下生活中的吴孟达，周星驰说：“他其实是很孤独的。”这一点，尤其与周星驰本人相似。

陈百祥　　别名“阿叻”的陈百祥出身自乐队 Loosers（前身是温拿乐队），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漫画威龙》是他与周星驰合作的第一部电影，随后在《鹿鼎记》中他是与韦小宝烧黄纸的把兄弟多隆，在《唐伯虎点秋香》他则是妙趣横生的祝枝山。他还在《武状元苏乞儿》、《龙过鸡年》中充当友情客串。也有人将他排在吴孟达之后，称为“周星驰身边二号绿叶”。

葛民辉　　大名鼎鼎的香港另类演唱组合“软硬天师”的成员。《行运一条龙》里的他尚可算是有为上进，《算死草》中他则是冤大头兼幸运儿的何欢。作为一个有追求的艺术青年，他还执导过好几部不知所云的实验电影，例如《四面夏娃》、《龙火》、《初缠绵后之二人世界》等。

黄一飞　　黄一飞十六岁即进入戏班跑龙套，先后曾混迹于多家电视台。凭借《少林足球》中出位的大师兄，他获得了 2002 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及金紫荆奖的最佳男配角奖，他在许多周星驰电影中都常有客串：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饰白云城主叶孤城；在《国产零零漆》中饰死囚；《百变星君》中饰星君老爸；《破坏之王》中饰茶餐厅老板；《审死官》中饰阿福；《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饰七品县官等。

黄秋生　　黄秋生唯一一次在周星驰电影中出演的人物，就是《济公》中一身大疮的九世乞丐朱大种。这两年黄秋生经常演一些很酷的角色，几乎让人忘记了原来他也是很会搞笑的。

罗家英　　粤剧名伶，八岁即开始戏曲演出，1973 年正式担纲，演出《蟠龙令》，自此参与不少大戏。他以《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国产零零漆》中的达文西最为内地观众熟知。他曾凭借《我爱厨房》的演出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2）（图）

钟镇涛　　被称为“阿 B”的钟镇涛与陈百祥一样，最初也是温拿乐队的成员之一。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在电影中常常以老实正直的傻小子形象示人（代表作《表错七日情》、《上海之夜》等），被香港影评人石琪称为“在港台影坛绝无仅有”。在周星驰电影《新精武门》和《漫画威龙》中，他所扮演的潇洒哥，同样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经典人物。

梁家仁　　作为七十年代末出道的功夫明星，他曾在许多电影中扮演过英雄人物。但是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他却只能演一些类似二百五的角色，以衬托周的英明神武（他与周星驰最早的合作是无线电视剧《孖仔孖心肝》）。《龙的传人》里他是周星驰的师叔毛仁性——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货色；在《唐伯虎点秋香》里，他是卤莽的武状元。他还在《逃学威龙之龙过鸡年》，《审死官》中有过出色演出。

苑琼丹　　她曾在《唐伯虎点秋香》出演过“风华绝代的石榴姐”，但她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则是“老鸨又是我”，在《九品芝麻官》以及《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她均以老鸨形象示人，以至于被影迷称为“老鸨专业户”。作为无线电视台的基本演员，她在电视剧中的形象要丰富得多。

张达明　　虽然个头儿不高，可他被称为香港最具有演技实力的几个人之一。张达明曾经做过编剧，教过人演戏，还在电台作过 DJ，身份十分复杂。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饰演霉运当头的皇帝，当他面对那群如狼似虎的后宫“佳丽”时，所流露出悲怆的表情尤其让人绝倒。

乔宏　　早年因身材魁梧被称为“影坛雄狮”的乔宏，曾经是电懋（后改名为国泰）公司的基本演员，1996 年，凭《女人四十》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香港金紫荆金最佳男主角称号。在《家有喜事 1997》中继承了《女人四十》中角色的部分特点，饰演一个与周星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老爸。1999 年 4 月 16 日，乔宏因心脏病发于美国西雅图去世，享年 72 岁。

秦沛　　本名严昌，又名姜昌年，出生于演艺世家，秦沛是他的艺名，由大导演李翰祥所赐。弟弟姜大卫、尔冬升均是香港电影中的出色演员和导演。秦沛的经典角色很多，曾两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称号。在周星驰电影《赌圣》中，他饰演赌术高明的洪爷。在《审死官》中他饰演“官官相互”的八府巡按。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3）（图）

夏萍　　因与外国明星柯德莉·夏萍（内地译名为奥黛丽·赫本）同名，她的名字常被香港演艺圈拿来戏谑。她其实是香港资深的老演员，参与过影视剧不计其数。在《九品芝麻官》里，她饰演包龙星的老妈，在关键时刻送上“尚方宝剑”一把。2005 年在 TVB 台庆晚会上，夏萍击败汪明荃获得 TVB 万千光辉演艺大奖（相当于终身成就奖）。

谷峰　　邵氏电影时期的百搭配角，曾多次在李翰祥、张彻等导演的电影中充当重要角色。他曾以李翰祥执导的《武松》中饰演武大郎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在《九品芝麻官》里，他扮演反派常威的老爸，果真是老而弥“奸”。

薛家燕　　原名薛家彦，九岁开始拍电影，六十年代粤语片鼎盛时期，她是著名的银幕“七公主”之一；1996 年婚姻失败，她凭着无线电视连续剧《真情》中“好姨”一角东山再起；同年，她出演周星驰电影《食神》，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表情给观众留下深刻了的印象。

黄韵诗　　黄韵诗的演技风格独特，连《金枝欲孽》中的“如妃”邓萃雯也称自己曾偷师于她。香港专栏作家林燕妮曾专门为她撰文，称其为“大胆癫”和“细腻演”。在《赌侠 II 之上海滩赌圣》里她演出的川岛芳子便是这个特点。

吴启华　　他虽然在电视圈发展很风光，然而在电影界总是难如人意。在《九品芝麻官》他演包龙星的对头——广州第一状师方唐镜，他在其中相当嚣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打我啊，笨蛋。”当然，“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吴孟达在对其一顿暴扁之后撂下这么一句话。

朱咪咪　　如果说苑琼丹是老鸨专业户，那么朱咪咪就得算是奶妈专业户了，虽然在《唐伯虎点秋香》里她被扶正做了周星驰的老妈，但是她在《审死官》里的奶妈形象基本成为了这一角色的标准，以至于她后来在电视剧中也多次出演奶妈这一角色。朱咪咪还有个歌星的身份——唱片主要销往她的老家，马来西亚。

林雪　　从开场时的霸气十足，到猪笼城寨被莫名爆竹引爆，林雪在不动声色之间已经令人拍案叫绝。熟悉港片的人大都通过杜琪峰电影认识到他。剧务出身的他曾经在片场里做过无数行当：场务、道具、灯光、机工、制片……但他偏却对演戏情有独钟，从《破坏之王》里惊鸿一瞥的龙套，到两度获提名最佳男配角（《枪火》及《PTU》），林雪的经历堪比《喜剧

之王》更加传奇和曲折。

田启文　　绰号为“田鸡”的他踏入演艺圈已有20年，他演过电影、电视和广告，并曾主持过电视及广播节目。于1996年加入周星驰的星辉海外有限公司，并参与他执导的三部作品《食神》、《喜剧之王》和《少林足球》的演出。如今的田鸡是周星驰的经纪人、左右手、对外联络人。可是他们第一次的合作，却是在《九品芝麻官》里，田启文扮演张敏那位把肺吐出来的老公。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4）（图）

高手

元华　　在《九品芝麻官》中，皇帝封京门捕头“豹子头”为“高手高手高高手”，这表明用一个“高手”这样的名字，都不足以形容这些厉害角色们。他们往往并不是以演技出众而闻名，而以另一种特长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得到这一美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元华。元华七岁便跟随于占元师傅学艺，是“七小福”成员之一，多年来一直从事武指工作。而一手发掘元华作幕前演出的，是他的大师兄洪金宝。《东方秃鹰》是他最早的一部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在与周星驰的合作中，元华亦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比如《龙的传人》里的土地主“大澳周飞鸿”、《漫画威龙》中的大反派、《情圣》里的神经大哥等等。在周星驰最新作品《功夫》中，元华出演神藏不露的高手包租公，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元秋　　早年拜在于占元师傅门下学戏的元秋，跟成龙一样是山东人，按辈分算还是洪金宝的师姐。年轻时，元秋同其他武行一样担任过替身演员，偶尔也会在幕前出演。1980年，元秋退出银幕，一心在家相夫教子。但是这场婚姻并未能维持太久。2003年她又被周星驰重新挖掘出来，出演《功夫》中包租婆一角，获得了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董志华　　董志华10岁开始学习京剧，1979年毕业于北京中央艺术团，主修武术表演。他曾和传奇导演张彻合作多部作品，其中包括《西安杀戮》、《过江龙》、《神通》、《大上海1937》等片。他在《功夫》中饰演精通棍术的油炸鬼。而他差不多是《功夫》中最后一位确定的主演，因周星驰一直希望找到一个精通棍法的演员，后来经洪金宝介绍才终于找到这个最合适的人选。

行宇　　行宇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第三十五代武僧，习武十年，并代表少林寺前往世界

各地进行表演。他目前居住在深圳，管理少林寺位于该地的分院。在拍摄《少林足球》时，周星驰就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少林武僧参与演出，终于在拍摄《功夫》时找到了行宇。据田启文介绍，行宇刚到上海的时候以为只是试镜，所以只带了一件衣服随身，没想到一呆便是四个多月。他在《功夫》中饰演“十二路谭腿”苦力强。

赵志凌　　赵志凌师承林世荣，是黄飞鸿徒孙。他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片演员，拍过《蛇形刁手》和《七虎之争》等。他所创办的“国际洪拳赵志凌国术会”在海外有相当的知名度。作为功夫大师，赵志凌经常周游列国传授。他参与《功夫》的演出是在周星驰多次盛情邀请之下方成。周星驰认为裁缝应有细腻的一面，而这个职业与赵志凌武功又能够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才为赵师傅设计了“娘娘腔”的性格，并饱受包租婆的“辱骂”。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5）（图）

袁祥仁　　那位十块钱卖给阿星《如来神掌》的老乞丐是《功夫》中的关键人物。而扮演这个角色的正是本片动作导演袁和平的弟弟袁祥仁（他本身亦是著名武术指导），看到他你是不是有点面熟？没错，他就是《武状元苏乞儿》中教授苏哈察尔灿睡梦罗汉拳的乞丐。看来他与周星驰的缘分不浅，教武功都从清朝一直教到民国。

贾康熙　　贾康熙十三岁加入西安京剧团，拥有三十多年的演出经验。他第一次演出的电影是张彻执导的《西安杀戮》一片。在《功夫》中他扮演琴声杀人的高手“天残”。

冯克安　　在《功夫》中他扮演“地残”。面相不善的冯克安出生于演艺世家，其父冯峰是著名丑星和导演，妹妹冯宝宝是当年香港的天才童星，另一个妹妹冯素波和弟弟冯吉隆都是著名的电视制作人。而他本人不但是演员同时还是著名的动作指导，曾参演过演出的作品有吴宇森的处女作《铁汉柔情》；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还曾和洪金宝合作《赞先生与找钱华》及《飞龙猛将》等片。在《功夫》中他与裁缝师傅的徒手打斗堪称霸道十足。

梁小龙　　梁小龙在《功夫》中饰演外表像老头子，但却武功盖世的大反派“火云邪神”。他从1973年主演电影《生龙活虎》开始，短短十几年，拍过七十多部电影。后来他又陆续拍了《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大内群英》、《四大名捕》等一千多集电视剧，是80年代初香港最负盛名的武打明星之一。梁小龙近年来以经商和开办武校为主业，由于早年周星驰电影《漫画威龙》邀请其复出参演未果，在周星驰再次力邀之下，《功夫》是梁小龙自80年代从影坛消失后第一次重返大银幕。

郑佩佩　　六十年代她因出演胡金铨电影《大醉侠》而成为著名的银幕侠女，《卧虎藏龙》里的碧眼狐狸令她再度声名大噪。在《唐伯虎点秋香》里，她是那位与周星驰一路掐到“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6）（图）

刘家辉　　原名冼杞熙，自幼过继给著名动作导演刘家良父亲刘湛师傅，深得刘家洪拳真传。刘家良电影中多数以他作为主角，代表作有《少林三十六房》等。在《杀死比尔》中的他前后饰演了“疯狂 88”以及“白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他饰演前后与唐伯虎父子交手，后来被没枪头的唐门霸王枪一枪捅透心的夺命书生。

徐少强　　七十年代开始即为动作明星，早年曾多以大侠形象示人，他主演的《生死决》是程小东的成名作。八十年代初他以电视剧《天蚕变》而在香港红极一时，后来远走台湾而逐渐淡出银幕，近年来重返演艺圈，并以内地为工作重心。在《武状元苏乞儿》中，他扮演图谋造反的赵无极。

刘洵　　京剧名伶，因为替徐克做《刀马旦》的京剧指导而进入电影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演太监是他的拿手好戏，比如《新龙门客栈》里的那位公公以及在《九品芝麻官》里和周星驰对骂的那个“贱人”。

倪星　　如今更名为邹兆龙的倪星，凭借在《黑客帝国》中的演出而名声大噪，他也是香港著名的动作演员及武术指导，不过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中饰演反派常威，他也难逃“无赖”的命运。

徐锦江　　美术大师关山月的关门弟子，在八十年代到香港后被麦当雄导演赏识，以《省港旗兵续集》入行，后来曾经拍摄过多部三级片。他在《九品芝麻官》扮演的豹子头则勇猛得很，在《百变星君》中他扮演那个疯狂的爱因斯坦式的教授。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7）（图）

极品

李健仁　　如果以上两类人选被称之为“龙套”还有些牵强的话，那么这一类别中的人物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套了。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他们往往是莫名其妙得来，然后又神神秘秘得消失。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总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或捧腹大笑，或不堪入目。而这两种极端的反应使得观众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称号：极品。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如花。　　如花，本名李健仁，曾是周星驰中学的同桌。中学毕业后参与电影幕后工作，偶尔也在幕前跑龙套。他第一次以“如花”形象示人是在《武状元苏乞儿》中饰演“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而“如花”则是他后来在《九品芝麻官》中的角色名。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他的样子极端猥琐，但是举止还是多少有些娇羞；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但却给观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作为一个龙套，他是龙套中的另类；作为一个演员，当剧情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义无返顾，不惜形象，那么他就是演员中的表率。

何文辉　　扮演理发师的演员何文辉，是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广州选秀时发现的一位“极品”，他曾在《少林足球》（加长版）中饰演一个龙套角色，当时周星驰见他总有着喷勃欲出的表演欲望，干脆给他取了个花名为“酱爆”（这个名的意思请参见《食神》中的撒尿牛丸）。　　无论是开头趴在地沟前洗头，还是面对斧头帮勇敢地讲出“我不怕”，乃至结尾处摆出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的 Pose。总露着半截屁股的他，堪称《功夫》中一“绝”　。“酱爆”背景如谜，极少朋友，性格亦相当古怪。但是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天赋禀异的人士，很明显，他就是那种人。

陈凯师　　“龅牙珍”，广州人。2002 年，周星驰为拍摄娃哈哈广告，需要招募一些帅哥靓妹，她也有来参加。被当时的周星驰惊为天人：“你怎会认为自己是靓女呢？”可她却讲：“因为我有自信，所以我会成功。”虽然当时拍那个广告她最后落选了，但却给周星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构思功夫剧本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便始终无法抹杀这么一个极品，索性找她来演这么个角色。

林子善　　那位抢哑女手中波板搪、后来又将小时候的阿星海 K 一顿的小混混，看上去是不是也很面善？没错，他就是《喜剧之王》里的“洪爷”。本名为林子善的他在 1998 年参加“喜剧之王”训练班，因表演突出，被安排在《喜剧之王》内演出洪爷一角而为人认识。还记得那句台词吗？“《雷雨》还要排练吗？《雷雨》就是讲义气（发成 ki 的音才是王道）嘛！那，出来混的，就要讲两样东西：第一呢，就是讲义气，第二呢，讲钱……”

冯勉恒　　没错，他就是在《少林足球》中随身带着扳手、锤子等暗算工具上场踢球的“汽车维修员”，也就是在《行运超人》里打劫杨千女华的出租车司机。这个“斯文败类”甚至引发周星驰“对戴眼睛的人士存在相当的成见”，并发誓要杀光“四眼仔”，可见其形象之

“独特”了。本名为冯勉恒的四眼仔，实际上是星辉旗下的编剧，不过这对他来说——“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8）（图）

八两金　　本名叫做叶竞生，我们只能用鬼斧神工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面貌。《千王之王2000》扮演聋五，在《行运一条龙》中扮演吴得招，在《喜剧之王》中扮演“极品”——居然从耳朵里、鼻孔里爬出虫子来。

李兆基　　八十年代之前的香港三合会中层成员，后被林岭东导演带入电影界成功洗底，经常会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演出。在《食神》里面，他作为街坊骨干之一跟随周星驰重打天下，主要靠的是本色表演，而在《算死草》则扮演丐帮帮主洪十八，则整个人充满了“乡土气息”。

刘以达　　著名的乐队组合“达明一派”的成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用“飘忽”二字形容确是恰到好处，这点在周星驰的《食神》，《大内密探零零发》及《千王之王》里都有体现。

郑文辉　　还记得《喜剧之王》里引发周星驰不惜斗志、将收保护费事业坚持到底的港大毕业生吗？还记得《食神》里被周星驰尊称为“笨 B”的家伙吗？他叫郑文辉，又一个被周星驰撬到幕前的编剧。他现在和朋友做出版方面的事业去了，不过一旦星爷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会回来帮衬的。

黄一山/李家声　　《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武名叫黄一山，他还在《九品芝麻官》里饰演傻子，以及《逃学威龙》里饰演黄小龟。他原本是编剧出身。《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文名叫李家声，他是 TVB 的演员。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9）（图）

程东　　一个在香港电影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派的、特异功能的修炼者，他永远是周星驰的死敌，无论是在《赌侠》中的独眼龙，还是作为“整蛊之霸”(《整蛊专家》)。当然，他的结局也永远都是悲惨的。不过他还在《九品芝麻官》中不识字还做假供的家奴来福，倒是让人大跌眼镜。

梁荣忠　　一提到“小强”和“旺财”的名字，大家都熟；小强的主人自然是唐伯虎，可是旺财的主人是谁？可就令人傻眼了吧。这个跟唐伯虎比狠的家伙，名字叫梁荣忠，他和黄秋生一样，是由香港演艺学院出身的演员。十年前他在一次舞台剧中被 TVB 发掘，经过多年的默默耕耘，才凭《刑事侦缉档案》剧集引起注意。最近因主持综艺节目《残酷一叮》而广为人知。

梁思浩/邓兆尊　　“等一下等一下，我老爸就是陈局长，你杀我他会杀你的。我这么帅，我不想死啊……”　　在《国产凌凌漆》里自称是陈局长的两兄弟最终也难逃厄运。这二人都是 TVB 演员，左边的叫做梁思浩，曾以模仿香港歌星容祖儿而遭到报复，现已转入亚视；右边的叫做邓兆尊——他是粤剧名伶新马师曾的儿子。

鲁芬　　《九品芝麻官》里的烈火奶奶，《整蛊专家》里的大白鲨，现实中的她有一家属于自己影视广告公司。

林子聪　　绰号“肥仔聪”的他，以饰演《少林足球》中的“水上飘”六师弟而为观众熟知，在《功夫》中他是周星驰身边的小跟班。他的演技着事一般，只是外型“出众”。林子聪除了演戏，还是星辉公司的编剧之一。

陈国坤　　因为貌似李小龙，在《少林足球》扮演守门员后，陈国坤广为让人认识，而他亦很知恩图报的表示，他现在在娱乐圈所拥有的都是因为周星驰所带来的。在《功夫》中，陈国坤扮演斧头帮的大佬琛哥，性格残暴、行为乖张，拿手功夫是“买凶杀人”。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10）（图）

票友

刘镇伟　　还有一类龙套，他们根本就不是专业演员，只是因为一时技痒，而强轧一角，这类人我们称他们为“票友”。而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刘镇伟。　　被影迷称为“亲爱的葡萄”的刘镇伟，曾在《大话西游》中一个分演葡萄（普提老祖）、囚犯、说书人多个身份的角色，这也许隐喻了他不同方面的才能。刘镇伟早期担任过财务经理、制片人、商人；后来从事电影编剧、导演等工作。他与王家卫是工作上的拍档，也是生活中的朋友，并以一个走小众艺术路线，另一个走大众娱乐路线而成为香港电影中一道别致的风景。刘镇伟执导的大多

数影片票房都相对不俗，但是他仍然被视为香港电影众的最为Cult的导演，香港影评界称他的作品“离开了香港的本地文化背景，几近不可能理解。”但是在内地，刘镇伟同样有一大批拥趸。他与周星驰曾有多次合作，从最初的《赌圣》到最近的《功夫》，以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大话西游》。事实上，刘镇伟几乎每一部影片都会给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他最近的电影作品是《情癫大圣》。

黄霑　　著名音乐人，专栏作家（已故），身前名作无数，如《上海滩》、《我的中国心》、《沧海一声笑》等。他在《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华太师。

黄志强　　周星驰电影里谁最狠？答案是《济公》里的九世恶人，一个心真的是铁石的人，而且狠了九世，试问谁人能敌？扮演他的黄志强导演是香港新浪潮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在好莱坞发展），他所导演的《打擂台》、《天罗地网》、《重案组》都是香港电影中出色的作品。

李力持　　李力持导演从《他来自江湖》开始，就与周星驰吴孟达合作无数。他常在影片里客串，譬如《大内密探零零发》、《破坏之王》以及《回魂夜》，在《国产凌凌漆》中他以一个帅呆了的“旋风腿”蹿上半空，然后被火箭炮轰得粉身碎骨。

文隽　　作为监制、制片、编剧和经纪人，文隽都有突出表现。《古惑仔》系列、《风云》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他都是幕后推手之一。虽然他样貌不咋的，可是也非常喜欢出风头，比如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饰演紫禁之巅的猥琐版陆小凤。

元奎　　七小福之一，较少亮相于目前的他比其他师兄弟的身份要纯粹一些，他是香港最著名的武术指导之一，和刘镇伟合作默契，最近的作品是《情癫大圣》。他在《新精武门》、《赌圣》中均有出场，不过最令人记住他的一句对白却是出现在《方世玉 2》中的“安全第一”。

江约诚　　江约诚是王家卫、刘镇伟等人合作的副导演，有时也会出现幕前,最广为人知的演出就是周星驰<西游记>里的瞎子/沙僧。

第五部分周星驰龙套家族（11）（图）

黎彼得　　香港著名填词人。1970年代曾时期为许冠杰的粤语流行曲填词。黎彼得写词数百首，部分写情的写得非常优雅；而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却十分生动有趣和生活化，因而有“鬼马填词人”之称。黎彼得亦曾在无线电视任职编剧等职，九十年代经常在电视节目内客串，专门演出市井男性角色。他在《唐伯虎点秋香》中赤膊上阵，饰演“左青龙右白虎”的教书先生。

谷德昭　　《唐伯虎点秋香》对穿肠，《食神》里的唐牛，少林足球里的“全都是幻觉”……没错，他就是谷德昭，同时他也是香港知名导演。

黄炳耀　　他与黄百鸣、王晶、张坚庭一起被誉为是香港八十年代四大编剧，为洪金宝和陈勋奇等人撰写过许多卖座电影的剧本。在《逃学威龙》系列中，他便是那个一脸堆笑的上司，还有一招必杀技“夺命剪刀脚”。黄炳耀已于1992年病逝于柏林。

向华强　　永盛、中国星、一百年电影公司的老板，可以说是在周星驰作品中客串过的最有钱有势的电影人。在《赌侠Ⅱ之上海滩赌圣》中他依然扮演那位基本不会笑的“龙五”。

黄伟文　　香港新世代极为重要的音乐创作人、专栏作者，他可不仅能写出《烂泥》、《犯贱》这样的词，偶尔出来跑个龙套也充满搞怪的味道，比如《算死草》里的高手“龙二哥”。

钟景辉　　他在《算死草》里扮演那位搞错儿子，并在法庭上突发心脏病的何西爵士。在现实中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香港演艺学院辖下的戏剧学院创院院长，曾经出任亚洲电视的高层，又在TVB讲故事，更在舞台方面开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之先河。

吉米·怀特（Jimmy White）　　《龙的传人》里那位老外的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曾经排名世界第二的斯诺克大师，在拍摄《龙的传人》时，他在世界排名第六。吉米·怀特此前一共获得过 22 个大赛冠军，6 次世界亚军。又被称为“未拿过世界冠军的最好的球员”。
（本文多谢星辉公司田启文先生，以及我的好友魏君子、云飞扬提供的无私帮助。）

第五部分海报上的休闲生活

海报上的休闲生活托托

我们居然能在海报上发现电影中从来没有出现镜头，当然都是些让人垂涎的悠闲时光，为什么？　　　　九十分钟的电影要浓缩剧中人的一段生活经历，那些角色自然都得加班加点，在这九十分钟里忙完自己的这段人生历程，因此也就看不到他们像普通人那样，有一些什么也不干的时光。或者这些时光对于观众而言是“没用”的，自然也就没必要呈现在银幕上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些角色在电影中忙忙活活实在够累，就在海报上让他们歇会儿吧。　　于是，当这样的时光出现在这些海报上，不论对于观众还是剧中人，都是很有意思的。　　《高跟鞋》里的人物在偷情、谋杀、同性恋和易装之余，也有睡大觉的时候，与严肃版海报比哪个更好呢？那个沙发很西班牙的色彩搭配相当有意思。　　王家卫的主人公们除了买汽水肯定也得吃饭，于是认识不认识的都凑到了一起。请留意一下柱子、柱子上的灯还有背后墙边的小柜子，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香港版（横版的那张）海报印反了。　　“宝芝林”今天休息，想必这种时髦的休闲方式是喝过洋墨水的十三姨发起的，黄飞鸿师傅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　　在海边的还有《发达草》中的这两位，为什么要把片名译成发达草呢？这个场景在电影中有，但那个人物并没有这个样子。　　《罗西娜的坟墓》也有两位主人公在餐厅的场面，但并没有这么安闲，要知道罗西娜得了绝症，她老公正忙着照顾全镇的老弱病残，以使他们排在罗西娜后面上天堂，好把教堂墓地剩下的最后一个坟墓留给罗西娜。仔细看看这张图，明显是 PS 出来的。　　《漂亮女孩》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个酒吧，但这么多明星齐集一堂当然也是 PS 出来的，而且电脑加工的痕迹很明显。不过人物神态和画面效果很不错。

第五部分名剧的儿女们（1）

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 39 号史航

向开始致敬！向结束致敬！向沉默致敬！向真话致敬！向死去之后彻底死去的人致敬！向现在活着永远活着的人致敬！向无中生有致敬！向反败为胜致敬！向面对现实穿透生活的人致敬！向两手空空粉碎规律的人致敬！致敬，致敬，致敬！　　——题记　　　在网上的搜索引擎中，我填进去的词是“先锋戏剧”，结果就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1986 年，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高行健率先提出‘先锋戏剧’的观点，在国内博得了青年学者孟京辉、青年作家马原的高度迎合。……先锋戏剧在当时获得了最为出众的艺术地位，这种崇高和艺术的博大性让中国的舞台剧作者们深刻的感受到了一种带有潜流性质的光芒前途。1987 年，孟京辉导演的《等待戈多》在北京人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茶馆》和《四世同堂》，而 1988 年高行健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的演出则获得了让世界都为之震撼的成功。”　　这文字引自一篇名为《浅论经典力量的非单独性影响》的文章。真是个壮观的名字，让你不得不茫然又肃然。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往往会有一两幅这样的图画，旁边写的是：“找一找，里面到底有多少常识性错误？”　　也就这样想起了从前的时光，那些隔靴搔痒的论文和著述毕竟不能到达的时光。还有东棉花胡同 39 号，我们的戏剧学院，我们打发青春，误解生命以及贡献热忱的地方。虽然宿舍楼一再整修，爬山虎悄然褪去，校门也被改造成黄世仁家的黑漆大门。　　毕业的时候，想过要写一部小说，刻画四年的生活，一年一卷。第一卷叫《倦恋》，第二卷叫《比爱情还美好》，第三卷叫《恻恻清寒》，第四卷叫《名剧的儿女们》。自己喜欢的是第四卷的题目，像是一部不见经传的苏联小说。　　我们真

的是名剧的儿女们吗？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曾经离舞台很近，离剧场很近。　　《亨利四世》中，已入暮年的浪荡爵士福斯塔夫说：“我们一起听过午夜的钟声呢，夏禄爵士。”我喜欢这句话，一个挤眉弄眼的老爵士，说给一个乡村法官听。他们是会心的，他们知道这午夜的钟声，说的是哪一段青春。　　　　最初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我知道我会遭遇许多奇怪的瞬间，但是，1991 年 1 月那个夜晚，学院的黑匣子剧场里，我还是被惊着了。台上五六个演员，刚才还狂躁的叱骂，跳到凳子上撕书，背《陋室铭》，这一刻却不知道接了什么讯号，都僵在那里，僵在那里任时间流逝。观众开始窃窃私语，却不甘心退席。我不记得演出怎么继续下去的，那不重要了。演员在享受这一刻的停顿，挑衅的却也是充满魔力的停顿。这一刻，我真正算是与戏剧狭路相逢了。我开始等待一些事情的发生。　　这出话剧叫《秃头歌女》，导演孟京辉，当时是导演系的研究生，成天在操场里踢球，还张罗着让所有人的跑动都更加积极，他是北京人；那个扯着嗓子背《陋室铭》的，叫戈大立，戏文八九的，多年以后成为风华正茂的戏剧制作人，与老孟合作至今。　　这个本子是高行健翻译的，字里行间并没有那么鲁莽的挑衅之意，但是，老孟的版本就是这样排的，其实那时候排演的荒诞剧都有些走形，青春的气息有意无意地冲击着剧情，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沮丧和出神，不是失语和失忆，而是意气风发的书写着荒诞，百折不挠的排演着绝望。　　《秃头歌女》的演员里，我当时只留意过扮演马丁夫人的邹倚天，因为她在就读表演系之前就主演过影片《红衣少女》，算是表八八里有点名气的女孩。后来她演些中国霸王花之类的角色，后来出国求学，后来在凤凰卫视的职员表中，又见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其实在《秃头歌女》之前，孟京辉一伙就已经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了。那次是《送菜升降机》，写两个杀手闲极无聊等指令的故事，最后，指令来了，一个人奉命干掉了他的同伴。两个杀手分别是韩青、胡军，表八七的两个帅哥，后者给实验戏剧扛了多年的长工，慢慢在《蓝宇》和《天龙八部》里红了。但《升降机》的上演是十五年前的 1990 年元月，同志恋情和金庸世界同样与先锋绝缘 ，大家还是要规规矩矩演杀手，演那样一个杜琪峰可能会喜欢的故事。　　这部戏的作者是哈罗德·品特，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编剧，2005 年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愤怒，由于抗议，由于这些我们已经疏远但理应尊敬的字眼。可是当初我没喜欢过他的剧本，尽管荒诞派剧作家里面，他的作品被搬上中国舞台的最多，一部小剧场的《情人》还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开启酒吧剧白领剧的纪元。　　我要说的是《升降机》的结尾，胡军杀了韩青，指令就此完成，舞台就是命案现场。这时候从观众席冲上来一位，头上蒙着丝袜，像个银行窃贼，对着死尸拍了一张又一张。这位客串的就是日后的青年导演张扬。张扬咔嚓完了，舞台上就没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戏演完了。　　问题是，没有人出来谢幕，观众也就不明究竟。他们只能等等人，鼓鼓掌，鼓鼓掌，等等人，最后纷纷散去，还悄悄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时候，剧组那堆人，已经在后台开始庆祝演出成功了。　　不谢幕，是《升降机》给人的最强烈印象。　　　　再往前数，就是我瞪着眼睛错过去的那次演出了，奥尼尔的《大神布朗》，导演牟森。有一段。国内的先锋戏剧号称是“MM 时代”，MM 说的就是牟森和孟京辉。这出戏的海报就贴在学生宿舍楼门口，我记住了“蛙实验剧团”这么个名目，但因为戏不是在学校里演，腿懒就没有寻去。这出戏看职员表有两个印象，一是出现了“面具化装设计”这个职衔，二是张有待第一次参与实验戏剧的音乐设计，九十年代以后，他是一个很著名的 DJ。　　说到 MM 时代，牟森应该数在前面，因为两人“从艺生涯”虽然开始在同一年，但牟森是导演，孟京辉只是演员。那是 1987 年，就是本文开头所引那篇梦幻长文中号称孟京辉的《等待戈多》火遍人艺的年头，其实那时候，牟森是毕业后从西藏刚回来，孟京辉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第二年他才会考到中戏，去念导演系张孚琛老师的研究生。　　牟森和孟京辉合作的是《犀牛》，这是一头不曾恋爱过的犀牛，所以作者不是廖一梅，而是写过《秃头歌女》的尤涅斯库，孟京辉扮演一头爱讲哲学的犀牛，名字叫让。　　下面就是一个我只想传播而无心考证的段子了。据说，让在舞台上

狂吼乱跳，质疑生命的意义，结果，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一个绳套（那场布景非常省钱，就是在空中荡来荡去的各种绳套，意即绞索），孟京辉当然是说不出台词来了，他开始挣扎，越挣扎观众越鼓掌，观众再鼓掌他也还是要挣扎……最后怎么脱身的时候我没听说，但我知道那些老实巴交的先锋戏剧研究者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舞台小事故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现在结束道听途说，回到我被彻底震住的 1991 年。那年的元月，不仅有《秃头歌女》。　　《飞毛腿或无处藏身》是一个原创剧，编剧刁奕男，西安人，戏文八七最帅的男生，后来和别人一起写了最早的本土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这个原创我当时没太看懂，只记得舞台上的黑暗和烛光。现在，又一直回避去阅读文本（已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先锋戏剧档案》），我是怕自己看懂了，怕自己看懂了当初的脆弱，共悯与自怜吧。导演是导演八七的施润玖，他后来拍 MTV，张楚的《姐姐》、何勇的《垃圾场》，魔岩三杰我偏爱这两杰，而他们的代表作都有老玖的手笔。后来老玖导过电影《美丽新世界》、《走到底》，陶虹姜武莫文蔚张震岳都被他用得生龙活虎。可惜他终究不像别的同窗那么顺遂，但我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犹如对北电的路学长。　　张扬导演的《黄与黑》，写的是一战时期士兵在战壕里发疯的故事，作者是意大利的基蒂。我记得一个厌战的矮胖列兵对着观众席狂喊：“我想做个中国人，留条长辫子！”这是戏文八九的顾岩同学唯一参与的舞台剧演出，在歇斯底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佩服的还有他自己设计的一个观察生活小品，描述一个男生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桌子上多了一元钱，然后就猜测起是哪个女生的好意还是哪个男生的陷害，然后一步步推导，断定自己终究会因此身败名裂，退学，犯罪，入狱，押往青海，“青海那边可是很冷的啊，我一定会越狱，最后，最后我会被人家击毙在陇海铁路上！”我太喜欢这个小品了，觉得这才是东棉花胡同 39 号出产的本土荒诞剧，一个上海籍同学能对自己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揭示到如此程度，是极可尊敬的。后来，此人成了我电视剧事业的核心搭档，他神经兮兮的幽默感也一次次绽放在我眼前。　　还有一个士兵的扮演者是张越，藏文名字雅特，现在基本用后面这个名字行走江湖。他是顾岩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跟着张艺谋赵宝刚等著名导演学习，后来担任过《走向共和》的执行导演。很多实验戏剧的职员表中都有他的名字，他是中戏的著名闲人。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在网上查雅特的艺术简历，总是把《黄与黑》称为表现主义力作，但是按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划分，这出戏应该算是未来主义戏剧——肯定是雅特误导了人家，然后以讹传讹。　　最后要提到《风景》，这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没脾气的荒诞剧，作者还是品特。一位先生一位太太对着观众闷坐，叨叨一些空洞的话题，当观众是闪着雪花的电视，或者冒着火星的壁炉。真正的优美是由舞美柳青和灯光胡耀辉完成的，因为演员身后的窗外打了一束光，让我们清晰看见胡同里老树的枝桠，还有晕黄的夜空。台词空洞，背景温暖，宛如岁月本身。看那出戏，就像看一幅剧照，一帧幻灯片。这出戏的导演是戏文八七的蔡军（后改名蔡尚君），还有戏文八六的张晓陵（后改名张一白），戏文系的两位师兄，就是比导演系师兄沉得住气，拍了这么一个沉静如水，洗洗就睡的剧目，而且够坦白，在节目单上留下这么一句老实话：“大家来看戏，很遗憾，今天没有戏，只有一些东奔西撞的回忆。”

第五部分名剧的儿女们（2）

现在，大家可能会理解，孟京辉版《等待戈多》的出现，是多么强烈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出戏不再是剧本朗诵或者与观众的僵持，这回是真的荒诞和真的深情，是第一部让你想哭的荒诞剧。　　感谢贝克特，祝贺孟京辉。　　其实，这出戏也是磨难最多的。最早计划在 1989 年的 12 月 31 日公演，算是彼此心目中的八十年代的收尾。地点就安排在中戏操场的煤堆上，那是我们心目中荒诞与诗意的双重巅峰。然而机警的校方及时干涉。演出被迫取消，

无从发泄的几个年轻戏剧人就穿着军大衣在图书馆门口和煤堆之间走来走去念剧本，一个叫王世同的朋友拿机器拍了一些片断（这片断后来用在《孟京辉先锋戏剧作品》里面，算是 1991 版《等待戈多》的花絮了）。 后来读剧本读得冷了，需要活动活动，大家把剧本一扔，开始踢球。 孟京辉还是谆谆教诲着大家："跑动要积极！" 是啊，跑动要积极。老孟一辈子就是靠这句话撑着。 他和他的伙伴们，怀揣一个死死信赖的外国剧本，遭遇着最本土化的麻烦，每天与学生处教务处校卫队甚至宿舍管理小组周旋，寻觅所有排演的时机。后来成为孟京辉夫人的廖一梅，曾经偶然在办公楼的窗前，看见孟京辉追着表演系一位女老师苦苦恳求，从操场这个角追到剧场后门，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整个操场，他一直没犯急，一直在好说好商量，从背影都能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么诚恳。老孟当时求的就是一个成全，让一个男演员晚几天参加汇报，好把《等待戈多》多演两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当然未遂，《等待戈多》就演了三四场，但是，已经是胜利。 学校毕竟愿意借出四楼礼堂（然而，灯是不肯借的，还要另外想办法），演员胡军、郭涛、雅特、王涛均已到位。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四楼礼堂，看见的是暮色中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他们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到了 1991 年的《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 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胡军郭涛这两位男主角，每晚演到结尾，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像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 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 也许吧，也许能理解荒诞的人，总得有点

私人恐惧。　　到了结尾，跟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剧场灯暗，外面走廊的灯却亮了，于是有长长的投影，一个瘦小的男子走进来，没说话，然后，两个流浪汉过去，把他静静的掐死了。也许他就是戈多，也许戈多来了，但是来了又怎么样？来了我们也要把你弄死。　　这个绝望而粗暴的处理，是另一重境界，至今思之难忘。　　被掐死的瘦小男子，扮演者是西安人，名字叫张楚，这出戏的音乐也是他的创作。那时候他老在我们宿舍楼里晃，这屋睡两天，那屋睡两天，穿一件深蓝色的海军大衣，不酷，像个来寻兄长商量什么家事的弟弟，像一个文静的中学生。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等待戈多》的T恤衫，紫色的，上有作者贝克特的头像，不知是谁的创作。我不是剧组里的人，T 恤是硬要来的。　　还有一件纪念品是该剧的说明书，孟京辉的导演阐述实在是用词华丽，结尾倒引了一首朴素而深刻的小诗："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诗的作者是法国的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这出戏衍生的另外一个八卦就是，期末戏文系学生口试，八九班的顾岩同学什么剧本不好提，偏偏提的是《等待戈多》。他遇上的正是一位自诩深悉现代派奥秘的老师，人家就哼了一声，意思是同学你怎么可以关公面前耍大刀呢？　　老师要顾岩背几句《等待戈多》的台词出来，也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了这个剧本。　　顾岩嗫嚅半天，最后开口一句："你读过《圣经》吗？"　　老师大怒，拍案："我当然读过！"　　顾岩更加谦恭的补了一句解释："老师，我刚才说的是《等待戈多》里的台词。"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标准答案和玩笑，恭谨和叛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五部分名剧的儿女们（3）

到了 1992 年，张扬导演《蜘蛛女之吻》，这话剧源自阿根廷一部好小说，作者曼努埃尔 •普伊格，也拍过同名电影，威廉 • 赫特主演，也是上品。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革命者的故事，信仰与背叛，戒备与牺牲，凄楚卓绝。同性恋是贾宏声演的，这个在八十年代独往独来的小生，表八五的，巩俐史可张鹭伍宇娟的同班同学，当年主演过多少电影啊，《北京你早》、《夏日的期待》、《陕北大嫂》、《银蛇谋杀案》，他是可以好好做偶像的，可是他没有，他找到了最小最黑的屋子，把自己关了进去——他后来再被媒体关注，是因为主演了自传影片《昨天》，一个吸毒青年的忏悔录。　　我曾被那部影片触动，是因为主人公喃喃自语的提起披头士乐队，谈起自己一年只听那一盒磁带，我甚至隐隐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　　后来我在网上查贾宏声的简历，原来真的是同乡，我是吉林长春人，他是吉林四平人。在我们小时候，要是想讽刺什么人，往往就说，你赶紧买车票去四平吧，那是个小城市，因四平精神病院而全省闻名。　　口音，籍贯，一一刺痛着我，这个贾宏声，年轻的孩子将只是通过《苏州河》来认识你吧，而他们也许是因为喜欢周迅才去看那个片子。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八十年代那一拨人中最接近《嚎叫》的人（"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不是因为他有多帅，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持久付出代价的人，为了自己相信的音乐，相信的生活方式——就像许鞍华的影片《千言万语》中那些信仰左翼思想而默默陨灭的身影。　　《嚎叫》的作者艾伦 • 金斯伯格，曾把母亲内奥米（美国共产党员）的遗言写在自己的诗篇中："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我看《昨天》的时候，想到过这首诗，却也知道这诗句，甚至比这诗句更强大的诗句，都无济于事。能救助我们的，只有我们心中的亲人，以及亲人心中的我们。　　回到《蜘蛛女之吻》上演的时刻，好像是在电影学院的小剧场，演出效果是卓越的，所有的观众静静瞩目着贾宏声，看他在囚牢里荡着秋千，讲述自己的爱情幻境——那时候幻想还不需要付出代价。　　演对手戏的革命者是表八七的李洪涛，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个带口音的妹夫

李木勺。编剧刁奕男，宣传策划和服装则是霍昕，我的同班同学，后来嫁给了导演张扬，后来参与创作了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电影《功夫》，还有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向日葵》。这几个名字也是张扬的奋斗记录，使他成为这一拨戏剧人里最与大众接近的影视创作者。　　　　1992 年对我自己也挺重要，因为我终于混进了剧组，而不是纯粹的观众。其实不是因为我的热忱，而是因为我有房子——作为 1992 年从戏剧文学系毕业的青年教工，我有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房号 414。现在，我不仅是剧组的成员，还是剧组的房东了。最多的时候，屋子里睡六个人，上下铺各一，地铺四个。这边演员在对词，那边舞美在刻版，出出入入的煞是热闹。　　那出戏叫《思凡》，那出戏悄悄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舞美八八的齐立一直痴迷于节气，相信那是我们祖先与大自然的约会，只是后世子孙失约已久，于是，一年来每个节气他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纪念，悄悄履约。有时候是在楼梯扶手上刷小广告，有时候是在布告栏里贴版画，有时候是在露天的垃圾桶上留言，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白衣白裤，伏在操场堆砌的几条大冰块上面（都是齐立自己买来，用三轮拉到学校），号称冰葬——齐立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今日春分，今日立夏，今日清明，今日大暑。我们喜欢他的这些提醒，宿舍管理小组和校方不太喜欢，嫌他公器私用，窃据宣传栏。　　大雪是齐立心目中最有意思的节气，他觉得应该隆重庆祝，隆重到排一出戏，就像农闲时乡间该响起锣鼓唢呐。于是他找到戏文八九的关山，找到孟京辉，也找到《思凡双下山》的昆曲剧本。　　1992 年 12 月 7 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的台历都是我从图书馆馆长办公桌上撕下来的，然后复印在了说明书上。关山在“演出者的话”里这样宣告：“前世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　　那一天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录音机和音箱搬到宿舍窗台上，重复播放着那些饱含雪意的歌曲，从《一剪梅》到《北国之春》。我们盼望真的下起雪来。晚上演出更是沉醉的狂欢，小和尚小尼姑在结尾团聚，剧场外已经有人点起了鞭炮，演员们谢幕的时候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舞台似乎直接暴露在星空下。　　那天晚上没有下雪，但是散场以后约二十分钟，外面下起了大雾，我跟齐立在操场上摸索，也走到胡同里，看不见彼此，高兴得乱喊对方的名字。　　那时候我已经读过《神雕侠侣》了，却忽略了里面的一句宋词：“雾重烟清，不见来时伴。”　　是的，很快就看不见齐立了，他在演出一周后默默自戕。理由可以被分析出多层，但，伤痛只有一种。　　我们这些朋友聚在我的宿舍里，点上蜡烛，给齐立唱很多他喜欢的歌，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也唱侯牧人的《兄弟》。　　后面这首歌也有些来历，据说，来自侯牧人与张楚的一次碰头，那还是“面的”遍布北京街头的时代。老侯小张坐在里面，谈着闯北京的辛酸。　　下车了，司机喊住张楚，说了一句：　　“兄弟，你好好混，不要太着急……”　　老侯拿这句话，写了这首不错的歌，并收入了《红色摇滚》专辑：　　　　噢………噢………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兄弟　　　　我的好兄弟，噢！哥哥惦记着你，兄弟　　　　我的好兄弟　　　　就在这盏路灯下，我告别了你　兄弟我的好兄弟　　　　你歪着脑袋，拈紧拳头，挺着胸膛　　　　向着你的天下走去　兄弟我的好兄弟　　　　今后的事要靠你自己　　　　兄弟我的好兄弟　　　　你好好混，不要太着急　　　　兄弟我的好兄弟　　　　今后的事要靠你自己　　　　兄弟我的好兄弟　哥哥我祝福你　　　　兄弟你有出息　　　　兄弟你有志气　　　　兄弟……　　那一年的圣诞夜，在团结湖的九月画廊举办了齐立的木刻遗作展，题目是《平安夜·四季轮回》。　　然而，这还不是结局，一个叫王小帅的人找到中戏，找齐立的朋友打听他的死因，我信不过这个人，没说什么。不久，王导演拍摄了一部叫作《极度寒冷》的电影，男主角定名齐雷，由贾宏声出演。他要讲述的是一个行为艺术青年如何把死亡作为自己的行为艺术，一再预报而终思逃避，最后却又神秘死去的故事。这个畏生怖死的故事，我知道与齐立无关，但别人未必知道——既然王导演把一个虚构故事尽量拍得像个纪录片，既然王导演已经铁了心要利用好一个陌生人的死亡。　　我是不懂行为艺术的，齐立告诉过我，行为艺术的核心一定是爱，是想和别人发生交流的痛苦渴望。我信任他完成的那些行为艺术，我记得雨天走过操场，看

见撑开的雨伞上面写着“今日雨水”的景象。　　无论今时今日的行为艺术家已经完成了多少惊世骇俗的试验，我依然只信任齐立的行为艺术，我也想念他那些雨伞和冰块……

第五部分名剧的儿女们（4）

《思凡》后来又出现过两三个版本，也是孟京辉执导，不过换了国家话剧院里很优秀的演员担纲，但是我想老孟一定和我一样，确信最好的男女主角就是1992年12月7日一同下山的那两位。男主角吕小品现在投身情境喜剧事业，也演也导，《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里都有他的身影，而女主角刘天池一直留在舞台上，《切·格瓦拉》《风帝国》都见她的风采。而与齐立一起策划《思凡》的关山，在第二年执导了《安道尔》，还是吕小品刘天池主演，讲述暴政下的爱情和不幸。我至今还记得刘天池在洋灰地上艰难的爬行，她一身朴素的衣裙，她被迫害，她牵挂爱人，她筋疲力尽，她是我们灾难深重的姐妹，在异邦守着自己的爱与不幸。　　剧中许多吟唱段落让人至今回味。全剧作曲是由张广天和三宝协力完成，这个阵容现在想来还真是奢侈。我私心里最记得的是控诉暴政哀悼死难者的《伯明翰儿童之歌》：“大街上橱窗里玩具很贵，看着它们你不要伤悲。记着你是你妈妈的宝贝，天色已晚你要把家回……”　　后来关山走向中国的腹地与边陲，采访着底层的爱与怒，写下了《一路奔走》这本书，也写了一出又一出印证他自身审美的舞台剧、音乐剧。　　那次演出还有一个小小花絮，就是剧情发展到抒情段落，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从观众席从容站起，吹奏口琴，这个人就是戏文九一的陆亮同学，现在任职于国家广电总局，追随诸领导的电影审查工作，我们也常常拿他说事，把国产电影的不景气归罪于他。当然，他和他的领导们一样无辜。　　孟京辉调进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中国国家话剧院）以后，首先是复排了《思凡》，然后搬演的是法国作家日奈的名作《阳台》。这出戏让话剧的票价涨到了三十元钱，当时，北京人艺的票价可能还是个位数。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译者沈林，刚刚归国的戏剧博士，中戏戏剧研究所的所长，管辖着姜文巩俐王志文李保田一干人等，后来又调任院刊主编。沈博是真正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烂漫轻信，好凑热闹，却又激烈偏执，爱憎分明，几乎能激起任何年龄段之女性的爱怜，他却恍然无觉——这也是中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吧，反正他在我宿舍里，大家争论戏剧的时候，还有外人以为这是一个学问渊博的考生。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说的就是他。每到夜深无聊，我们往往会走到办公楼窗下，朝着三楼第一扇窗户喊着“沈博”“沈博”，他基本都在，而且总有时间请我们喝茶，或者大家一起去钻胡同里的小馆子。　　《阳台》里面汇聚了与孟京辉并肩战斗过的各路好演员，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扮演妓女之一的夏力心，扮演嫖客之一的周迅（这个周迅是男周迅，表演八九班）。他们在阳台旅社里遭遇，他要扮演将军，她就要扮演战马，有点甲方乙方的味道，但是，两人演得神采飞扬，处处妖娆。周迅一直沉溺教学，很少参加影视剧拍摄，夏力心一直没有真正走红，但是我们知道她的本事，知道她在舞台上的狡黠和妩媚。其实我觉得她创作的角色中，《大撒把》里那个跟葛优约会却始终惦记见作家王月（影射王朔）的文学女青年，没几句台词却颇让人回味，回味她出没其中的八十年代。　　　此后就是对我个人最具意义的时刻吧——1994年年底，我参与了《我爱×××》的创作，合作者包括本剧导演孟京辉、流浪歌手黄金罡，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王小力。总共写了三稿，从1994年7月30日，到10月23日。本来是想写个好端端的爱情故事，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故事能让我们真正信任，索性把未来的演出当作肆意的表白，每句台词前面，都要冠以“我爱……”试试吧。　　“拥抱贫乏”“审判历史”“挑衅观众”“轰然倒地”，一个又一个口号划过，宛如流星，我们经常会被自己的舞台狂想吓着，随即忘了自己本来要说什么。最早的草稿中曾有一句让我们大笑：“我爱各省纷纷独立，我爱各省纷纷放弃独立。”讲的是辛亥年间的景象，却让我们自己联想更多。　　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真是

个精彩世纪，大师死去可是明星辈出，该发生的不发生，不该发生的几乎都来了。在此要鸣谢吉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大博览》，我们从中找到了太多灵感和笑料。史籍铭刻的某某大罢工旁边，就是一条新闻“纽约一美男子在地铁口遭枪杀”。这种让人精神分裂的排版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本质。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查阅历史，是为了验证自己清白，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好好把自己生下来。　　于是 1994 年的冬夜，在东城区一个仓库模样的排练场里，我们搞了一次没有许可证的话剧演出，匆匆忙忙演了三场，有如飞行集会。不卖票，就那么聚了满场的人，听五男三女八个年青人在那里不断吟诵：“我爱光，我爱于是便有了光，我爱你，我爱于是便有了你……”　　这个句式一直持续下去，从 1900 的新年钟声，一直爱到了我们童年中的白衬衫蓝裤子红药水。因为，我们终于出生了——“我爱一百万尼克松等着接管美国的时候，我出生了，我爱一百万克格勃等着监视我的时候，我出生了……”　　当时最打动我自己的，还不是那些坚定而忧伤的咏叹，而是如此咏叹之时，八个演员穿着白衬衫白裙子，站在墙边，像是等待枪决——那些一战二战冷战内战的历史画面，就由放映机投射在墙上，还有他们的脸上，身上。　　士兵在行进，列车在行进，坦克在行进，他们就碾压过那些青春的面庞，碾压过那些专注的神情。历史就这样成为青春的磨盘。在编剧的话里，我自己写的一句是：“不是通过否定，你才能到达坚强”。是的，千疮百孔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衰老的家长，像张楚歌里唱的：“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我们就拉扯着历史，一起长大吧。　　黄金罡后来在《美学通信》中更清晰地论断：“革命与反革命都不曾带来自由。那些自称要养育我们的，早已经离我们而去。”　　还有一个真正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作家王朔。当时他还在时事文化咨询公司的名头下运筹帷幄，他无私的赞助了八万块钱，因为不能卖票的演出当然谈不上商业回报。他还好心提醒我们，现场可以免费赠送小吃，但是死命加盐，最后观众咸得冒火的时候，我们剧组再高价出售饮料，以求略有收益；至于观众可能中途退场的问题，他比我们还操心，建议场灯熄灭之后，马上落下铁闸门，上厕所都不让出去，让全体观众与演员死守在一起。我至今记得这些起哄架秧子的超现实主义建议，也记得王朔老师摩拳擦掌的风采。　　女作家林白在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1994 年 12 月 27 日，我和平面设计家旺忘望，《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赵彤宇到中国美术馆后面的一条地形复杂的胡同里观看话剧《我爱×××》，沿途有一些红色箭头，后来我发现这些箭头越来越多，布满了整个剧场的四面八方上下左右，我们进去没多久，演出现场的铁门轰然落下。”　　这部小说里大段摘引了《我爱×××》中的台词，却疏于联络我们，产生了事后的一点涟漪，然而双方都是老实厚道之人，所以很容易沟通。最后，人家送来几百块钱，我们四个编剧在操场就给分了——那是我第一次从实验戏剧中捞到一点报酬。　　这出戏的舞蹈是金星，那时她还是一个爽朗的哥们儿，带点东北口音，衣着鲜艳，爱打手势，排练时真心投入。　　排练场里还有个游荡的闲人，就是麒麟童子何勇。那时候他刚惹一点小麻烦，因为赴香港红馆演出前，他对外界说了四大天王都不怎么会唱歌之类的谬论。这会儿事情已经平息了，但是，何麒麟还有点不忿，所以演员们吟诵“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江南第一才子，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文坛先知”之时，黑乎乎的观众席深处响起一句：“我爱已经受够了的四大天王！”　　这次演员共计八位演员，郭涛赵环宇都是表八八的主力，戈大立是最后一次参加幕前演出，戴明宇这个导演系的大眼睛哥哥，已经成长为著名编剧，代表作品就是《天龙八部》，王锦鹏是表九三的实力派，也许你们会记得他在《浪漫的事》里面演的那个结结巴巴的环保主义热血青年。　　女演员首先要提到李梅，她是表演九〇班的大李梅（后来孟氏戏剧中还有一个极具喜剧天分的小李梅），后来还演出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的警花。她是让你感觉很十三点的女性，大眼睛总透出惊奇，走路跌跌撞撞，笑起来不管不顾，然而神奇的是，她自己一直自诩是个细腻的女性。我曾受女性杂志《都市主妇》之托，向一百个熟识的女性提同一个问题：“在你生命中，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样的？”李梅的回答是：“阴雨天时，听着最爱的 CD，泡一壶清茶，朋友们在闲扯，

猫咪靠着我打着小呼噜，幸福的感觉便洋溢在全身的每个细胞里。”天哪，她还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是个平庸的小资。　　茹鲜是个开朗自在的女孩子，李梅的同学，她们那个班叫新疆班，陈建斌李亚鹏王学兵都在其中。　　还有一个参演的女生，来自电影学院的徐静蕾。她那时的声音条件还不够让她自信，所以，她在排练的时候格外练功，生怕被中戏这群粗人比下去。回过头来看录像，她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啊。　　好像那次演出开始，孟京辉就拉起山头自称“穿帮剧社”了，命意大概是“别人属于无心露怯，我们属于有意穿帮。”

影苑与札记名剧的儿女们（5）

随后不知怎么的就过了三年，我埋头写电视剧，都不知道老孟在忙些什么，就知道他带领《我爱×××》出过一次国，还为此写了检查。再看他的戏，除了 1995 年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居然就是 1997 年的《爱情蚂蚁》了。　　《爱情蚂蚁》，那是一出多么好的戏啊，据说才花了两万七千块钱，中戏的戏剧研究所出品。在孟京辉的作品中，这也是被忽略的天才之作，只因为现场的录像效果不佳，没有出碟，以至埋没。　　以色列作家韩乐闻的原著我无福分享，但是知道他被称为“以色列的良知”，精于刻画生命中的哀伤，此公 1999 年骨癌去世，他的遗作《安魂曲》，前一段也曾来京演出。　　翻译者改编者黄纪苏的文字，我是叹服的，“文心译胆推纪苏”，我就是那一次结识了这位谦谦君子。那个剧本在《外国文艺》发表过，应该还能找到，名字好像是《亚克比与雷旦头》，我知道，黄纪苏还有一种译法，那就是《假泼皮与赖蛋头》。　　关山参与了歌词创作，张广天的作曲更是悲慨大气的抒情——每当男女主角歌唱他们未来将如何甜蜜厮守，共渡黄昏的时候，全体演员就冷冷合唱：“这一天不会来临，我亲爱的人……”就这样被否定，就这样被断送，蚂蚁的爱情，爱情的蚂蚁。“不刷牙不梳头不洗脸，那时候我还是个小青年，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那时候我还是个小青年……”这首则纯粹是广天的口气，上海人的口气，那么亲切寻常，亲切的寻常的怅惘。“桔子黄了，就要熟了，狐狸老了，眼睛暗了，生锈的钥匙，打不开房门，风吹过沙漠，不留下脚印……枕头破裂，飞出了羽毛，河水涨起，淹没了大桥……”　　“我知道这是结局，我已经永远失去。我知道这是结局，一切都无能为力。风一样走近，又云一样走开；雪一样凝固，又水一样流去。暮色重了，却没有一丝睡意；天光亮了，却还要起床穿衣。用脂粉把自己层层包起，用笑容掩不住脸上的哭泣。”　　这样的歌词，在那个清冷的舞台空间唱起，犹如冰洞溶解的第一声滴答，不知道是吉是凶，然而，你明白，改变已经发生，意义日久自明。　　这部戏的主演陈建斌，数年后因为电视剧《结婚十年》而走红，走红以后也没有褪去自己占领话剧舞台的野心，另一主演是男周迅，现在还在戏剧学院辛勤教学，虽然他从《阳台》开始，就证明了自己是这一代话剧演员的中坚力量。女主角陶红，大陶红，独特的嗓音，还有那种不管不顾没心没肺的风采，让这部三人出演的戏剧没有任何遗憾了。　　本剧作曲和现场演奏者张广天。也正式踏入了戏剧圈，他与黄纪苏以及本剧策划沈林合作了史诗剧《切·格瓦拉》之后，又独自前行，走向《红星美女》《鲁迅先生》《圣人孔子》《风帝国》《左岸》……而沈林则完成了《盗版浮士德》，黄纪苏带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个戏让主演陈建斌充分满足。　　值得一说的是，《意外死亡》的文学本带有鲜明的黄纪苏风格，是以大资本家收购了剧场，然后宽容和蔼的要求上演一出讽刺资本主义的戏剧来开头的，但是孟京辉的导演台本没法这么处理，除非不思公演，所以我们最后在剧场里看到的，是另一个更稳妥更机智的开头，失去了黄纪苏原本的共讽意味。　　其实，这些年还是看了不少难看的戏，用黄纪苏的话说：“名义上是看戏，实际上是看表。”　　但是 1998 年，刁奕男编剧蔡尚君导演的《保尔·柯察金》让我重新振奋，主演胡军还是当年风采，更重要的是，编导懂得怎么提炼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双目失明后的奋力写作，没有组织上的电话、

处女作的出版和读者的热烈反馈，那些篇章正像《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的小俗尾巴，其实完全与保尔无缘。　　老刁的这个版本，结尾就是保尔与爱人达雅的父亲丘察姆的对话：丘察姆：那就告诉人们为什么而活吧，人总得有梦想吧？　　保尔：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用生命去换取真理。　　丘察姆：去死，那什么时候活呢？　　保尔：活着，就是要斗争。你问得好，什么时候活呢？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可以说，你刚才的那番话，逼着我要找到答案！　　答案是什么？　　就是全体演员最终走到台前，吟诵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这是答案，也是剧终，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以戏剧在这里落幕。　　　是落幕的时分，也是驻笔的时分。　　《恋爱的犀牛》的深情与流传，《切·格瓦拉》的尊严与震撼，已经无须赘述。　　因为一切都近了，近了，随着回忆，久远的日子已经近了，快要跟眼前的岁月融在一起了。所以理应驻笔，让一切还是泾渭分明的对峙，过去与现在。　　海子在他的汉俳《文艺复兴》中这样写道：“那是劳动的时光，朋友们都来自采石场。”　　我感念曾与他们邂逅，同谋，我感念自己曾经目睹的幕启幕落，感念那舞台上诞生的一切——就像黄金罡唱的“走得出的岁月走不出的队列，想得起的诺言想不起的似水流年”，一切都应深切致意。　　钱穆老人说过：“能存吾记忆中，方为吾生命之真，其在吾记忆之外者，皆非吾生命之真。”所以我不遗憾于忽略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一个网友读了我这篇文章的雏形，跟了一句说：“鹦鹉在晒命啊。”　　鹦鹉是网友对我的称呼，我喜欢夏虫的这个比方。　　确实是在晒命。　　就像金斯伯格的诗句：“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我们的青春，正和钥匙摆在一起。　　　（感谢廖一梅女士提供的回忆片断）

编辑手记出台记

2005年11月10日中午，俺奔赴三联书店前夕，突然想到，应该到银行换些零钱。结果，在银行羁绊半小时左右。匆忙上路，俺陆续接到短信催问，最终迟到了二十分钟。

换零钱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俺太相信祖国的银行。这真是记吃不记打，其实俺这些天经受银行、邮局系统的蹂躏已经够多……扯远了。等俺鼻尖冒汗地上到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心里叫一声苦：已经有十几人矗立在逼仄的过道中，看俺上来，就蜂拥而上，直欲辱之而后快。

俺的如意算盘本来打得很好：这次坐台，大家既可以顺便在书店购一些书，为其带来一些人气，一些朋友坐在咖啡馆里，也可以为其带来一些营业额，所以想到了之后，先献给老板两本书，说明来意，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当俺碰着两本《读库》一脸谄媚地走向老板时，她此前已经完全被咖啡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群惊呆，怒冲冲地问你们要做什么。

俺急忙让大家抓紧时间散去。好在大家非常配合，迅速将书拿到手，然后在老板的逼视下逃离现场，据说保安马上就要上来了。这些被急忙赶走的人中有两位家长，是替需要上课或上学的孩子来的，他们一点半就到达，俺居然连声解释道歉的话都来不及说。

等三四个人坐下来，一个兄弟又去点了一杯茶之后，老板才安静下来。这时苗炜师傅来捧场，老板总算见到个熟人，苗师傅结巴而坚定地说，放心吧，老六不不是坏人。老板的脸色终于缓和下来。此时，王大娘、老腻、小于、杜易桥等人也赶来助拳，他们分头点了点儿东西，静静地坐在邻座，为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除掉俺迟到这个错误外，这个下午就像苏菲·玛索的面孔和身材一样完美。众多只是通过短信联系的朋友一个个赶来，将一包包书陆续瓜分掉。小回姑娘不得不一包包地将书从库房拎出来，三联书店的人盯上了她，居然在人家的书店里卖书。于是大家不得不替换着去拎书。俺原本预定今天会跑掉六十六本，但过了没一会儿，就发现这是一个甜蜜的错误。腻哥

和杜师傅不得不杀奔城市的另一端，从俺家的总库提出几包货来。

整整一个下午，俺晕晕乎乎的宛如先吃了春药又吃了安眠药，幸福的哼哼声连成了一个长音。偶有不爽的是这里的通信屏障，接电话时断时续，短信的发送效率更是惊人，植物小朋友拿到书，又磨蹭了一会儿，告辞走人，这时俺收到了她的短信：我大约一小时后到三联。

另一处不爽是俺蹩脚的笔迹。生日时，一个朋友送俺一盒无印良品的签字笔，说你丫可以用它签字。其实这种东西就像中国古时候的春药，属于扶强不帮弱的，俺的字在其笔下，愈发显得难看。有好几个读者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俺，估计他们有一句话硬压着没说出口：这本签过名的书能换掉吗？

更不爽的是这本书留下的一些遗憾。由于未能执行严格的三审三校，书中被当场发现了N处错误，特别是limd_dsx兄弟，更是得理不饶人，这几天斗发了性，挑出来更多的毛病，让俺老羞成怒，决定0601出版前，不把这小子拉来做义工，实在难解心头之恨。

如今，俺接到的义工申请已不下六人，大多集中在校对方面。而在坐台这天，有几个兄弟直接就冲了上来，都云鹏兄弟特意将去深圳的转机时间延后了一天，来三联为读库吆喝，如果他以后失业，可以直接到书店应聘书托。另两个兄弟更是可怜，他们坐在台桌边，每来一个读者，俩人便要在脸上扮出对俺渴慕又敬仰的表情，好换取新人对俺的信任。整个半天下来，他们的脸部肌肉都僵了吧。

最大的感动来自一个叫赵薇的女孩。在俺出台的前天晚上，她发来短信，先声明自己不是小燕子，然后声明愿意做本次坐台的义工，对外可号称是俺的私人助理。接客没一会儿，她就来了，坐在俺的旁边一下午没有挪窝。这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居然是广播学院的博士生，令俺非常吃惊。不过用博士生当出纳就是不一样，坐台结束时，俺刚接完一个电话，她已经将帐目理得像葛朗台一样清晰，连不同面额纸币的张数都统计了出来。俺不得不说，智商高的人，就是扫大街，都能扫出个诺贝尔奖来。

结束了一天的哼哼后，俺往家里赶，愈发感觉中午去银行换零钱的举动是多么错误，大家大多备好了零钱，如今俺已经成了出租车司机最欢迎的人——俺拥有鼓鼓一口袋的零钞。

接下来这几天，俺忙于整理外地朋友的邮购信息，写信封、装书，然后提着两纸袋书去邮局，上封，排队，邮寄。插句广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纸袋真结实啊，俺那天去串门，自己的袋子坏了，就讨了一个人文社的牛皮袋，最近一周若干趟邮局跑下来，另一只袋子每次一换，而人文社的这款历经擦损，已经磨出了路易·威登的质感。这次0600号，俺只能支付给作者非常菲薄的稿费，前两天接到冯家师妹的电话，说张志新连环画的两位作者表示，稿费他们不要了，用来预订明年的读库。又说，画家带口信说，张志新烈士的妹妹也想买几本0600，俺那个激动啊，说千万别说“买”字，俺赶快给寄去。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俺像个农忙的农民一样幸福充实且充满企盼。两个月前的那个夜晚，上天使俺灵光闪现，做出了一次赌博式的选择，目前看来，对于俺来说，没有比做这件事情更有意义的了。

在那一天，在这一周，俺结识了那么多见面或神交的朋友，也知道了有那么广博的地域，散落着一个个读书人，浙江嘉善县，这个地名是俺第一次听说，居然有两份订单出自这同一个地方；山东的王刚，在今天下午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在万寿路邮局与俺进行了一次《读库》的交接；今天下午俺跟一位出版人探讨，他说上海如今的书市很不景气，而江浙沪原来可是中国图书业的半壁江山啊，俺说，《读库》最多的订单就是来自上海……

或热烈或戏谑，读着一封封妙趣横生的来信，俺的傻笑声经常把上帝都惊动。最长的一封是广州的马伦兄弟，写了上千字来控诉汇款时的贱样；一个女孩先是向俺道歉，说她只能订购0600，因为她在那个繁华都市里上班，工资只有1800元。俺更坚定了俺的判断，读书这件事儿，跟性别年龄职业体重学历长相和血型无关，还有财富。

就是这个女孩，要买两本0600，一本留给自己，一本送给那个她喜欢了七年的人。

除了衷心的祝福，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一

把美编摁住

我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新闻机构告别铅与火、走向光和电的历史性阶段。从铅字房搬到激光照排车间，用上电脑，心里那个兴奋啊。高科技就是高科技，许多闻所未闻的技术手段，既丰富又便捷，心里那个新鲜啊。

画版时，我花样翻新，一个标题都恨不得变换六种字体，然后是勾边立体倾斜渐变，再铺上花里胡哨的网纹，无所不用其极的美化，就像突然有钱的穷哥们，要把家里所有的首饰都挂在身上，不把别人的眼睛晃瞎就不痛快。

后来，我慢慢老实下来，懂得尊重别人的眼睛了。

再后来，跟杨大婶在路上溜达，他突然说起一栋很牛逼的机构，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牌子、很小的字标着自己的名称，更显牛逼。他的这番话让我很受启发，真正自信的东西，是用不着占那么大地方，用不着那么张牙舞爪地去刺激别人，好像大家的眼睛都看不见似的。

我更加老实下来，懂得信任别人的眼睛了。

这次设计《读库》，我跟合作多年的美编艾莉说，抛弃一切美化手段，去掉一切装饰，越少越好，越小越好，让读者基本感觉不到装帧设计的存在，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思路下，《读库 0600》被鼓捣出来。

其后一天，见到出版人尚红科，我献上一本 0600，他对装帧比较推许。我说，其实很简单，美编把自己的创作欲望摁住，别老想着显摆，就可以了。

是啊，美编能控制住自己的创作欲，真是一种美德。老尚说。

你看现在的书，连个页码都要具有强烈的设计感，你根本就看不清哪里标着页码。我说，书都做得不像书了。

他为自己前不久出版的一本书感到遗憾，后悔没把美编的创作欲给扼杀掉。美编对我说，不玩些花样，怎么显得我们的设计牛逼呢？那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就听了他的。

我对老尚说，您应该对美编说，当别人都玩花样的时候，你不去玩，岂不更好？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二

摆事实不讲道理

“媒体怎么着才能好看？”

“不讲理就好看。”

这两句对话发生在我和一位大学同学之间。两年前她策划央视一档节目，跟我探讨起业务来。所谓不讲理，就是少说些道理，少发些议论。我对央视的说教嘴脸一直躲之不及，就像邱小刚在某处闲笔说到水均益，“电视节目主持人中最善于诱导观众去归过于人的一位”。如今看同学有机会参与决策，急忙劝她为民造福，替人民开扫出一片清净的空间。最终未遂。

新闻学中有一个技术术语，名曰“抽绎”。这个字眼听起来很玄，其实指的就是对新闻标题的概括提炼。抽绎水平越高，所表达的内容就越笼统空虚。对于道理，更是这样，只要往大处讲，都是接近真理的东西，而真理是最乏味的。

道理往小处说，则基本是各执一词的自说自话。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如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是如此之高，相互之间的说服是如此之难，各自秉持的理由是如此之充分，却被时

间刷新遗忘得如此之快，于是，只能躲开这些争执。

事实，只有事实，是生动的，鲜活的，有趣的，是不容辩驳的，禁得起时间推敲的。

所以，我给《读库》制订了这项基本原则：摆事实不讲道理。

要细节，要故事，要人物；不要观点，不要结论，不要评判。

其实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做法：能否不用形容词，不用定语？俺急忙将这个念头按住，就像郭靖有一日忽然想到：“倘若双足也能互搏，我和他二人岂不是能玩八个人打架？”但知此言一出口，势必后患无穷，终于硬生生的忍住不说。——以后倘有机会，再做一些这方面的文字试验。

从另一方面来说，摆列观点、结论、评判，也是对事实的多义性的一种剥夺，最终将文章的道路往窄里走。相反，则是将更广阔的空白留在了图书的页码之外，给读者留下了发现的余地和乐趣。

“那么，观点怎么来进行表述呢？”

“根本就不用你来费心表述，观点是属于读者的。”

这是我和同学那次对话的另两句。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三

色眼看人

我一度负责过几份报刊，承担的重要职责是，确定封面图片。关于报刊的这个脸面问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最好是美丽女性，人物的眼神一定要与读者形成交流等等，也不知道是谁定的，又有什么道理，反正大家都口口相传。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遴选原则：这些美女衣着一定要薄露透，星眸呈迷离状，红唇作吸吮科，所有的动作和表情加起来，给人的感觉不是处于前戏中，就是恰好高潮后，至少也得是个跃跃欲试要出手勾你的样子。

这样鼓捣了几年，但一次发行会，跟负责卖这些产品的人儿座谈在一起，我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几位战斗在第一线的发行人员老实不客气地说，别老觉得封面越性感读者就越喜欢，老把人家读者想得那么层次低。你们弄得越骚，老百姓就越不愿意买，至少是不好意思买。

我如遭五雷轰顶。是啊，我们不是一直标榜什么高档读物、高端读者吗？可为什么一旦做起事儿来，就拿读者当低级色情狂对待？

又过了两年，发行圈总结出与编辑部针锋相对的规定：凡是正走红的明星，巩莉章子仪赵薇周迅之流，一律是封面毒药，全都堆在那里卖不出去——于是，在报刊亭上她们占据的时间就更长，给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以错觉，用更多这样的人充塞在封面上，就更卖不出去。

想想也有道理，你自己愿意捧着一张张大俗脸招摇过市吗？就从虚荣的角度来说，也得来点儿新鲜的独特口味啊。

是读者低俗，还是编者低俗？这是我如今再听到一些同行不得不迎合读者口味的抱怨后，反问的一句话。

佛经说，用佛眼看人，人人皆佛；用色情狂的眼光看读者，读者也都成了个顶个的性饥渴。所以，千万不要去嚷嚷什么高端高档，能老老实实的把对读者的尊重和信任落到实处，就可以了。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四（图）

民间高手　　吸取大家的意见，《读库》0601 将做一些调整。而在编辑 0600 时，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不是说要极简主义吗？干脆就不要序，不要跋，不要作者介绍，不要栏目设置，甚至，目录上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我还对此解释道，我相信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的文字。从 0601 开始，作者的名字将出现在目录上。这当然是应该的，0600 的部分编辑试验到此结束。某天跟几位编辑吃饭，《十月》杂志的周晓枫将严歌苓称为她的“心肝宝贝”。对于编者而言，好的作者绝对当得起这种金贵的地位。　　怎么介绍《读库》的作者呢？　　他们是我的荣耀。尽管他们不属于占据目前媒体版面、频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专栏作家、学术明星、畅销书作者，但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能够结识他们，约请并编辑他们的稿件，我绝对以此为荣。比如缪哲，我软硬兼施，说动他为《读库》写稿，他说，我为你写一些补白吧。我直欲仰天长啸。太奢侈了，就像汤姆·汉克斯答应为我导演的一部电影出演龙套。　　《读库》注定不是一本很大众的书，所以许多读者也与编者、作者之间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分享与分担。0600 送到王小山手中，那篇《枪，很多很多枪》，让他满足得直哼哼，一股劲地打听这个叫杜嘉的作者是干什么的，他愿意请这位作者连喝一个月的酒。再比如缪哲，当我在催他的稿子的时候，突然在小冷狗的博客上看到对这位冷门人物的激赏，不禁在嘴角浮出得意的微笑，哼哼，等着瞧吧。　　再说周晓枫，我与她的渊源起于向她讨要一位名叫王增延的插图作者的联系办法。这位画家显然也属于周晓枫“心肝宝贝”级的作者，听说我爱她所爱，竟然充满感激，于是吃了一顿饭。　　画家的电话要到手，是河北邯郸的区号，但我打了若干次，都无人接听。我对周晓枫说，你再给想想办法吧，我一定要找到他，为《读库》配图。周晓枫说，他没有手机，电话可能也换了。放心吧，我一天会给你找六回。　　二十多天过去了，0601 的稿件开始编辑，画家仍不见踪影。　　我看着自己收藏的几幅他的插图，难道就要这样留下遗憾吗？我的心充满惆怅，就像那弯弯的月亮。　　2005 年 11 月 24 日，我去中华女子学院跟这里的学生探讨人生。气氛很热烈，探讨结束后，我掏出手机，看到上面有九个未接电话——是同一个号码，河北邯郸的区号！“王增延老师吗？”我把电话拨回去，呼吸急促地问出第一句话。　　“是我。晓枫今天刚找到我，让我一定要跟你联系上。”　　我在电话里嘿嘿傻乐半天。　　这天是感恩节。　　回到家中，我在 SMN 上迫不及待地将那几幅画传给几个朋友，向他们炫耀，瞧，这种级别的插图，这么牛逼的作者，我终于约上了！　　接下来这几天，我与王增延老师通了几次电话，商量稿子的同时，也约略知道了他的情况：王增延，44 岁，居于河北武安县，供职于县文化馆，他的本职并不是画家，而是戏曲演员，他演出的剧种叫平调落子，又称武安平调与武安落子，属于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他最近来过几次北京，因为要陪爱人看病。　　请允许我炫耀一下吧，他下一次来京，我可以为他效犬马之劳。　　请允许我继续炫耀一下吧，王增延老师从前的两幅作品——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五

去图

河北赵县有座柏林禅寺，某天，书记（图书记者）丁杨去那里参禅，在门口碰到一个和尚，正跟人往门外走，一边说着：“哎，这不就是现在所说的读图时代嘛。”

这句话能够从一个和尚嘴里说出来，足以引起丁书记的兴趣。他于是对我转述了这幕情景。

呜呼。

我也曾经对图片迷恋过，是因为此前能看到的好图太少了；我也曾经喜欢采用图片，是因为铅字排版时发一张图实在不是一般的麻烦，所以进入激光照排时代之后，都是尽量多的

用图。版面好看了许多，文字增色了许多。

为文章配图，至少是配一张虚头巴脑、半搭不搭边的压题图，如今成为许多报刊的不成文法则。

许多书，也开始把原来的版本配上插图——当然是不用交版权费的公版图片——重新出版。我看最近出版的《中国人史纲》，已经撑成了三册。当年的时代文艺版，两册不到十块钱，如今这个插图版，已经是七十五元。其实《中国人史纲》中的许多图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地图，非常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我见过最古怪的插图本是昆仑出版社的《1901 年》，这里插一张故宫的石阶，那里插一张颐和园的古柏，摄影技术之低劣，跟我都有一拼。

我对如今的读图时代已经有些厌倦，是因为图片出现得太多了，有些尽管漂亮华美，但也平庸空洞。在网上一搜，比其精美的免费图片都一把一把的，何苦再让读者花钱买呢？

于是，在《读库》的编辑过程中，我也慢慢理清了思路，让图片具有它应该具备的价值，毫不留情地剔除那些毫无意义只为活跃版面或撑页码的配图，那些读者都能够想像得到、能在别处见到的图片。

纯文本也有纯文本的美感。至少，应该把油墨用在最值得用的地方。

套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句话，我发明了两句绕口令：插图于不可不图，去图于可以不图。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六

小聪明

前天是 2006 年 1 月 6 日，《读库 0601》扉页上标的出版时间就是这一天。遗憾的是，0601 的终审样还在出版社压着，等着主管部门的审批。圣诞节、元旦、《小强历险记》首映式，我设想过好几个 0601 面世的时间，均未遂。只能用“万事开头难”来安慰自己了。

有许多朋友问 15 号能否看到 0601，这个我也说不好了。第一期的手续的确多一些，并且有关机构的效率也的确惊人。如今这本书就那么被挂着，也不说不能出，但也不让你能出。依我看，春节前能完成印制就很好了。好在，发行各环节已基本谈妥，我也会先把信封填好，一拿到书，就塞进去给大家寄出。

这次的拖延有一个唯一的好处，就是有时间把稿子又做了一些调整。

胡淑芬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的《无厘头时报》给许多人带来快感。我约他给每期《读库》写一些时报。软硬兼施之下，他应承下来。0601 写了，也排好版，送出版社终审。

然后，有一天，他在 SMN 上问我，以后能否不再让他写《无厘头时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写那些卖弄小聪明的文字了。他说。

我沉吟一会儿，说好吧。

尽管有些失落，但我还是为他这种写作态度上的变化感到钦佩。我曾经感悟说，聪明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小聪明。如今要说，小聪明往回退一步，也许就是大智慧。

于是我就跟他商量，现在 0601 还未付印，干脆把这一期上的也撤下来吧。

他说好吧。

我将淑芬的稿子撤掉，又将刚刚收到并珍藏、准备用到 0602 期的高尔泰先生的一篇稿子放进去。调整页码、从全书的边边角角多腾出些空间，终于安排妥当。做完这些，我内心很是兴奋。

不仅仅是一篇稿件的替换，而是我的方向感更加明确了一些。

读者从网络上可以免费看到许多东西，花五毛钱买份北青北晚、花一块钱买份新*京*报，也可以廉价看到许多东西，却花二三十元买你一本书，要让人家看到什么？

经过这次调整，我的思路清晰了许多。

编辑手记《读库》编辑手记之七

不由分说

昨天去首都体育馆看史航、孟京辉的《魔山》。在门口，这小子先给我打起了预防针，“非常遗憾，排演时间短，有关部门给删了不少情节和台词。”他将《魔山》一书拿出来，“舞台上只体现出了我原作的十分之一。”

我马上将心理预期降低几个档次，进了体育馆。

有一类作品就是这样的，总需要在作品之外多加许多解释和表白。比如我曾经生产的那些书，当然没脸主动送人，别人来要，便讪讪地搭上几句话：“设计这么次，其实不是我的主意”；“最精华的那些部分，被删了”；“确实做得不太好，但也确实情有可原”……诸如此类的话儿，提前为自己开脱。

就拿《读库 0600》来说，也要经常跟人解释，由于就是我一个人在搞，所以有许多错字啦；因为不是公开出版，所以只能用一些现成的稿子啦；一些编辑意图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呈现得并不是很理想啦……先说这么多，其实心里还是发虚。

“灵感只需歌唱，灵感从不解释”，黎巴嫩诗人哈·纪伯伦的话。对于一本书来说，也应该是不由分说地呈献给读者，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啊。以后的各期《读库》，倘能达到这种境界，自然就好看了。

这方面做的比较纯粹的，当然是《非常道》。由于各种原因，该书的序和跋在正式出版时全都刊落，干净蕴藉，反倒别有一种境界。从现在的阅读效果来看，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案。

不过，如果不把原序跋发出来，总归是一种缺憾。《读库 0601》中收入了王康和余世存的这两篇文章，相信这样的“分说”并不是多余的。

本书的连载为部分选摘 谢谢关注！蔡志忠手绘本书藏书票（图）

=TXT 版本编辑制作 TurboZV，更新消息请访问 www.turbozv.com =